

# 社科天地

---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Yueyang

2018 年

第 3 期

主管：中共岳阳市委宣传部

主办：岳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搭建学术平台  
汇集智库成果  
繁荣社会科学  
服务岳阳发展

# 目

# 录

## Contents

社 址：岳阳市南湖大道  
市委三办公楼 505 室  
电 话：0730-8889305  
邮 编：414000  
编辑部邮箱：1793617663@qq.com  
网 址：www.yyskzk.com  
刊 号：湘 FK-016  
印 刷：岳阳鑫容印刷有限公司

2018 年 11 月编印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 学术园地

- 04 共享伦理：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形态  
彭柏林 卢先明
- 11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探微  
杜艳艳
- 22 制度正义视域下的城乡低保制度发展困境与原因探析  
杨冬艳 李秋庆
- 29 心理学视角下预防腐败问题探讨  
彭丽丽

### 人文历史

- 34 试论屈原诗歌的政治意境  
谢作文
- 37 屈原诗学与忧乐情怀  
周文渊
- 40 加强地域文学名家研究，拓展近代文学研究空间  
——中国近代文学高峰论坛暨全国首届吴敏树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张乾坤 任先大

### 湘江时论学术沙龙

- 43 探索长沙岳阳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魏 星
- 44 关于实施化工产业替代发展战略的建议  
刘宇赤
- 45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是湖南强省的必由之路  
徐四星
- 46 打造湖南新增长极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郑立新
- 47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构建岳阳发展新格局  
蔡吉跃
- 48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  
张 萍

- 49 关于打造湖南本土江海直航船队的对策建议 鲁 涛
- 50 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点产业布局研究 邓正华
- 51 岳阳必须全力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周金城
- 52 供给侧改革应加快绿色农业发展 胡中习

### 一 线 调 查

- 54 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实践调研报告  
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调研组

### 融 智 建 言

- 60 大岳阳城市圈产业优化布局研究 邓正华
- 64 我市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民获得感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陈美中
- 70 岳阳市人才队伍现状调查与分析 刘 理

### 社 科 文 摘

- 75 “改革学”刍议 邓伟志
- 82 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需要“上下互动”  
——与许汉泽、李小云商榷 吴新叶

### 新 书 推 介

- 87 我看到了《岳阳楼记》的源头  
——评黄军建新著《不朽的忧乐》 李望生

## 编 委 会

顾问:

马 娜 李 为 李 明  
卢先明 王伊亮 李 红  
喻岳兰 甘 勇 潘岳生  
张国云 许卫国

主任:

魏 星

副主任:

郑立新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卫兵 王春芳 王敏求  
王智勇 刘宇赤 汤迪军  
余友安 宋 为 张 萍  
李文伟 李孟阳 李桂华  
李爱佳 李爱玲 杨 景  
易循宇 胡 蝶 袁 征  
彭柏林 熊江新 蔡远芳  
戴文慧 戴金波

主编:

魏 星

副主编:

郑立新(常务)  
张 萍 汤迪军

编辑部主任:

谭 紫

编辑:

罗伟军 郭小龙

敬请关注岳阳  
社科智库公众微信平  
台,扫码即可。



# 共享伦理：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形态

彭柏林 卢先明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岳阳 414006)

**摘要：**共享伦理是一种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状况的全新的伦理价值形态。作为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形态，共享伦理主要具有如下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产生背景的新时代性；二是价值体系的开放性；三是伦理主体的人民性；四是伦理诉求的公平正义性。

**关键词：**共享伦理；全新的伦理价值形态；特点

任何伦理价值形态，都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产物。不仅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伦理价值形态，即使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所决定，也会产生不同的伦理价值形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我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与此相适应产生了一种全新的伦理价值形态，即共享伦理。所谓共享伦理，其最基本的内涵是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共享伦理作为一种反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状况的全新的伦理价值形态，主要具有如下特点：

## 一、产生背景之新时代性

共享伦理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客观

必然性的，其客观必然性就蕴涵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状况之中。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共享伦理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前，我国尚处于“欠发展阶段”，也就是说，我国的发展相对落后和贫穷。正如邓小平所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归根到底是要使我们发展起来。现在说我们穷还不够，是太穷，同自己的地位完全不相称。”<sup>[1]</sup>所以，在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摆脱相对落后和贫穷的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大国。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邓小平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末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研究”（18BKS090）；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志愿服务伦理研究”（18BZX13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习近平共享思想研究”（17YJA10022）

**作者简介：**彭柏林，湖南理工学院期刊社教授，博士；广东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湖南师范大学共享思想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卢先明，湖南理工学院院长，教授。

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sup>[2]</sup>是以，在这一历史时期，如何把资源和力量集中起来快速发展经济并积累社会物质财富，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在我国“欠发展阶段”，不仅人才资源稀缺，而且创新能力不足、创新驱动动力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主要依靠人以外的“物”来推动经济增长。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我国所采取的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要素驱动和投资规模驱动模式，并提出了“让一些地区 and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

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不仅我国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已经稳定解决，小康已在总体上实现，而且我国的经济也获得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而我国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和供给不足状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在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有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sup>[3]</sup>这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让我们在共享发展成果方面还存在不少突出难题和明显短板，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指出：“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目前仍有40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有学者将我国当前面临的难题和短板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sup>[4]</sup>一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消除贫困任务艰巨；二是就业总量矛盾有所缓解，但结构性就业矛盾更加突出；三是社会保障的普惠性不足，公平性差；四是医疗卫生服务总量不足，公平性差；五是教育资源配置不合

理，教育公平问题突出；六是人口均衡发展问题显现，代际公平有待提升。通过这些难题和短板所透露出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一些人对改革发展成果还没有更多更好的获得感，而这是实现“十三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包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正是针对以上难题和短板，为了让人民能够共同享有改革发展成果，实现由一部分人获得感不够的发展走向人人拥有更多获得感的发展，使人人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我们党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而共享伦理就是基于这种共享发展理念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形态，它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状况，是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状况的产物。

## 二、价值体系之开放性

何谓价值体系的开放性？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指一种价值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与时俱进，扬弃那些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东西，生发新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内容；二是指一种价值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理论的研究方法和有益成果，使自身不断得到补充、完善和发展。依据这种理解，所谓共享伦理价值体系的开放性，即指共享伦理价值体系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相关思想资源，以及不断根据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状况的变化而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品质。

共享伦理价值体系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它对时代的开放性上，也就是说，它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产生的。一方面，二战以后，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为了缩小社会差距，降低社会风险，缓和社会矛盾，构建资本主义“和谐社会”，西方许多国家在发展理念上开始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放任发展观念转向管理型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观念，广泛采用社会公共政策对经济和社会进行调节，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一定程度的共享。同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些思想家提出“以人为中心”的新发展观。20



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针对有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不注重共享从而出现“经济总量增长而社会贫富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贫困人口增加”的状况进行深刻反思,提出了“基础广泛的增长”“普惠式增长”“分享型增长”“益贫式增长”“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等理念。

“这些理念的提出及其实践,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上取得了一定成效。”<sup>[5]</sup>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展开,由于社会诉求日趋多样化,民众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增强和提高,由于分配不公、城乡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公民权利不平等等问题,也由于政府转变职能缓慢且服务意识、危机管理能力与人民需求和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等,人民共享的问题日益凸现出来。”<sup>[6]</sup>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借鉴和吸收国际上先进的发展理念,立足于我们当前发展所面临的难题和问题,本着对人民群众现实诉求的直接回应,为了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中拥有更多的获得感,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适应的共享伦理这种伦理价值形态。

其次,共享伦理价值体系的开放性表现在它对实践的开放上,也就是说,从共享伦理价值体系产生的实践基础来看,它是我们党在长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本着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通过不断的思考、探索、总结而凝炼出来的。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思考和探索具有中国特点的共享发展之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sup>[7]</sup>这可以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最初表述。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不断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教训和实践经验,从

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实现共享发展的问题。邓小平曾从不同角度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消灭贫穷,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认为“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sup>[8]</sup>。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面对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全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发展差距逐渐拉大的现实情况,江泽民曾强调指出:“我们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通过辛勤劳动与合法经营先富起来人们的发展活力,鼓励他们积极创造社会财富,更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以及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特别要使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并积极帮助他们解决就业问题和改善生活条件,使他们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温暖。”<sup>[9]</sup>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要按照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原则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就我国在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形成了以“以人为本”为核心、以和谐社会为目标、以科学发展为手段的共享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观,并首次提出了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论断。2015年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强调指出:“坚持共享发展,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随着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共享伦理这种新的伦理价值体系也就相应地产生了。

最后,共享伦理价值体系的开放性,表现在它对历史的开放上。一方面,它批判地吸收了我

国传统文化中的共享伦理思想资源。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提出了“天下大同”的理想，并且这一理想在《礼记·礼运》中得到了完整、生动的表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礼记·礼运》对“天下大同”社会理想的描述是世界上有文字可查的最早表达共享伦理的思想。而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价值形态的共享伦理，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儒家这种“天下大同”共享伦理思想的现代诠释、价值升华和创造性转换。另一方面，它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伦理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对资本主义及以前阶级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中，在对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系统论述中，提出了非常丰富的共享伦理思想。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提出要“消灭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的发展”<sup>[10]</sup>，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共同劳动的成果以及各种技术改良和使用机器带来的好处，都由全体劳动者、全体工人来享受”<sup>[11]</sup>，而且认为共享的内涵应当是全方位的，涵盖政治、经济、社会等人类生存发展的一切领域。正是通过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享伦理思想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长期艰苦的探索，才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伦理价值体系。

共享伦理价值体系之所以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这是由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开放性特征所决定的。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理论品质，正如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事实上，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所以具有如此巨大之真理威力、强大之生命力、能永葆其美妙之青春，之所以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能够达到其如此高度、没有哪一种学说能如其那样对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其能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来完善和发展自我，就在于其能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句话，就在于其具有开放性的理论品质。而共享伦理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体系，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所产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既然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开放性特征，那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而形成的共享伦理价值体系必然也具有开放性特征。其二，这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决定的。共享伦理价值体系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是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状况的反映，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状况都会相应地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共享伦理价值体系也需要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地得到检验、丰富和发展。这也就是说，共享伦理价值体系是一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伦理价值体系。

### 三、伦理主体之人民性

所谓共享伦理主体的人民性，指的是共享伦理是一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伦理形态。邓小平曾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

义,更不是共产主义”<sup>[12]</sup>,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著名论断。党的十八大报告也强调指出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那么,为何要发展呢?当然不可能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因为“发展本身不是也不能成为目的,发展必有其目的和归宿,发展必有其价值指向”<sup>[13]</sup>,也就是说,发展必然有一个“为谁发展”和“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

“为谁发展”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既是人类社会在历史发展中面临的首要问题,更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解决好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曾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无产阶级运动与过去一切运动的区别时,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而无产阶级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sup>[14]</sup>列宁曾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这个新的、美好的社会里不应该有穷有富,大家都应该做工。共同工作的成果不应该归一小撮富人享有,应该归全体劳动者享有”<sup>[15]</sup>。毛泽东曾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强调,“我们作计划、办事情、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sup>[16]</sup>。邓小平曾指出:“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sup>[17]</sup>由此可见,社会主义事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事业,为人民的利益而发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离开了人民的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会偏离方向,就会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意义。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为谁发展”的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突出和重要。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习近平强调指出:“要着力践行以人民

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sup>[18]</sup>这就是说,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切实推进共享发展。也正是基于共享发展理念,党中央在“十三五”规划中提出“发展就是让人民共同享有更多的改革红利,发展的成果更多地惠及群众,给百姓以更好的生活,通过改善民生、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在医疗、教育、住房、就业、扶贫、食品安全等方面给人民以实惠,让公平与正义之光普照在人们的心中,让人民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sup>[19]</sup>。由此可见,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是共享伦理的根本特征所在。

共享伦理之所以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其依据主要有以下两点:第一,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sup>[20]</sup>正是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出发,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从根本上说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历史。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所以,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sup>[21]</sup>事实上,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方面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实践和智慧”<sup>[22]</sup>。本质地看,共享伦理强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运用。正因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人民主体性的发



挥是共享发展的积极途径，是达到共享发展根本实践目标的重要手段。”<sup>[23]</sup>因此，在推进共享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尊重人民所表达的意愿、所创造的经验、所拥有的权利、所发挥的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自觉拜人民为师，向能者求教，向智者问策，从群众中汲取无穷的智慧和力量。紧紧依靠人民，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投身到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来”<sup>[24]</sup>。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特征。从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基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唯物史观而建立起来的。既然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那么基于这一原理而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必然要保证人民的主体地位，而人民当家作主是保证人民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实践中的必然体现。这就是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和核心。既然如此，一方面，我们必须坚持发展依靠人民的理念，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会面临多方面的困难和问题，这些困难和问题“归根到底，只有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才能够得到解决”<sup>[25]</sup>。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努力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由全体人民共享。

#### 四、伦理诉求之公平正义性

共享伦理所涉及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从一定的意义上说，共享发展理念是针对我国发展进入邓小平所讲的“发展起来以后”时期而出现的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分配不公现象日益突出等问题而提出来的。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是2005年的2.18倍，而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近3倍的差距之上。近30多年来，官方公布的中

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5以上，大大超过0.4的警戒线。中国民生发展报告估算结果显示，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1/3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1%左右。<sup>[26]</sup>这种收入差距居高不下、分配不公的现象，无疑是与社会主义维护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相背离的。而导致这种有违社会公平正义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没有正确处理做好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关系所导致的。

要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无疑首先要将“蛋糕”做大，也就是说，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是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础和前提。所以，习近平指出：“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为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奠定更加坚实基础。”<sup>[27]</sup>在这里，我们必须警惕“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转向以分配为中心，只注重“蛋糕”的分配，一味地强调调高分配水平，以避免陷入不可持续的“中等收入陷阱”。要看到，分好“蛋糕”固然重要，但是做大“蛋糕”始终是前提、基础，“蛋糕”做不大，所谓分好“蛋糕”也将成为一句空话。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sup>[28]</sup>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强调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sup>[29]</sup>，并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观点。正是以这种正确认识为指导，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经济发展了，经济实力增强了，并不意味着社会公平正义就一定能够实现，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分好“蛋糕”的问题。“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合人心

的,而且是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要威胁社会稳定。”<sup>[30]</sup>正因为如此,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二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要在不断发展基础上尽量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做好。”<sup>[31]</sup>尽管40年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但是由于在分好“蛋糕”的制度设计方面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以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分配不公现象日益严重,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日益突出。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所要紧迫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是缩小收入差距,克服分配不公现象,公平合理地分好“蛋糕”,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共同富裕。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党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

共享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就是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确保改革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其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共同富裕,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重要体现。“从社会主义本质观认识持续发展的历程来看,社会公正、共同富裕、共享发展在同一价值序列之中。”<sup>[32]</sup>因此,公平正义,乃是共享伦理的基本诉求所在。作为共享伦理基本诉求的公平正义,与资本主义伦理所提倡的公平正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即它不是形式上的,而是实质性的;它不是对少数人的公平正义,而是对全体人民的公平正义,其目的在于增进人民福祉。所以,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要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让每个人获得发展自我和奉献社会的机会,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sup>[33]</sup>

####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312.
- [2][8][12][17][29]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51,116,64,63,225.
- [3]党的十九大报告辅导读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28.
- [4][5][6][19]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6:211-214,207,31,52.
- [7][16]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N].人民日报,1957-06-19.
- [9]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40-541.
-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24.
- [11][15]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00.
- [13]何毅亭.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中国实践与中国创新[N].学习时报,2015-11-27.
- [14][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345.
- [18]习近平.聚焦发力贯彻五中全会精神 确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N].人民日报,2016-01-19.
- [2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31.
- [22]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02.
- [23]李齐.人民主体性与共享发展新理念诠释[J].云梦学刊,2017(1).
- [24]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128-129.
-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0.
- [26]张琦,等.中国共享发展研究报告(2016)[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2-3.
- [27][3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Z].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96.
- [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8.
- [30][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M].蒋自强,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74.
- [32]孙大伟.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建设与脱贫攻坚的辩证分析[J].云梦学刊,2018(3).
- [33]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233.

#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变革探微

杜艳艳

(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 湖南理工学院基地 湖南岳阳 414006)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各领域均发生了全方位、开创性、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这些变革一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也促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实现了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转变。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要更加自觉地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关键词:**历史性变革;重大意义;主要内容;鲜明特征;实践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全面梳理总结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变革,深刻领会这些新变革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贯穿其中的规律性特征并牢牢把握这些新变革提出的实践要求,对我们今后开展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一、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深远意义

(一) 历史性变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基本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sup>[1]</sup>这一时代主题,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作出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决策,促使国家在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历史性变革,进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主题在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上得到了全新阐释,直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历史性变革使党和国家各项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和一种新的发展境界,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站在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和起点上,开始了新的征程。中共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促使我国实现了两个“前所未有”: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二是“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

基金项目:湖南省党的创新理论基地委托课题“深刻领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新变革”(17DZXJC02)。

作者简介:杜艳艳,女,山西临汾人,湖南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博士。



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sup>[2]</sup>这两个“前所未有”分别从我国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国内各领域面貌的变化两个角度高度概括了十八大以来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发生的深刻变革。这些成就和变革既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一系列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战略、重大举措在实践中产生实质性效果的充分体现，也是准确判定当代中国发展所处历史新方位的基本依据。

社会主要矛盾是判断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标志。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做了全新描述，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3]</sup>。这一论断的做出是有科学依据的，一方面它是在总结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基础上对中国基本国情的一个新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是对中国社会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客观实际给予的现实肯定。这些深刻变化进而为准确判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提供了客观依据。可见，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深刻变革既是党应对新社会矛盾的行为结果，也是党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科学判断的实践基础和现实依据。

（二）历史性变革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提供了现实条件

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无数仁人志士艰辛探索，都力图寻找一条中国自立自强之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中华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解决人民吃不饱、穿不暖的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我国

生产力不断发展，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而成功解决了中国人民“富起来”的问题。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站在国家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上谋篇布局，作出了一系列对党和国家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方针政策，解决了诸多困扰党和国家多年的发展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大事，从而开启了让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新征程。

这些历史性变革有效解决了国家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提供了基本的体制、机制、制度依托。如“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推进确立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总体架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确立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制度基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确立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目标的设定为中华民族“强起来”确立了法治保障；国防和军队体制的改革确立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军事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化确立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政治保证。可见，五年来的历史性变革扫除了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体制机制障碍，使我们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同时，这些历史性变革为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倾注了精神力量。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日益增长，更是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等“软实力”的不断增强。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与人民血肉相连，始终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始终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拼搏，使中国人民谋求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五年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非凡成就和深刻变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局面和治国理政新境界，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更加坚定了全国人民跟着中国共产党走的坚强决心，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三）历史性变革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参考路径

实现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和必然趋势，但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却是多种多样的。中国人民经过60多年的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以政党力量领导人民和军队、建立现代国家、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的路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着手全面深化改革，从而使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具体形态更加成熟定型。在实践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注重“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统筹推进，特别强调将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注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特别强调以加强党的建设为抓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重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使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解决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所面临的根本性与深层次矛盾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根据自身特点、立足本国国情，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在借鉴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模式的基础上，对本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所进行的全面而深刻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聚焦制约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聚焦长期以来存在于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顽疾，不断拓展延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运行机制，不断丰富完善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科学有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日渐繁荣多样。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内涵和形式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现代化道路也走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快。

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特别是在“发展陷阱”“治理赤字”“民主赤字”此起彼伏，贫富分化、恐怖主义、气候变化问题层出不穷的当今世界，中国实践和中国道路越来越彰显出强大引领力和感召力，中国风景也成为越来越多国家的憧憬。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得的成效，使长期占主导地位和垄断话语权的西方现代化模式被打破，也使得习惯用西方价值标准和发展模式主宰世界的错误认知得到改变，从而给世界上那些发展中国家和民族实现更好的发展提供了全新选择，因此，它具有世界意义<sup>[4]</sup>。

（四）历史性变革为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提供了转变基础

打铁必须自身硬。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必然要求。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决策，强调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同时，强调要着力加强党的建设，从而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了根本转变。习近平多次强调，“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sup>[5]</sup>。经过五年的真抓实干，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卓著成效，中国共产党以“严、紧、硬”的姿态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征程。

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首先从解决党内日

益凸显的问题入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各个领域，并深入推进党内制度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突出强调共产党人要有政治意识和政治规矩，坚定信念，补好精神上的“钙”；强调按新干部选拔的标准和理念，从严治吏；强调强化党员的宗旨意识，增进同人民的感情；强调以高压态势惩治腐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等等。可见，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体现了严字当头，从严从实，从而使以往宽松的政治氛围得到了根本改善，党的形象和威信得到了重新塑造，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了大大提高。“严、紧、硬”成为党内生活的新常态。

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开拓了党的建设新局面，从严治党进入到全面和深化的历史新阶段，党内政治生态得到了有效改善。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得以彰显；通过反对“四风”转变党风运动，党内政治生态向健康状态发展；通过高压惩治腐败，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信心，也为维护社会公正公平增添了正能量；通过制度建设，将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里；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持续深入推进，党的建设面貌焕然一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党的建设呈现出以解决问题为导向，从严、从紧、从硬的新气象，在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全面打造适应新时代国家发展和党的中心任务要求的鲜明特点，从而为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提供了转变基础。

## 二、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的主要内容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和变化深刻的国内环境，坚持稳中求进，迎难而上，先后就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加强党的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策和部署，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全面梳理总结十八大以来的各项工作，可以

发现这些历史性变革主要集中在以下九个方面：

### （一）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担当精神、政治远见和顽强意志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过去一段时期内党的领导被忽视、淡化、削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党的领导得到全面加强，进而实现了全党思想上的高度统一、组织上的坚强团结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极大增强了党的领导、引领力、组织力、号召力。为了加强党对重要领域工作的领导，中央采取了许多非常有力的措施。如，十八大以来，国家先后成立了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小组、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等机构，负责对重要领域改革进行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为了加强党对地方的领导，国家制定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制度，如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等。为了加强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中央专门通过了《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此外，还进一步加强了党对高校、对基层农村等各地方各领域各行业的领导，提高了党治理国家的能力。

### （二）新发展理念得到切实贯彻

科学的发展理念是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实现更好发展的关键。十八大之后，面对世界经济和国内经济的复杂形势和不利条件，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国家对全党和全社会中存在的与新发展理念相悖的认识进行了深刻调整，对与新发展理念相悖的行为进行了全面纠正，对不适应、不适

合甚至违背新发展理念的做法进行了根除，由此引发了我国发展领域的根本性变革。如，国家加快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政府职能转变改革；持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加大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的力度，使国家经济发展走上了健康安全道路；不断开拓新的发展领域，“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战略的实施，拉动国民经济实现了新的增长；经济结构调整、新旧动能转换、精准扶贫、绿色GDP评价体系的确立等，推动中国经济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发展。这些重大举措的推进和重大成就的取得，不仅使全党、全国人民的发展理念得到了根本改变，而且推动我国发展从速度规模型迅速转向了质量效益型，从而实现了国家发展动力转换、空间拓展的重要目标，推动我国发展不断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方向前进。

### （三）全面深化改革持续进行

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国家启动了新一轮改革，目的在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出来，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起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让国家更加富强、更加繁荣，让人民生活更美满、更幸福。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的担当和勇气，持续深入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形成了一大批改革理论成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主要领域改革主体框架已经基本确立。据统计，十八大以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下召开了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三百六十多个重点改革文件，制定、推出了一千五百多项改革举措，推动国家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中取得

了突破性进展。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基本经济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加快转变，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制度、社会治理体制进一步完善，生态环境保护体制机制及制度不断建立健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在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上持续深入推进。

### （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中国所处时代方位和发展阶段的基础上，以本国国情条件为根本依据，以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抓手，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的新期待为出发点，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开辟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指明了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目标和方向。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首次专题讨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问题，对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和总蓝图、路线图、施工图作出了清晰的规划和安排，并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总目标，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工作格局出发，对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行了详细部署，率先以司法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探索依法治国条件下在法治轨道上用法治方式循序渐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经过几年的实践探索，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取得了卓著成效。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日益健全，立法体制逐渐完善，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成效显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已经得到宪法授权和认可，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各级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法治意识明显提高，社会公平正义不断彰显，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得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实践为基础，深刻回答了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向哪里走、跟谁走、走什么路、实现什么目标、如何实现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实现了新的飞跃。

#### （五）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导权，在正确判断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的基础上，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和方针政策，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网上意识形态工作，引导人们坚定理想信念，铸牢精神支柱，积极应对各种挑战，使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大大增强。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文艺工作座谈会、党校工作会议、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多次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要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在实践中，通过建立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了党对宣传舆论阵地的管理和监督；通过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中央巡视范围，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得到深入贯彻落实。十八大以来，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成绩斐然，社会思想舆论混乱状况明显改变，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更加巩固，中国梦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得到广泛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广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继承发展，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文化自信得到彰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意识形态领域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确立为奋斗目标，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继承并发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形成中国价值、凝聚中国力量。

#### （六）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突出强调生态建设的重要性，做出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并将生态文明建设上升至国家建设总体布局层面，使之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相并列，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从十个方面描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2015年，国家专门出台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同年，又将“生态文明建设”写入了国家五年规划之中。2017年，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党中央从实行史上最严格的生态文明制度着手，全面加强生态文明保护体制、责任追究机制、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建设，并全面加强生态环境整治力度，大面积淘汰落后产能，还将生态文明状况列入纪委重点巡视范围，使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治理。五年来，通过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状况明显改变。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积极推进；能源资源消耗强度大幅下降；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持续推进；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环境状况得到改善。从确立发展理念到完善体制机制再到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推向了新高度，美丽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 （七）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稳步推进

为了进一步增强军队战斗力，全力推进国防和军队实现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大决策。中央军委率先从开展军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入手，全面彻底地整治了人民军队的政治生态环



境,使军队面貌焕然一新,并在此基础上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塑人民军队的组织架构和力量体系,形成了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的新格局,提出了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重要思想,使军队治理方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些重大举措和重大工作,使人民军队中一度存在的不良政治状况得到明显改变,党对军队的领导权从根本上得到加强。五年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改革取得了丰硕成果。军队领导指挥体制改革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在领导管理体制上形成了“军委——军种——部队”领导管理体系;在联合作战指挥体制上形成了“军委——战区——部队”作战指挥新格局,为中央军委实施集中高效指挥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实现历史性突破,成立了军委纪委、军委政法委,调整组建了军委审计署,实现了巡视和审计监督常态化、全覆盖,调整了军事司法体制,保证军事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实现体系性重塑。军队规模更加精干,结构布局更加优化,力量编成更加科学,政策制度调整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军民融合发展迈出实质性步伐,武器装备投入、研究、制造加快发展,为开展军事斗争准备了硬件基础。十八大以来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成就及历史性变革对于增强改革信心、保持战略定力、矢志不渝走改革强军之路,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 (八)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开创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以及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核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不断推进下,外交布局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

化的态势,不仅开创了我国外交工作新局面,而且为国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五年来,国家致力于构建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实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欢迎发展中国家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并发起创办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亚信峰会<sup>[6]</sup>等,使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此外,党中央进一步明确了钓鱼岛和南海地区的利益存在,指出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决不允许触犯,并大力巩固和强化对核心利益的控制。如,党中央审时度势、精心运筹,主动开展钓鱼岛维权,积极加强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南海重点岛礁和海域的管控,取得了海权维护历史上的新突破;积极参加国际海洋互动活动,包括联合开发工程、项目,出席或参与论坛、研讨会和双边或多边海军演习,利用每次机会表明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问题上是一个诚实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为我国发展赢得了战略主动权<sup>[7]</sup>。

#### (九) 全面从严治党成绩斐然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上升到了治国理政重大战略的高度,在党的历史上属首次。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指引下,传统党建格局得到调整和完善,党的政治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放在了突出重要的位置,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一并得到了全面加强,特别是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开展,作风建设持久加强,党内政治生态得到了明显改善,政治生活气象更新,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

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政党。<sup>[8]</sup>五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把党建设好建设强”的问题,以顽强的意志品质、空前的力度持续推进理想信念教育、群众路线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以政治建设为党建工作的统领,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选人用人机制改革为着力点,加强组织建设,使“好干部”能够脱颖而出;以深入开展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严厉整治“四风”问题,使特权问题得到根本整治;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的标准和要求将开展反腐败斗争常态化,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向更深层次推进。这些重大工作和重大成就,使党内存在已久的一些歪风邪气得到及时矫正,一些难以治愈的顽瘴痼疾得到根治,党风政风得到根本扭转,政治生态明显变好,从而为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证。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永恒的使命,面对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依然将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的质量和效能。

### 三、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的多维特征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涉及到了内政、国防、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的深层次体制机制调整,无论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所言,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sup>[9]</sup>。

#### (一) 历史性变革是全方位的

“全方位”主要是从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变革的广度和范围来考察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国家改革发展战略,涉及内政、外交、国防各个领域,

这些领域的深刻变革及辉煌成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客观依据。在有限的五年中,全面深化改革涉及到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队、党建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仅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就多达38次,审议通过的重大改革方案有360多个,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共出台的改革举措达1500多项,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崭新局面。改革涉及范围广、出台方案之多、触及利益之深、推进力度之大前所未有。<sup>[10]</sup>全面深化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从总体上看,五年来,国家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人均GDP不断增加,对外贸易和投资稳居世界前列,高铁、高速公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总量均居世界第一位;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一批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城乡居民收入持续增加;国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空前加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出重要步伐。可见,五年来的历史性变革涉及到了国家各个领域、各个方面,是全方位的变革。

#### (二) 历史性变革是开创性的

“开创性”主要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变革的历史维度来考察的。通过纵向对比可以看出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是前所未有的,是极不平凡的。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看,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领域、国家事业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取得的成就、发生的变革,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宏伟目标,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历史任务及发生的变革相比,它是开创性的,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伟大变革。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程看,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领

域、国家事业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取得的成就、发生的变革，都是着眼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与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历史任务相比，它是具有开创性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看，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领域、国家事业各个领域所进行的改革、取得的成就、发生的变革，是着眼于回答新时代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相比，它具有与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完全不同的主题和任务。五年来，国家在发展战略、总体布局、经济体制、民主法治、国防外交、党的建设等方面都开创了新局面，取得了新成就。这些成就和变革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及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 （三）历史性变革是深层次的

“深层次”主要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深度和厚度来考察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无论从指导思想、思路观念，还是从方针政策、体制机制、社会氛围、外部条件、根本保证等方面均发生了全面的、深刻的、巨大的变化。如，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战略的提出和施行，使党在各个领域的领导从体制、机制、制度上得到了根本强化，过去一段时间党的领导被忽视、弱化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变；全面深化改革战略的实施，使阻碍经济活力和社会活力的体制机制弊端得到了彻底根除，国家治理体系逐步走向现代化模式；新发展理念提出和贯彻，使以往盛行的错误发展观念、粗放发展方式得到了明显改变；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制定和落实，使国家立法、执法、司法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立法、执法、司法领域存在的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的加强，使社会主义主旋律得到弘扬，全党、全国思想认识高

度一致，思想舆论环境中的混乱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变；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力推进，使人们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生存环境不断改善，以往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变；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改革的深化，使人民军队中存在的歪风邪气得到了明显改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的推进，明显改善我国在外交领域面临的不利状况；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贯彻落实，使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变。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之所以是深层次的，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变革所采取的措施力度大，还缘于这些措施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为目标，直指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是国家体制机制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因此，有的改革已经触动了国家现有体制，如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军队体制改革等都是对原有领导体制、运行机制作了实质性的变革和调整，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十八大以来的历史性变革，既深化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撬动了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从而使改革进一步朝着纵深方向发展。

### （四）历史性变革是根本性的

“根本性”主要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对未来发展产生的影响来考察的，它突出强调十八大以来的变革是在根源上、本质上产生的，这些变革将对今后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产生根本性影响和决定性作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方向性引领、全局性和长远性影响。比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又如，十八大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国家先后推进了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试点，探索设立了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建立了知识产权法院，设立了最高人民法院巡回法庭，开展了人



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建立了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人民法院立案登记制度、实行了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倒查问责制，推进了检务公开和狱务公开等司法公开制度，所有这些都是对原有司法体制的实质性改革。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军队领导管理体制和联合作战指挥体制改革等都是对原有体制进行彻底修正基础上建立了新的体制机制。而且这些变革都是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的，都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体制基础的，因此，十八大以来的改革是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领域体制机制的根本调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新时代。这些变化奠定了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坚实的体制机制及制度基础。

#### 四、党和国家事业历史性变革的实践要求

(一) 更加自觉地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五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科学指引。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以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宽广视野、长远眼光、高超智慧，思考和解决了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构成了逻辑严密、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思想体系，从而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化和升华至新的高度，故中共十九大将

其确立为我们党的行动指南。当前，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成功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深入把握其鲜明的继承性、创新性、时代性、指导性，始终坚信其科学性、真理性，努力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坚定性。只要全党坚持用这一科学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就一定能实现党在新时代确立的奋斗目标。

#### (二) 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原因还在于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在过去“分权式”改革过程中，党的领导不断被弱化，曾一度出现了中央决策难以落实的状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根本保证，突出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突出强调全党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将加强党的领导置于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方面着手，以根本割除党内存在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为目标，改革完善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面提升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十八大以来实施的全面从严治党重大决策及举措，纠正了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存在的模糊和错误思想认识，从政治、思想、体制机制及制度等各个方面全面加强了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党在思想上实现空前团结统一，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显著增强，党的战斗力和领导力显著提高，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拥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和政治保证。只要更加自觉地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能够取得新的胜利。

（三）更加自觉地维护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

领导核心是一个政党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形成的基础。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党的凝聚力、战斗力、领导力显著增强。习近平核心地位的形成，是全党的共同意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重大的历史性成就，之所以能够实现如此巨大的历史性变革，原因还在于我们形成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自担任总书记以来，习近平亲自兼任多个中央领导小组组长，对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充分发挥了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了这些方案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起到实效，夯实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思想一致、行动统一的政治基础，党的权威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当前，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异常复杂，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异常艰巨，对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深刻认识到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就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党中央权威首先就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的核心地位，并将这一认识贯彻在实践活动中，贯彻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必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始终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思考和处理问题，确保方向和立场正确坚定，确保局部与整体协调一致，切实打牢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思想认识根基。我们必须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更加扎实地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确保党的领导坚强有力。

#### 参考文献：

- [1][2][3][5][6][8][9]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Z].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5，8，9，13，6，50，7.
- [4] 朱大鹏，辛向阳.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成就和变革的历史性[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7（6）：20-26.
- [7] 袁赛男.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7（10）：39-43.
- [10] 林兆木.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N].经济日报，2017-11-06.

# 制度正义视域下的城乡低保制度发展 困境与原因探析

杨冬艳 李秋庆

(郑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河南郑州 450001)

**摘要:**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对全体居民供给的基本生活底线安全的救助制度,应体现国家和社会的制度正义性。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历了从传统的关怀式社会救助向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性社会救助的转换,经历了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探索与发展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进而实现了全社会低保制度的全覆盖。但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存在着发展不充分和不均衡的困境。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社会分化;城乡低保制度设计不合理;农村救助权利观及利益表达渠道欠缺;管理体系不健全;低保制度内部衔接困难;等等。

**关键词:**制度正义;最低生活保障;统筹发展

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是党和国家、政府和社会成员共同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1]</sup>新时代主要矛盾的表述既是对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矛盾的揭示,同时也为新时代社会发展指明了主攻方向,蕴含着解决主要矛盾的目标和途径,即要在新的征程上始终抓住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不放,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如何破解发展中的各个不平衡问题,成为政

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作为公正的发展”<sup>[2]</sup>,才更有利于健康、可持续发展。政府通过社会保障特别是低保制度,进行居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使社会中的劳动能力不足的贫困人群能够享受现代化建设成果,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发展稳定,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再添动力。推进城乡低保制度的均衡发展,对于增强民众公平正义的信念、提升民众在深化改革和发展中的获得感、增加民众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共同努力建设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国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其正义诉求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指由政府科学合理地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基础上,对实际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此标准的社会成员进行差额补助,使

作者简介:杨冬艳,女,湖北武汉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李秋庆,男,河南郑州人,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员工。

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都能得到满足的救助制度。<sup>[3]</sup>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中的基础和核心部分。普遍适用性是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一大特性，但也要进行整体规划，让有工作可以从事的得到收入补助，没有劳动能力的得到生活补助，让所有社会成员都能满足最为基本的生活水平。<sup>[4]</sup>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所必需的最低的物品和服务的标准被看作是绝对标准，在这之上的基本生活质量和发展的权利被看作相对的标准。阿马蒂亚·森提到，贫困通常表现为收入不能满足基本生活，但其身后更深层次的根本问题是可行能力的缺失<sup>[5]</sup>。所以社会机会、政治自由、透明性担保、经济条件以及防护性保障等是必须要强调的消除贫困的方法。不同程度下的“绝对贫困标准”和“相对贫困标准”对应了社会成员的不同层次的需求（见图1）。绝对和相对标准能否有效融合，不仅涉及到低保标准的制定，更关系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否到达目标。

最低生活保障是国家对全体居民供给的基本生活底线安全的救助制度，在大的范畴里可以归为公共政策领域的一种政策工具。公共政策的本质是对各种社会资源、社会价值的权威分配，因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国家对整体资源和社会财富的整理和输出。但是，它与其他政策工具有很大不同，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再分配的政策手段，要以保障人民的底线生活安全作为目标，必须含有价值理性的规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论是政策的制定、实施和评估都要把价值理性置于工具理性之上。

最低生活保障内涵着关注正义的价值追求而不应该只是被看作单纯的工具和方法，这也是国家作为伦理主体的整体制度正义的价值体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目标的设定、过程的实施、效果的监督都需要正义的行政价值指引，这体现的

是国家和社会存在的道德认知和偏好。最低生活保障倘若没有相应“公共精神”的伦理指引，必将异化为管制穷人的方法和怜悯弱者的工具，从而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sup>[6]</sup>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体现国家和社会的制度正义性。首先，保障范围应具有包容性与全局性。只要是人均收入达不到国家制定的统一标准线的社会成员，都应该无条件地被接纳为低保制度的救助对象。其次，区域内各部分间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成员数量要有协调性，各部分间的保障数量差异不能过大。再次，低保保障水平的供给要保持均衡性。均衡性是指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设定不同的保障水平，但差异过大时也需要国家进行适度调节。最后，要坚持低保制度内容设定的正义性。低保制度的内容是否合理影响到最终的救助效果，关系着国家把弱势群体成员拉出长期贫困的泥潭的政策效果能否实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属于公共政策范畴，它是政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提供安全保障的工具。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利益的分配，然而，正如前面所说，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再分配的政策手段，要以保障人民的底线生活安全作为目标，必须含有价值理性的规范。最低生活保障更多的是一个伦理问题，内涵着关注正义的价值追求而不应该只是被看做单纯的工具和方法，是国家和政府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也是国家作为伦理主体的整体制度正义的价值体现。政府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庄严承诺，必须实现而且必须不打折扣地全面实现，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政府部门要建立精准长效的脱贫机制，坚持“五个一批”分类施策的办法，“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



策兜底一批”<sup>[7]</sup>，确保贫困人口都能如期脱贫。没有贫困地区的小康，没有贫困社会成员的小康，就没有全面建成的小康。要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统筹发展，充分发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全面脱贫攻坚中的兜底保障作用，织好社会发展过程中居民生活水平安全保障的“底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助力全面小康奋斗目标的实现。

## 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及其困境

我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传统的关怀式社会救助向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制度性社会救助的转换，经历了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探索与发展到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立与完善，进而实现了全社会低保制度的全覆盖。但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存在着发展中的困境。

### （一）传统社会救济制度

我国的社会救助在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有体制特色的救助制度。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是“单位制”的劳动保障政策，也可以叫做单位保障，职工的生老病死原则上都由集体负责，但是没有工作单位的社会成员基本没有保障，比如农民只能在集体经济的范围内得到救助。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的经济整体发展得比较缓慢，不可能拿出过多资金投入社会救助领域来。国家采取了针对于少数如自然灾害和失去劳动能力的极端情况下贫困人员的救助方式。在出现自然灾害时，受灾群众只能依靠政府拨付救灾物资来渡过难关。还有一种情况是对于没有劳动能力的困难群众的平时救助，他们多是一些没有子女的老人和残疾人等，没有劳动能力从事生产工作，因此没有任何生活资料来源。让他们自己谋求生活的出路非常困难，也只能依赖国家帮扶解决。这个时期国家的救助形式比较单一，更多的是为上述提到的困难群众提供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食物、衣服等。在对孤老残幼的救助过程中形成了侧重

于针对没有劳动能力和生活来源的儿童、残疾人和独居老人的、比较规范化的“五保”制度<sup>[8]</sup>。计划经济时期的救助制度，总体来看，由于资金有限、救助水平相对较低，因而没有一个长期实施的扶助项目，救助时间短，操作也没有固定的规范准则，当灾害结束后救助活动也就完成了；没有一个全体社会成员可以依靠的保障网络，只停留在“救急不救贫”的层次水平。不过，国家提供的这种低水平的、相对完备的救助在当时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利益格局因为经济结构的调整与经济体制的改革而发生了根本改变。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分化出了新的社会阶层，也出现了新的贫困人群。同时，从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的层面来看，改革无疑是一个“去福利化”的过程，在国民原有的各种福利和救助项目如居住、卫生、养老、教育等单位福利被逐渐破除的同时，新的救助措施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原先计划经济体制中的社会救助制度已难以适应社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

### （二）城市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我国城市低保起步较早，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贫困成为一个突出社会问题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相对于传统救助制度，城市低保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救助制度，表现在国家根据居民生活状况所制定的基本生活标准，并据此对低于这一标准线的城市居民提供补差救助。1993年4月，上海市民政单位研究决定在上海市确定一条最低生活基本线，且该基本线可以随消费价格变化而相应改变。1993年5月，上海市民政单位又联合多个部门公布了关于从6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这一实践得到了国家民政部的关注和认可，城市低保开始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试点。上海、大连、厦门、福州、青岛和沈阳等6个城市于1995年基本设立了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此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其余

大小城市广泛建立,至1997年5月,我国已经有二百多个城市设立了这一制度。在得到基层的广泛实践经验后,国务院在1999年公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sup>[9]</sup>。这一条例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主体、财政资金支持、标准的制定、实施的对象、制度的落实原则、保障标准和程序、动态调整机制以及对行为失范的监管和违规处理办法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该条例的颁布实施,实现了我国由传统的社会救助向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转型——由传统道义救助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的社会救助。进入21世纪,我国城市低保制度进一步完善。从2003年起,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将救助对象的就业、医疗、子女教育等问题均纳入保障范围,促进了“综合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转型。至2006年,我国共有2240.1万城市居民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各级财政支付的低保费用总共达224.2亿元,2007年我国城市低保人数达到2270.9万人。<sup>[10]</sup>之后的十多年里,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至2017年底我国城镇低保标准平均水平达到540元。<sup>[1]</sup>

### (三) 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成功实施,也让贫困群众更多的农村地区看到了过有保障的生活的希望。为实现全面平等的救助权利和基本生活水平,农村也开始了低保制度的实施。山西省民政部门于1994年在阳泉市进行了建设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验。1996年,民政部根据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分别挑选了山东烟台、甘肃水昌、河北平泉这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点城市。20世纪90年代以来,广东、上海、浙江等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逐步进行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验。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农村低保制度要在经济较好的省份先建立起来,然后逐步推广至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6年底,农村低保制度扩展

到23个省级行政区,2133个县级行政单位落实了这项工作。如2006年河南省颁布了《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在调查研究和试点经验的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根据省内农村贫困居民的生活实际,制订了最低生活标准线,将生活水平低于该标准的群体都纳入了保障体系,而且对于实施的细则进行了规范说明。这是河南省第一次对省内农村低保制度实施各环节的全面制度规范。2007年7月,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文件规范了农村低保的目标任务、原则要求、保障标准、对象条件、操作步骤、财政支持、救助主体等内容,<sup>[11]</sup>标志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由城市向农村的全面推进,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社会分化迈开了关键性的一步。截至2007年底我国农村低保人数达到3566.3万,2009年达到4580万。

### (四)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困境

全面实施的低保制度体现了国家对贫困社会成员的责任,提升了广大城市和农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但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城市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长期以来以城市为中心的发展战略,导致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差异明显<sup>[12]</sup>。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资源再分配的政策手段之一,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二元化的境地。虽然近些年来,国家提出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或者称之为城乡一体化发展,但是这种政策的实施过程,是在原先的城市比乡村优越太多的基础上进行的,城市可以利用本身就有绝对优势的各种资源进行发展,这就造成了城市比农村优越性更强,从而使二者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大。所以,只有逐渐采取向农村倾斜的政策才能真正缩小差距。何况在低保制度的保障标准制定上,目前大部分省市的城市保障水平还是高于农村的。2017年底我国城镇低保标准平均水平为540元,而农村低保标准平均水平仅为358元。<sup>[2]</sup>城乡

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不均衡与不充分成为制约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最大阻碍。就目前来看,农村低保对象数量是城市低保对象数量的四倍多,但政府在资金拨付上却没有体现出向农村倾斜的趋势。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在财政支持下不断提高。事实上,政府在财政上的投入也是不对等的,城乡保障水平的绝对差额每年都在扩大。而推进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统筹发展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明确要求。为推进城市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统筹发展,必须深入分析导致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困境的原因,进一步完善和规范城乡统筹低保制度,真正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藩篱,彰显城乡低保制度统筹发展的正义价值。

### 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困境的原因分析

#### (一) 城乡低保制度设计不合理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救助的一个核心手段,本来是要起到一个对社会利益分配进行调节的作用,通过收入的二次分配或多次分配,平衡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过大差异,对社会发展起到一个稳定器的作用。但是在传统的二元发展理念下的低保制度的制定,就没有很好地体现这一政策制定的初心。低保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明显的城乡差异<sup>[13]</sup>,而且,到目前为止国家还没有出台社会保障法对社会救助工作进行法律规范,这就会造成地方在推进城市和农村低保工作的过程中容易区别对待,达不到制度设计的价值要求。从低保制度的内容设定到具体实施落实,各个环节都体现着城乡的明显差异,这主要跟制度设计之初的价值理念有关。如河南省农村低保设立得比城市低保晚,在制度、标准、管理体系、工作人员素质、监督机制等方面都没有城市低保发展得完善。

#### (二) 农村救助权利观及利益表达渠道欠缺

任何活动都必定是在其背后的伦理价值的

引导下进行的<sup>[14]</sup>,农村的低保制度的实施也不例外。在农村的传统文化中,自食其力的思想观念浓郁。有的农民感觉这是政府在做好事,并不知道救助权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部分,国家应该无偿为社会成员提供基本生活的安全保障;还有的农民因为强烈的自尊心而不愿意接受这份“关怀”,因为每次获得基本生活补贴都会按程序被“张榜公示”三次。当然,后一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少了,也有的甚至异化为救助依赖。

农村低保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失范问题。在保障标准的制定方面,上级政府部门要求基层各部门在深入调查研究、摸清实际情况之后科学决策制定低保标准,但是因为价值理念和知识素养问题或资金问题,许多基层领导自认为对基层状况烂熟于心,主观地认为自己的资源分配决策是为大局着想,从不进行调研走访和民主座谈,使得保障标准的制定沦为基层领导主观化、随性的产物。在保障对象的选择方面,农村社会更多的还是一种“熟人社会”,人们会按照有没有血缘关系或亲戚关系来确定保障对象在自己心中的地位。当迎来国家无偿提供的救助补贴这一利益分配时,基层干部可能在内心的道德、经济、人际多重因素决定的思维下,作出让亲近的人成为受益者的决定<sup>[15]</sup>,这可以称之为“关系低保户”现象。虽然遭受忽视的贫困群众在公正性监督的三次公示期间可以进行举报,但是由于缺乏权利意识和生活圈子的限制,绝大多数只能选择忍气吞声。可见,在农村这一多重标准、多重伦理价值交融的地区,低保制度最基本的价值理性被逐步淡化,工具理性变成了农村低保逐渐单一的特征。

#### (三) 管理体系不健全

低保制度的政策指导部门和具体管理部门是分开的,负责政策宣传和审批程序的一般是各县民政部门和各乡镇的民政所,而负责实际调研情



况汇报和低保工作平时管理的是村干部。这样真实的情况和决策部门掌握的情况有所差别、管理部门下达的决策和资金部署与实际的情况有所不同问题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比较分散,造成低保制度管理困难,因而需要一套更加复杂有效的管理体系。目前,城市低保制度和农村低保制度在管理体系上大致相同,但农村民主氛围不够浓厚,阳光度低也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使整个低保制度实施过程主观化<sup>[16]</sup>。许多制度或政策要求的监督管理机制到了农村变成了形式主义,规范性极差。在村民评议监督阶段,许多地方都存在所谓“简化流程”的做法。农村目前还存在着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网络化信息体系建设相对不发达、收入核查要素难以量化的困难,所有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城乡低保制度统筹发展的步伐。

#### (四) 低保制度内部衔接困难

因地制宜是指各地能够在总体政策统一性的基础上发挥地方的自主性,以更好地落实低保制度。但是,自主性下也会衍生出一些问题,如一些地方政府拒绝救助福利改革,撇开制度政策规范而去实行自己的“土方法”。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在落实低保制度这种社会救助活动的过程中,认为“这项工作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只是上面摊派的工作而已”,积极性不高,更难以使低保制度的政策价值本意落实下去。<sup>[17]</sup>各地不同的实行办法导致统筹工作的衔接困难,这种情况既体现在农村与城市间,也体现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农村之间。

低保制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十分复杂,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因此单单只靠民政部门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多部门的协同配合。国家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要求,国家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由民政部负责统一指挥协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中的各部门按照社会救助工作和自身工作的衔接程度负责部分任务的实施责任,

这些部门涉及民政、教育、财政、卫生、人力、城建、统计等职责部门<sup>[18]</sup>。但是有些地方同一地区众多部门协调统一解决问题的能力本来就十分薄弱,至于城市与城市间、城市与农村间、农村与农村间的多部门间的协作那就更加困难了。虽然少数一些地方在低保工作中带领多部门进行协作,但由于我国没有社会保障的正式立法,缺乏有效的责任监督,因而在实施效果上难以令人满意。

#### 四、结语

建设体现“正义”性城乡统筹的低保制度,必须正视城乡低保制度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针对问题的原因有针对性加以完善,充分体现低保制度城乡之间制度内容正义性、保障范围包容性、区域间协调性、保障水平均衡性等基本原则,并以公平正义为根植于内心的思想理念和基本价值追求,以秉持“公共精神”推进低保工作多部门协作配合为工作方法,真正做到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不让任何一位社会成员掉队。

#### 注释:

- [1]数据来源:2017年民政部《各省社会服务统计数据》。
- [2]数据来源:2017年民政部《各省社会服务统计数据》,2017年《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R].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017-10-18.
- [2]景天魁.社会公正理论与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7.
- [3]时正新.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51.
- [4]〔英〕柯尔.费边社会主义[M].夏遇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6.
- [5]〔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7.
- [6]邹海贵.社会救助制度的伦理考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5.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Z].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65.
- [8] 多吉才让. 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研究与实践[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62.
- [9] 祝建华.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评估与重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45.
- [10]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报告2008/9: 构建全民共享的发展型社会福利体系[R].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161.
- [11] 张浩淼. 转型期中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发展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0: 70.
- [12] 黄耀冬.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整合与优化研究[D].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位论文, 2017: 33.
- [13] 刘凤芹, 徐月宾. 谁在享有公共救助资源?——中国农村低保制度的瞄准效果研究[J]. 公共管理学报, 2016(1): 147.
- [14] 郑志龙. 行政管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328.
- [15] 杨穗, 高琴, 李实. 中国城市低保政策的瞄准有效性和反贫困效果[J]. 劳动经济研究, 2015(3): 61.
- [16] 宫蒲光. 充分发挥农村低保的兜底作用[J]. 行政管理改革, 2016(4): 33.
- [17] 祝建华. 缓解城市低保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政策研究[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52.
- [18] 朱亚鹏. 制度环境、自由裁量权与中国社会政策执行——以C市城市低保政策执行为例[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6): 162.



# 心理学视角下预防腐败问题探讨

彭丽丽

(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 重庆涪陵 408000)

**摘要:** 腐败问题是学界和政界一直以来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腐败的预防与治理,从政治学、社会学、党建等学科视角研究的多,从心理学视角研究的较少。从心理学视角研究腐败行为及成因具有明显的学科优势和视角优势,从心理学视角下预防腐败、解决腐败问题的发生,需要持续开展思想教育,从心理层面遏制腐败因子;需要及时对领导干部进行预防与惩治结合的心理干预;完善预防腐败的心理保障机制。

**关键词:** 腐败心理; 治理; 预防; 心理学

近年来,党中央在党政廉洁建设方面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中央反腐倡廉态势一直居高不下,这就是在传达一个信心,在立场态度上强调对腐败现象实行零容忍,做到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党中央反腐的决心和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目标不变,反腐败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几年间那些贪污腐败的毒瘤一个个剔除,法政建设逐渐完善;依法改革,依法治国理念深入人心;在国际上也受到了极高的重视与肯定。领导干部腐败的直接内因在于其腐败动机的形成,而腐败动机的形成是一个心理不断变化的过程,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就领导干部腐败问题进行探讨,有利于拓宽反腐败问题研究,为预防腐败找到新方法、新思路。

## 一、当前腐败问题的研究视角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不断加大,学界对腐败产生的原因分析也越来越深

入。腐败现象指的是公共权力的使用者为私人谋取利益的现象。当前对腐败现象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从政治学视角对腐败行为进行探究,“政治学视角下腐败行为、动机、解决对策方面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治、政治制度,将当前行政制度的瑕疵,行政效能方面存在可能导致腐败行为发生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和具体作用机制”<sup>[1]</sup>。二是从社会学视角对腐败行为和腐败现象进行探讨。三是从党建学科视角进行探讨。四是从心理学视角进行探讨。

第一,政治学视角对腐败行为及成因进行研究。刘炎、吴俊明(2018)从行政监督视角出发提出了治理腐败的对策建议。即主要加强法制建设,完善监督机制,突出对“人财物”的重点监督等。从政治学视角就腐败问题进行探讨,主要涉及到了反腐的相关体制和机制,如监督机制、监督保障、群众监督等问题;将官员腐败的主要

**基金项目:** 2017年度重庆市社科规划重大应用项目“十八大以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及其经验研究”(2017ZDYY4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彭丽丽(1987),四川省内江市人,中共重庆市涪陵区委党校讲师,研究方向为领导干部心理学、社会学。



动因归结于政治心态的扭曲,政治观念的变质,政治评价的困扰等。

第二,从社会学视角对腐败行为及成因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从文化与资本的关系角度,探究容易滋生腐败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如有从利益链角度出发,分析了腐败的成因及阻断办法,有从社会网络角度出发分析腐败与文化的关联性及其应对之策。文化的核心是一种观念,廉政文化的核心是廉洁意识,是腐败意识的对立面,一个领导干部如果具备了强有力的自制力和廉政意识,其个人是不会走上贪腐道路的。总之,社会学视角主要以社会文化、网络连接与腐败的关联度作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与腐败的因果关系及防治腐败之策。

第三,从党建视角对腐败行为及成因进行研究。党建视角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公仆理论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没有任何特权,而要治理腐败就要加强党性教育,全面从严治党,让领导干部用好手中的权力;积极开展党内马克思主义教育,提高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和道德水准,让各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宗旨观和权力观。

第四,从经济学角度对腐败行为及成因进行研究。有学者认为,官员的腐败受到了市场经济商品交易原则的侵蚀,受到了互惠主义因素的影响,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或者个人通过向官员输送一定利益是诱发官员腐败的关键性因素。

第五,从心理学视角对腐败行为及成因进行研究。主要涉及到墨菲定律、破窗效应、不平衡心理等几种容易导致腐败发生的心理现象、彼得原理、责任分散效应、搭便车效应等与腐败发生的关系。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有一段陈岩石的孙子小皮球与侯亮平的对白,侯亮平认为小皮球在学校有“受贿行为”,小皮球反驳到,如果自己“不受贿”,就会被班上其他同学孤立。这段对白其实在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前部分领导干部

的从众心理。

## 二、从心理学视角研究腐败行为及成因的优势

### (一) 学科优势

目前学界对腐败问题的研究和阐释,涉及到了多学科,但从心理学视角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比较少。从心理学视角出发,对腐败主体的心理变化、腐败行为的发生机制、腐败动因等进行追踪研究,官员腐败的过程也是其心理不断变化的过程,官员的腐败与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从心理学视角对腐败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探讨,有利于拓展心理学的研究范围,整合心理学研究的现有资源,实现心理学研究与解决腐败问题的双重效能。

### (二) 视角优势

在心理学视角下,对腐败的研究会更具有理性的认识。作为腐败主体的领导干部,受到内外多重心理因素的影响,最终迈上了贪腐的第一步,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在腐败的泥潭越陷越深。心理学以个体的人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索腐败的形成与人心理层面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刻认知滋生腐败的内在动因。可以看出,腐败的形成是一个内外因素综合的过程,外因包括腐败主体所处的人文社会环境等,内因主要是腐败主体本身;腐败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由部分质变到认知结构总变的过程。在腐败的过程中,腐败与腐败心理的形成具有过程的同一性,内因决定外因,探究腐败行为的心理动因对于研究和预防腐败具有明显的视角优势。

## 三、心理学视角下腐败的治理之策

个人的主观因素是腐败滋生的内因,因此抑制腐败行为首要的是加强思想道德防线的守护;针对腐败机会的存在,对领导干部进行预防与惩治结合的心理干预;针对领导干部的内在不良需求以及腐败成本较低等问题完善,建立预防腐败的心理保障机制。

### (一) 不断加强思想教育,筑牢思想根基

心理学认为,领导干部在思想层面的防线失

守会滋生腐败动机。多数腐败分子在落马后的忏悔中会说到自己忽视学习，特别是放松了政治理论学习。因此，务必要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端正权力观、政绩观，强化求真务实的精神和真抓实干的作风。一要解决好“信”与“疑”的问题。用好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这个有效制度，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采取学、讲、议、评等多种形式，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让党员干部对利欲诱惑等不正之风有足够的抵御力量。二要解决好“公”与“私”的问题。加强党章党纪党规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研学力度，开展公权与私利的讨论，引导党员干部时刻将党的纪律规矩挺在前面，做到存公去私，拒腐防变。三是在思想教育的过程中要及时进行利他主义价值观教育，使得领导干部明白规范使用权力，保持清正廉洁是对自己、家人和他人最大的爱护，是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途径。四是持续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特别注重反腐倡廉教育的前瞻性和创新性，避免形式主义和照本宣科式的教育，最大限度地预防腐败的发生。五是改进党员教育培训工作，创新形式、完善内容，增强教育培训的亲合力、感染力和渗透力，使党员对党的理论入脑入心，做到真懂真信真用；增强党员意识和团队精神，教育引导他们讲真话、讲实话，热心帮助提醒周围同志，使相互间的帮助提醒春风化雨、入脑入心，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

## （二）优化领导干部心理建设

### 1. 强化廉政文化的心理认同

腐败文化是那些能够为腐败进行论证，帮助腐败现象滋生并且发展蔓延的文化，它诱使某些人对于腐败的理解、认同乃至接受，出现崇尚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政治信念动摇、人生信仰迷茫的现象。丹麦、瑞典、挪威、新加坡等国家的清廉指数很高，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公民都遵循和践行着普遍认可的廉

政文化。廉政文化在政府清廉方面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全社会中积极培育廉政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无疑成为预防腐败的重点工程；积极促进把廉政文化建设的要求转化为政策、制度及规章，用政策、制度及规章体现廉政文化。

### 2. 努力消除不良心态

在消极的心态驱使下，权力的大小决定着人影响力的大小，权力大的人甚至能够控制权力小的人。很多官员迈开腐败的第一步是长期受到不良心态的驱使，让扭曲心理绑架有机可乘。目前官员的不良腐败心态主要有：千里做官、只为吃穿；上面有人罩，不怕被人告；既然湿了鞋，干脆洗洗脚，消除这些不良心态要有“提前量”，“应在领导干部还没有具备腐败倾向的态度或者这种态度还没有稳定的时候提前对其进行廉政教育和引导，领导干部在主观上也需要改变潜在的不良心态，遏制腐败动机”<sup>[2]</sup>。

### 3. 打造自律心理防线

腐败的初始状态使腐败分子思想防线的失守，其次是各种腐败行为，再次是更大的腐败行为或者落马。也就是说，思想防线的失守处于腐败行为之后，那么抑制腐败行为就必须让领导者形成自律的心理防线，使不想腐成为领导干部的思维习惯和价值取向。道德自律的实现是一个长期实践的过程，其首要表现是强化自我约束，以强有力的自制力抵挡利益集团的“围猎”。具体而言，打造自律的心理防线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自觉同特权思想作斗争。由于一些领导干部缺乏对公共权力的道德认知，没有树立好正确的权力观，价值观很容易发生偏离，特权意识和特权思想会越来越强烈。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经常剖析自己思想，检查自己动机，反省自己行为，思量自己工作，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敬畏权力而不迷恋权力，在坚决贯彻上级决策和方针的同时，保持对权力的一

种审视，只有常怀敬畏之心才能慎待权力而不迷失，才能尽心为民而不懈怠。

二是积极主动接受监督。腐败分子在“第一次”得逞之后，对贿赂的人逐渐会丧失警惕性，也缺乏被监督的意识。因此，积极主动接受社会各界人士的监督是预防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积极主动接受监督，需要领导干部自觉参加双重组织生活，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以闻过则喜的态度对待他人的批评；积极主动接受监督，需要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积极主动接受监督，需要领导干部自觉遵守纪律。要正确对待组织，对待别人，对待自己，遵守组织纪律，强化组织意识，接受组织的安排，贯彻组织的决定，维护党的威严。

三是消除权力崇拜心理。个体的人只有具备健全健康的人格才会适应现代化的进程，而权力崇拜心理无异严重阻碍了人的现代化进程。人在做、天在看，不管是谁，一旦有权力崇拜心理，就会不畏法律，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最终会犯罪入狱，走上一条不归路。消除权力崇拜心理，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用法，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观念，自觉弘扬和践行法治文化，运用法治思维做好群众工作，增强执政本领。

四是端正道德观。主动向道德楷模和先进模范党员学习；不断增强公仆意识和抵制诱惑的能力。德可以弥补才能与学识的不足，但才能和学识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空白，各级领导干部作为人民的勤务员，必须首先学会做人，做好人，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做一个有高尚品德的人。政德就是从政之德，是党员干部在从事公务活动中应当遵守或者遵从的原则、美德、品性，是一个党员干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综合体现。经常用正面的道德典型激励自己，经常用反面的事例警示自己，经常用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要求自己，自觉遵守基本道德规范，带头实践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道德。

### （三）建立预防腐败的心理保障机制

#### 1. 建立领导干部合理的需求机制

“人的心理状态是一种结构化式的状态”。<sup>[3]</sup>领导干部对于自身合理的需求，可以主动向组织反应，组织上应关爱领导干部，对于干部合理的需求在第一时间予以帮助和解决；对于不合理的需求，组织上要及时关注、及时提醒，领导干部本身要自觉抵制，提倡勤奋工作，多劳多得。

#### 2. 强化权力监督机制

引导党组织发挥组织生活的纠偏功能，抓好党员队伍的日常管理监督，经常性开展谈心谈话，把握党员思想脉搏，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开展思想交锋，使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力争把问题和矛盾解决在日常、消灭在萌芽状态。对照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突出问题导向，逐条逐项细化工作措施，对违反禁令踩“红线”、闯“雷区”的行为零容忍，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曝光一起，以制度的刚性约束确保作风建设长效化、常态化。完善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领导干部约束机制，通过开展领导干部任前廉政培训、廉政谈话、上廉政党课、撰写《廉洁自律承诺书》、年终述廉、评廉、考廉等措施，研究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负责人的监督制约。

#### 3. 破除人民群众监督的心理困境

目前人民群众在监督方面受到主客观一些因素的影响，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不够。一些人民群众认为，腐败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与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反腐与腐败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大，自己的收入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因此对腐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一些人民群众认为一些出问题的官员与自己是同事关系或者上下级关系，举报他人不会为自己带来任何政治经济方面的好处，于是对他人的腐败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一些人民群众发现贪官虽然触动了自已的利益，但



考虑到贪官曾经也为自己或则他人做过好事，于是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破除人民群众监督的心理困境，需要积极培育民主意识。通过加强教育、广泛开展宣传的方式进行，比如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报纸、电视台等，开设一些介绍人民监督重要性、作用、方式等内容的栏目，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认知程度，认识到自己的主人翁地位，应该积极行使自己的民主监督权利，从而提高其主动参与的意识。通过公民民主意识的培育，一方面可以在公职人员中真正确立起“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的监督的思想观念；另一方面

也可以唤醒普通民众的监督意识。

破除人民群众监督的心理困境，要丰富人民群众参与反腐的形式。既要有电话、网络、书信等举报方式，也要有公众调查、听证会与人民群众监督的三位一体方式；既要让人民群众参与干部选拔的全过程，也需要推进政务、党务公开，让群众代表参与决策的全过程，让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监督和评判管党治党全过程。

#### 参考文献：

- [1] 马晴.腐败行为心理机制与相应反复策略研究[J].法大研究生, 2017(2).
- [2][3] 刘爱卿, 许欢.行政文化嬗变下的腐败心理及治理[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7(1).



## 试论屈原诗歌的政治意境

谢作文

**内容提要：**屈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崭新时代。屈原开创了一代新的诗体——楚辞。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些都是屈诗对中国诗歌的重大贡献。本文认为屈诗除了在诗歌创作艺术上的贡献之外，更多的是其富有强烈的政治意境。屈诗爱国爱民、坚持真理、匡扶正义、宁死不屈的精神，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屈诗的政治意境是屈原诗歌影响力之广之大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屈诗 政治 意境

屈原，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诗的出现，它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崭新时代。屈原开创了一代新的诗体——楚辞。他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限度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这些都是屈诗对中国诗歌的重大贡献。正是这样，古今中外的诗词家、诗评家对屈诗的评价超乎异常，认定他是“可与日月争光”的伟大诗人。我认为屈诗除了在诗歌创作艺术上的贡献之外，更多的应该是他的诗作富有强烈的政治意境。他爱国爱民、坚持真理、匡扶正义、宁死不屈的精神，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是更加的强烈更加的明显。所以，屈诗的政治意境是屈原诗歌影响力之广之大的根本原因！

屈老夫子的诗作，所思所想的是国家强盛。我们知道，屈原生活在战国末年。这是个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风云变幻无常，文化虽极为灿

烂，但思想却极为复杂。社会开放、政治开放、文化开放，这便造就了这个时代善思维、求知知识，好争辩的学术氛围。这样一个理性精神高扬的时代，便为屈原诗歌政治意境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合情合理的政治背景。屈原出身于楚国的一个贵族家庭，他生活的年代正逢楚国由盛转衰的时期。春秋战国周王朝从衰微走向瓦解，诸侯各国之间为了争夺政权，战乱连连，其中获益最大的是楚国，它从一个极小的“蛮夷”之邦，通过南征北战变成“方圆五千里”的大国。然而，到屈原时代的楚国却陷入内忧外患，在强秦多次侵伐之下，国运日渐衰弱，屈原满怀政治热情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然而在政治变革的激烈斗争中，改革派的举措不符合楚国贵族集团的利益。他有满腔的热情和远大的理想，但浑噩的现实却让他动辄受阻，生命感到极大的束缚和不自由，于是他把满腔的激情和深刻的反思投注到了他的诗歌创作之中。屈原在他的诗歌中主张“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奉先功以

---

**作者简介：**谢作文（1952—），男，湖南临湘人。大学文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理事，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研究员。现任岳阳市诗词协会会长，岳阳市散曲研究会会长。

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国富强而法立兮，属贞臣而日嫉”（《九章·惜往日》），也就是举贤任能，立法富国。楚国本是当时的大国，但由于楚王的昏庸，致使政治日趋黑暗，屈原的治国方案就是挽救楚国命运的良药。细读《离骚》，我们可以感触到诗中充满了诗人不懈追求政治理想的热情。“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为了楚国的强盛，屈原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但总是难以如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还体现在他对祖国的眷念和忧虑上。他在《橘颂》中歌咏橘树“不离故土”之秉性，表达自己热爱祖国的情愫。“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离骚》），屈原出生于楚国，与楚王同姓，对楚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他把个人和祖国联系在一起，所思所想的永远是国家的前途、永远是国家的命运：“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时代，才士游历列国，以谋求功名富贵，施展政治抱负，已成为风尚。而屈原宁肯长眠于汨罗江水之中，也不愿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一门心思想的是自己的国家如何安稳强盛。

屈老夫子的诗作，所怜所悯的是平民苍生。屈原对于平民百姓是无比的关心、无比的热爱。在屈诗中同样能够体现得出来。如他在深入平民百姓之中后，了解到了“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深情地发出了“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感叹（《离骚》）。他深知人民的苦难，希望有所作为，以拯救平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当他看到黎民百姓在战乱中遭受苦难时。他怨天恨地，责怪上天不应该这样对待地上的生灵，为什么要用战争来惩罚人们的罪过，使百姓妻离子散彼此失去联系！在万分痛苦之中，他挥泪长恸写下了不朽的诗篇：“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

夏以流亡。……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哀郢》）。从这些诗作中可见屈原爱民之心之一斑。同时，读屈原的诗作，我们从诗歌中出现的大量的带有楚国地方色彩的衣食名物及娱乐等方面的内容，也可以看出他与平民百姓有着甚深的交往。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离骚》），句中的“芰荷”、“木芙蓉”，就是富有地方特色的植物。像这种具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的诗作，在屈诗中到处可见，正如宋人黄伯思所说，屈诗“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正是这样，他的不少作品是从平民百姓的审美眼光来进行描写的。现在的话来说是来自生活，来自百姓。淳朴贴近，也是屈原接近平民百姓的有力证明。他认识到人民的苦难，体会到人心向背的磨难，并为此大声疾呼。屈原从平民百姓的利益出发，时时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为实行“联齐抗秦”，他不辞辛劳地出使齐国，为追求和平，让百姓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他呕心沥血地上下求索，甚至不顾个人生命安危的逆流抗争：“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离骚》）。屈原正直伟岸，在生死存亡、大是大非面前，他坚持原则，绝不与佞臣同流合污，也绝不随波逐流。他的一生是悲剧性的，但其壮丽的诗篇中，强烈地表现了自己的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政治主张和政治意识。

屈老夫子的诗作，所追所求的是至善真理。屈原作为一个政治家，立足于自身美德和才干的修养，要为社会和国家建功立业，这是无可非议的。屈原在《离骚》中采集和佩戴各种芳香的花草，就足以证明他是追求美好事物的。他刻意集内美与修能于一身，立志于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如前所述，屈原所处的时代，是理性意识普遍高扬的时代，在整个社会对美好与丑陋进行清醒的鉴别并自觉地进行自我道德修养的同时，义无反顾地追求理想、追求真理，对阻碍自己理想、违背客观真理的假丑恶行为进行不

屈不挠的抗争，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忠于信仰，追求理想，不折不挠，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有识之士的精神主流。屈原无疑是这一壮丽时代的巨人。屈原诗歌中宏伟远大的理想，上下求索的“天问”、“绝地通天”的神游，都与战国文化中宏阔的充满创造力的思维、自由的文化精神是相通的。他作为战国时代士大夫中的一员，自觉肩负起改变无序的社会面貌的巨大历史使命，要在楚国实现自己的梦想。屈原的诗歌获得了一种对于宇宙、人生的深沉的思考，由此产生的一种理性的自觉，使得他不断反思自我，反思和批判人类历史以及楚国的社会现实，努力追求的是至善至美的真理和远大的理想。“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这表明了屈原只要合乎美好的理想，纵然死掉九回他也不会懊丧。表白了自己追求真理的决心和壮志。不论世事如何变幻，情况有多复杂，“吾不能变心以从俗兮，故将愁苦而终穷”（《涉江》），这就是说，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他的鸿鹄之志。他深知改革强国的路程遥远而又漫长，需要“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哪怕这条路纵有千难万险，“余将董道而不豫兮，固将重昏而终身”，“苟余心之端直兮，虽僻远其何伤？”（《涉江》），在屈原看来，他也要扼守正道毫不动摇，宁可终身处于黑暗之中，就是被放逐到偏僻遥远的地方，也毫无妨碍、在所不辞。从这些诗句中，看得出屈原对真理追求的态度和决心。

屈老夫子的诗作，所憎所恨的是腐败黑暗。楚天楚地，得天独厚，位居南方，钟灵毓秀，人与自然亲密无间，自然界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都可以进入到诗人的视野，都可以牵动着诗人的神经。“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湘夫人》），意为秋风缓缓吹过，袅袅如烟，洞庭湖的水波幽幽漾起，风吹下的秋叶落入湖面水中，美不可言；“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九歌》），意为鸟儿栖息在屋檐之上，水儿回旋在华堂之前，天地自然合一，美不胜收。从这些诗作中，不难看出这是屈原用浓墨重彩的画面向读者勾勒出来的诗歌意境，是自然景物流露出来的一种人与自然的亲切之感。然，如此美好的大好河山，却每况愈下，不时遭到外来侵略。面临着国破民亡的处境，屈原无时无刻不是痛心疾首。而腐朽无能的楚国统治集团、庸碌昏君，则贪婪成性，屡次误中秦国之计，得不偿失；楚怀王利令智昏，利用佞臣、宠爱南后、排挤忠臣、陷害良将，致使朝政无纲，国是日非。屈原见状，曾多次进谏，要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屈诗中的所谓“循绳墨而不颇”（《离骚》）等诗句，讲的就是修明法度，限制旧贵族的特权。反映了屈原与楚国腐朽黑暗势力的尖锐对立，表达了他革除弊政的进步要求。屈原虽遭谗被疏，甚至被流放，但他始终以祖国的兴亡、百姓的疾苦为念，希望楚王幡然悔悟，奋发图强。“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离骚》）。他明知忠贞耿耿、正直敢言会招致祸患，但却始终还是忍受着打击并从来未停止进谏。显示出来的是屈原坚持正义，因难而上的精神品质；显示出来的是屈原勇于牺牲，敢于斗争的大无畏精神；显示出来的是屈原蔑视权势，憎恨昏君的政治态度。



# 屈原诗学与忧乐情怀

周文渊

**内容提要：**本文从忧患意识、爱国情结和时代价值三个思想范畴的方面剖析忧乐情怀与屈原诗学之关系，说明忧乐情怀本是屈原诗学的本质内涵之一。

**关键词：**屈原诗学 忧乐情怀

屈原诗作的学问很深，包括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两个范畴。本文试从忧患意识、爱国情结和时代价值（都属思想范畴）三个方面探讨忧乐情怀与屈原诗学之关系，认为忧乐情怀本是屈原诗学的本质内涵之一。提倡忧乐情怀对于学习和传承屈原诗学，促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时代价值。

## 一、忧乐情怀彰显了屈原诗学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指一个人的内心关注超越自身的利益、荣辱、成败，而将世界、社会、国家、人民的前途命运萦系于心，对可能遭遇到的困境和危难抱有警惕的思想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民族，在千百年生存发展进程中，始终强调“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强调未雨绸缪，防患未然。《诗经·小雅》中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这是对“忧患意识”典型的文学描述。王泽应在《屈贾忧乐精神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一文中指出：“屈原和贾谊是中华忧乐精神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自觉地将自己与其所属的国家民族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国家的强盛和民族的福祉作不遗余力地奋斗求索，同

时也有一种‘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深刻的忧患意识。”

屈原的忧患意识表现为他对国家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危机感和神圣的使命感，并在他的作品中强烈地宣泄和表现出来。从《离骚》、《九章》、《九歌》至《天问》、《招魂》，都充溢着这样一股哀怨忧愁的情调，其忧患意识被升华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审美传统流传下来，为后人敬仰和爱戴。

屈原的忧患意识来源于他的政治理想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尖锐矛盾而造成的严重心理失衡。在屈原的代表作《离骚》中，忧国忧民的情感表现得炽烈而深沉。在楚国皇室苟且偷安、耽于享乐时，屈原“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离骚》）。屈原前后奔走，希望君王能居安思危，常存忧患之心。“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离骚》），在楚国贵族们贪婪不满足、不理朝纲时，屈原头脑清醒，焦心如焚，担心楚国政权因为朝政的荒废、政风的贪婪享乐而最终被颠覆，于是积极主张变法图强，以拯救逐渐走向衰落的楚国。“长太息以掩涕兮，

**作者简介：**周文渊（1949-），男，湖南岳阳人，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省诗词协会理事，岳阳市诗词协会驻会副会长，岳阳市散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哀民生之多艰！”（《离骚》）他把个人的荣辱生死置之度外，即使赴汤蹈火、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所再。”

（《离骚》）特别是他的政治抱负不被见用而遭到放逐的困难情境下，他仍然魂牵梦绕的是国家和人民。面对郢都陷落，山河破碎，人民流离，饱受战争饥寒交迫之苦，诗人腹内如绞，老泪纵横，神思恍惚：“心婵媛而伤怀”、“怊荒忽其焉极”（《九章·哀郢》），“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九章·抽思》）。他甚至为之哀伤欲绝，诗中尽情发泄他的痛惜与愤慨：“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九章·哀郢》）

“忧乐情怀”虽不排除“乐”，但确是以“忧”为主的。范仲淹说得清楚：“是进亦忧，退亦忧”，从这个意义上说，忧乐情怀主要就是指的一种忧患意识，屈原诗学正是彰显了这种忧患意思。

## 二、忧乐情怀深化了屈原诗学的爱国情结

南宋朱熹彰扬屈原有“忠君爱国之诚心”。（《楚辞集注》）清·林云铭称赞屈原说：“屈原全副精神，总在忧国忧民上。”（《楚辞灯·离骚》）屈原是名符其实的“爱国诗人”、“人民诗人”。

爱国才生忧患，忧患才会爱国。屈原正因为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才存有浓郁的忧患意识。

——忧国忧民才追求“美政”。屈原主张明君贤臣齐心协力共兴楚国，改变楚国的政治和社会的现实，使楚国强大起来。“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离骚》）。所谓“举贤而授能”，就是不分贵贱，把真正有才能的人选拔上来治理国家，反对世卿世禄，限制旧贵族对权位的垄断。《离骚》中列举历史事实极尽“举贤而授能”的必要：“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吕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举。宁戚之讴歌兮，齐桓闻以该辅。”历史上，傅说、吕望、宁戚原本是地位低下却很有才能的人，后来他们都

为各自的君主完成了杰出的事业。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就是修明法度，即法不阿贵。“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离骚》）。屈原“美政”的另一主张，就是看能否解决民生疾苦问题，能否致民于康乐之境。如果没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能提得出这样的“美政”主张吗？

——忧国忧民才与朽抗争。“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离骚》）“心纯嘏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惜往日》）面对小人误国，诗人忧心忡忡，无论何时何地，屈原都不愿违背“正直”之心，不与世同流合污：“苏世独立，横而不流。”（《橘颂》）“世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九章·涉江》）“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渔父》）在受到严重政治打击被流放时，仍坚持与世俗抗争；“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九章·渔父》）

——忧国忧民才念国不舍。在当时“楚才晋用”的时代，以屈原的学识才华，完全可以像张仪、苏秦那样去别的国家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深深地眷恋着楚国，一心只想使楚国走上富强之路，统一天下。尽管他本人遭遇不公，也不愿背弃祖国，甚至不舍离开故土。“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意思是说：脚下是我的故土，我的车夫哭了，我的马也不走了，我怎么能割舍得下呀！他仍然担忧楚国的存亡和人民的疾苦，舍不得楚国这片热土。

——忧国忧民才投江殉国。面对政治理想的破灭和楚国的衰败，屈原无力回天，决心效仿殷代谏君不成、投水而死的贤人彭咸，以一死来殉他的祖国。“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怀沙》）他写下“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怀沙》）纵身

跳入汨罗江。屈原是因忧国忧民到了极点才投江殉国的。屈原之死，升华了他的人格，将他的爱国情怀表现到了极点。梁启超在他的《屈原研究》中感叹说：“屈原为自杀故，越发不死！”

### 三、忧乐情怀提升了屈原诗学的时代价值

首先看精神价值。彰显忧乐情怀的屈原诗学无论对人物、对地域，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其精神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中华儿女作为《离骚》、《九歌》养育的后人，从屈原诗学中的忧乐情怀汲取精神力量，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名人。如贾谊作《吊屈原赋》，以屈原自比。司马迁从“屈原放逐，乃著《离骚》”（《史记·太史公自序》）的事迹感染，撰写了浩繁如海的不朽著作《史记》。李白“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受到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影响，把浪漫主义诗风推向历史的顶峰。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戏为六绝句之五》），受屈原忧国忧民情情怀影响，写下了《三吏》、《三别》等反映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不朽诗篇。白居易受其影响，生发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新制衣裘》）的怜悯之心。爱国诗人陆游受其影响，在“僵卧孤村”的暮年，还做着“铁马冰河”（《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的征战梦，以至临终都念念不忘“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示儿》）。文天祥能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的豪言壮语，也受到过屈原诗学的感染和影响。这些人身上都可以看到屈原忧乐情怀的“影子”。且，屈原的忧乐情怀和诗学精神感染了中华大地，进而冲破国界，感染了整个世界。据悉，屈原的作品传播到朝鲜半岛，“高丽文人墨客争先恐后地谈论‘诗变为骚’，手口不离楚辞作品。那些为高丽王朝矢志不渝的诸多名人达士，更加尊崇屈原忠贞不二的精神和独立不迁的人格，把楚辞当作精神支柱。”<sup>[1]</sup>又如前苏联学者费德林曾主持

翻译出版俄译本《屈原诗集》，对于屈原诗篇及其忧乐情怀的世界文化价值有十分明确的肯定态度，他说：“屈原诗篇有着固有的民族特色，然而也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屈原的诗歌是全人类的财富。”<sup>[2]</sup>

其次看物质价值。按照精神变物质的哲学论断，忧乐情怀和屈原诗学这样的精神财富注定要转化为可观的物质财富。如屈原的事迹催生了一个端午节，催生了龙舟赛、吃粽子、插艾蒲等习俗。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县以上龙舟赛竞渡点就有506个，其中湖南多达89个。在市场经济中，人们重视龙舟竞渡的经济作用，于是“龙舟搭台，经贸唱戏”也就应运而生。岳阳市2017年与所属汨罗市人民政府联手，以政府名义举办了“屈原杯”龙舟邀请赛，共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千多名境外朋友参加，国内外临场参观者达600万人次。累计商品成交金额达50点6亿元，签订“三资”项目合同286个，引进利用外资3点8亿美元。以纪念屈原为宗旨的龙舟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岳阳市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

忧乐情怀过去和现在提升了屈原诗学的精神价值和物质文明，将来仍将继续发挥不可估量的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强调：“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要一以贯之”，“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我们正处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强，风险系数不断加大，更是要求我们学习和传承屈原诗学精神，先忧后乐，团结求索，才能完成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任务，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参考文献：

- [1]金宽雄、金东勋，《中朝古代诗歌比较研究》，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2005。
- [2]费德林，《论屈原诗歌的独特性与全人类性》，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第93页。



# 加强地域文学名家研究，拓展近代文学研究空间

——中国近代文学高峰论坛暨全国首届吴敏树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张乾坤 任先大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 湖南岳阳 414006)

**摘要:** 2018年9月14至16日湖南理工学院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高峰论坛暨全国首届吴敏树学术研讨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会。与会嘉宾围绕近代文学名家及其他若干重要问题, 吴敏树生平活动、诗文创作与文学观念等展开了深度研讨, 气氛热烈, 成果丰硕。

**关键词:** 近代文学高峰论坛; 地域文学名家; 吴敏树; 意义

为了充分挖掘地域文化资源, 深化地域文学研究, 助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 同时也为了拓展研究对象, 提升中国近代文学研究水平, 2018年9月14至16日湖南理工学院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高峰论坛暨全国首届吴敏树学术研讨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参会。此次会议由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湖南理工学院与中共岳阳县委、县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由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和中共岳阳县委宣传部承办, 由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岳阳县吴敏树文学研究会协办。与会嘉宾围绕近代文学名家及其他若干重要问题, 吴敏树生平活动、诗文创作与文学观念等展开了深度研讨, 气氛热烈, 成果丰硕。

一些学者对姚鼐、曾国藩、王闿运、易顺鼎、陈衍、王韬、姚民哀等近代名家进行了专题探讨。吴微(安徽师范大学)考察了姚鼐的“古文辞”概念, 认为从方苞的“古文”到姚鼐的“古文辞”, 内涵并无扩容, 但将古文与骈文并

联, 既是姚鼐针对古文创作的“纠偏之举”, 也是其主张打破文体壁垒, 倡导“文体互渗”与“文体融通”的一种文体自觉。王澧华(上海师范大学)考证了《铜官感旧图》上的“援溺”公案, 认为宣统二年(1910)石印出版《铜官感旧图》中“感旧”之说是章寿麟之子为了顾及曾国藩的情面、“三次挖补”“援溺”二字的結果。

“援溺事件”的见证者李元度明知该图为《铜官感旧图》, 却多次声称“援溺图”, 意在为章寿麟张扬功勋。吕双伟(湖南师范大学)分析了湖湘诗派领军人物王闿运“本情重兴”的诗学观念, 认为他重视诗歌抒发性情及其比兴寄托功能, 既是对汉魏六朝诗歌审美特性与审美理想的回归, 也与湖湘地域重视辞赋的悠久传统有关。王闿运在近代诗坛主张“重情尚兴”, 与现代文学的主情论不谋而合, 相得益彰, 共同推动了古典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过渡。朱银花、刘红麟(湖南理工学院)解读了易顺鼎词中的“秋士之悲”和“羈

---

**作者简介:** 张乾坤(1980-), 男, 湖北蕲春人,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副教授, 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任先大(1963-), 男, 湖南汨罗人, 湖南理工学院中文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

孤之思”，认为不局限于时序、四时悲秋悲秋情结的生成，既与他自觉接受悲秋原型有关，也与其羸弱的个性气质与外在的创伤经验有关。贺国强（华南农业大学）认为，学术界过于关注陈衍的“同光体”诗学，却使他的骈文研究处于“缺场”状态。作为许贞幹《八家四六注》的“补注”，陈衍的骈文注释学研究，学术规范，态度严谨，具有“引用典实必用原文”；解释典实，追根溯源，反对望文生义、穿凿附会等学术特点。党月异（德州学院）从文化比较视域解读了王韬的域外游记，认为他的游记不同于传统的“述奇”，而是以记叙西欧社会生活的“惊羨体验”为主。在与“他者”比较之中，展示了中西在科技、教育、制度、风俗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折射了近代文人急于摆脱中国落后局面的焦虑和欲望。李晨（苏州大学）考证了《读红楼梦质疑》的作者“冷佛”，认为姚民哀的《读红楼梦质疑》名为“质疑”，实为“带有研究性质的评说”，有一定价值，但“格局着实有限”，在当时没有实现突破，无法引领红学潮流。综上，学者们通过对耳熟能详的近代文学名家的考察，进一步深化了个案研究，也为近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实的细节支撑。

此次会议最大的亮点在于达成了一个重要共识，即一致认为近代文学研究不能仅仅围绕少数名家打转转，而是应以更为开阔的视野，将相对陌生、但地域特色鲜明、文学史价值大的文人纳入研究对象，例如岳阳籍近代文人吴敏树（1805-1873）。黄去非（湖南理工学院）凭借扎实的文献功底，首次以年谱的形式绘制了吴敏树一生的活动轨迹。喻奇驹（平江县）考证了吴敏树与李元度在生活与学术上的交往。关爱和（河南大学）分析了吴敏树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活动，认为《样湖文集》中的论辩、传志杂记、序跋书牘等叙写体现了一个古文家的价值观念与情感世界。晚年吴敏树凭借“文人之文”以若即若离、

生命关切的方式与湘乡派的“政治之文”互动、共舞，成为了与曾国藩相提并论的古文领袖。朱春雨（河南大学）考察了晚清“篴台唱和”，认为这一现象的发生，与战乱平定的外部环境、文人聚集幕府以及曾吴二人的声望地位有关。唱和诗歌流露出了诗人“济世心态”、“歌颂基调”、“中兴期待”。“篴台唱和”增强了诗人们在政治立场与思想情感方面的相互认同，也促进了诗歌创作水平的提升，对晚清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孙海洋（湖南大学）简略论述了吴敏树的诗文主张及创作，指出吴敏树在诗论上主张“自我求之”，力求“独立和独创”。在创作上，叙事文和山水游记散文，清新晓畅，淡逸雅洁，文风近于欧阳修、归有光，最具特色；诗以写景、记游和赠答居多，与唐人相近；词以表现晚年闲适生活和幽居情怀为主，在整体上与诗歌的风格大体相似。李有梁（湖南理工学院）从精神意蕴、美人香草意象以及仿照《楚辞》句式三个角度解读了吴敏树诗歌中的屈骚艺术特色，认为其生成主要是受到了地域环境和个人际遇等因素的影响。彭新华（岳阳县）解读了吴敏树诗歌中的“乡土情结”与“爱国情怀”。刘师健（湖南省社会科学院）认为，吴敏树“风刺之用”的实用主义文学创作观与“发人”而非“发于人”的为事而作的文论观，是在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和感召之下形成的。易迎赢（湖南理工学院）从文论角度对吴敏树的文学思想进行了专题探讨，认为其文学思想最有价值之处在于创作上提出了“诚”、“才”、“学”论和“物”、“事”、“情”论。会后，诚如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关爱和教授所言：“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吴敏树学术研讨会，意义重大！”

与上述参会者的微观研究角度不同，另外一部分参会者主要从宏观角度契入了近代文学研究。马卫中（苏州大学）从学术史的角度认为，1980至2017年期间由于思想开放，中国近代诗词

研究呈现出“研究对象的拓展”、“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队伍的传承”三大特点。孙之梅（山东大学）考察了湘籍作家在南社的地位，认为以宁调元为代表的数量不占绝对优势的湘籍作家对于南社的成立与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南社内讧之时，以傅尊为代表的21位湘籍社员有力支持了柳亚子，维护了南社的统一。此外，在诗论上，宁调元等人强调诗歌的“惧心”，对于南社诗歌创作纲领有“补偏救弊”之功效。在文化思想上，宁调元、阳兆鲲首开质疑传统权威之先河，对五四新文学产生了影响。耿传明（南开大学）从精神指向变化的角度审视近现代中国文学的古今之争，认为经历了“以旧压新”、“以新压旧”与“新旧共融”三个阶段、三种情形。对于传统与现代之争，主张在对立之外采取“第三方立场”，实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对视与对话”。陆胤（北京大学）在近代国民教育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勃发的背景下，考察了包括文字训诂和诗赋辞章在内的“中国文辞”如何从危急时势下的“无用之学”升格为近代学制不可或缺的一门教科的历程，认为其经历了“壬寅学制”、“督抚兴学”、“癸卯学制”等主要阶段。清末文学教育制度化过程中着力建构的国族时空同一性的文学理想，在当时未必取得实效，但仍值得当下凝视与反思。范丹凝（山东大学）考证了“曾门四弟子”概念，认为近代骈文家李详在《论桐城派》中提出这一概念，填补了桐城派之后古文文脉在晚清的空缺，也显示了曾国藩之后古文风格的变化。郑学（洛阳师范学院）以湘社为例，考察了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之关系，认为世传家学有利于维系文学技

巧的传习，稳定代际禅替间的文风，塑造作家的创作个性，帮助作家获取文化资源以及掌控传播话语权。姜荣刚（许昌学院）以小说《卢梭魂》《双枰记》为例，考察了近代言情小说叙事模式的嬗变及成因，认为哀情叙事不是产于民国初年，而是始于清末。其根源主要是西方婚恋之俗的侵入与本土应对的态度，其他皆为辅因。由于不同阶段应对的方式不同，表现在言情小说的叙事上呈现出由“情”至“魔”的叙事转换。胡全章（河南大学）整体考察了《河南》杂志“文苑”栏目，认为周树人《摩罗诗力说》、王天培的诗歌、张钟端《蝶梦园诗话》等是20世纪初年中国文学界的标志性成果。该栏目刊发的大量诗词阐扬了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表现出了鲜明的反帝爱国和反清革命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长期乏人问津的《河南》杂志理应在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史乃至文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董俊珏（福建师范大学）认为，东南亚华文文学滥觞于中国古典文学。它的发轫不是二十世纪初，而是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左秉隆、黄遵宪到邱菽园，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展经历了一条从官方引导到走向民间的道路。文学社团与报刊的双轨互动，促成了华文文学在东南亚的快速兴起。不难看出，以上诸家具体观点各异，但都有参考价值。

本次会议会期不长，但在主办方与承办方的精心组织与有效策划之下，各位专家学者踊跃发言，纷纷推介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文会友，彼此切磋，既促进了学术交流，又增强了互信合作，这必将对近代文学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编者按】2018年7月25日，由湖南省青年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省社科联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主办，岳阳市社科联承办的2018年第4期湘江时论学术沙龙“打造湖南新增长极的路径与对策”在岳阳市召开。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戴树源研究员、省社科联科研处处长邓曼、岳阳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许卫国、岳阳市社科联党组书记魏星、岳阳市党校副校长刘宇赤、湖南理工学院经管学院院长徐四星、岳阳市社科联副主席郑立新、岳阳市社科联副主席张萍、岳阳市委讲师团副主任蔡吉跃、湖南理工学院社科办主任鲁涛、湖南理工学院经管院副院长邓正华、湖南理工学院经管院副院长周金城、洞庭湖农村综合改革研究院院长胡中习参加了此次学术沙龙。学术沙龙由省社科联省情与对策研究中心负责人陈巍副研究员主持。与会的领导、专家就近年来岳阳市以构建大交通、做强港口、建设大园区、培育大产业，着力打造湖南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畅谈了个人体会，提出了对策建议。现将发言摘要如下，以飨读者。

## 探索长沙岳阳经济协同发展的新路径

魏 星

长沙与岳阳是湖南排名第一与第二的两大经济体。两市的经济总量占全省总量的40%。长沙岳阳两市毗邻、山水交错，交通便捷。岳阳的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都十分突出，是湖南唯一的国家区域中心城市。长沙、岳阳两市地理位置优越，具有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多式联运的绿色交通优势，长江经济带、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长江中游城市群三大战略在此交会。随着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实施，两市内外贸易持续逐年递增，平台功能日趋健全。截至2017年底，长沙市已有规模以上物流企业800多家；岳阳市建有物流基地17个，港口货物吞吐量1.4亿吨，40万标箱，首超九江、宜昌，居长江干线港口城市第六位。两地初步形成了布局合理、功能配套的物流城市发展格局。据海关总署发布的“2016年中国外贸百强城市”名单，岳阳市以70.5的综合得分居

第35位，列湖南省榜首。

但是，机遇利用得还不充分，资源挖掘得还不完全，发展基础还有待进一步夯实。多年来，岳阳市委市政府在开放崛起方面想方设法，开拓创新，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绩。但实在说，在经济发展的宏观把握上有一些力不从心。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与国内省内的宏观发展战略和规划是密切相关的，有些发展瓶颈、经济政策、产业布局、项目引导等问题，必须依靠国家和省级层面的政策倾斜和战略规划才能解决，仅靠本地有限的资源和人力物力财力显然是不够的。这几年，岳阳已经在主动对接长沙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如2015年5月成立了湖南城陵矶国际港务集团公司，努力开辟长株潭等地的物流资源；岳阳市委又提出了打造“1+4+2”大岳阳城市圈和岳阳南部县市主动对接长沙经济圈的城市发展战略；汨



罗与长沙经开区合作共建的长沙经开区汨罗（弼时）飞地产业园，目前已引进5亿元项目1个，过亿元项目6个；湘阴提出了“主动融入、无缝对接、借力发展”的思路，规划了20平方公里的长沙产业承接园。但是，在实际运作之中还存在一些行政壁垒、政策障碍等问题，只有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出台长岳经济协同发展的相关政策，问题的症结才能迎刃而解。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在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一核三极四带多点”的重大战略布局下，制定省内跨区域性经济协同战略。如，长沙岳阳经济协同发展战略；郴州“南大门”协同发展战略、张怀吉经济带协同发展战略等等。这些省内区域性协同战略，是全

面落实全省“大战略”的具体政策措施，有一定的带动示范作用。

二、请求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支持长沙岳阳经济协同发展战略，将其作为湖南实施开放崛起战略的第一组团，在政策上给予一定的支持、鼓励和倾斜，先行先试，总结经验，再逐步推开。四川成都市、浙江绍兴市在鼓动周边地市县经济协同发展方面都有成功的先例可资借鉴。

三、建议长沙市与岳阳市在共同互惠互利、协商合作的基础，签订两市经济协同发展的框架协议，分别成立相应的领导班子，建立经济协同发展协调推进与磋商机制，具体推动相关经济协同发展，解决经济协同中的问题。

## 关于实施化工产业替代发展战略的建议

刘宇赤

化学工业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为人类社会创造丰富的物质成果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替代稀缺资源上发挥了特殊作用。但是化工产业（包括石油化工、农用化工、医药化工、盐碱化工、食用化工、高分子涂料等等）在生产、储运、使用各个环节，大多都具有易燃、易爆、易泄漏和有毒、有害的特性。世界经合组织（OECD）指出：“工业生物技术是工业可持续发展最有希望的技术之一”。通过酶、微生物、细胞等生物转化或生物催化，加上化工工程技术，制造出新的生物产品，这些产品在许多领域可以替代化工产品、甚至还具有更多优良性能。因此，生物产业（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生物制造、生物农业、生物能源、生物环保和生物服务等）已经成为世界发达国家的战略性新

兴产业。2012年月，国务院印发《“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生物产业与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一并列入其中。

我国生物产业基础较差，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较小。以医药工业为例，我国生物生化药无论是产值还是品种占的比重较小，与世界发达国家还有不小的差距。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对生命和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医疗器械（包括大量生物药品或生物工程技术制品）进口使用外汇额度，已经排到了原油、芯片之后，跃居第三位。这也说明生物医药、生物医学工程和生物健康服务市场前景广阔。只要我们像当年实施“863”计划那样，紧盯世界先进水平，结合我国自身特点和巨大市场吸纳能力，科

学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生物产业一定会有一个长足的发展。

鉴于此，建议我省要尽早制定和实施化工产业替代发展战略，大力发展生物产业。

第一，高度重视化工产业替代发展的问题，一定要着眼长远，早作安排。这既是适应市场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走绿色化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更是创新发展抢占科学技术高地的现实选择。正如过去化工产品替代稀缺资源是人类生产力水平的一大进步，今天用生物产业替代化工产业又将是一次更高水平的跨越。

第二，化工产业替代发展不是全面淘汰化工产业，不是用生物产业完全顶替化工产业，也不是一个短时期的工作。替代发展战略包涵三层意思：其一，适当调低化工产业的发展速度，根据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和市场供需关系，化工产业可以调整为3%左右的低增长、零增长，甚至是一定范围、一个时期内的负增长；其二，适当压缩化工产业规模，降低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坚决按市场规律淘汰一批老旧化工企业或化工产

品；其三，在化工生产过程中引入更多的生物材料、生物技术和其他相关的高新技术，实现化工产业的转型升级。

第三，具体操作上要把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都用上、用到位。适当提高化工企业生产安全标准、排放与环保标准、化工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通过“技术壁垒”，逼使化工企业“吐故纳新”、“优胜劣汰”；对化工行业的国有企业逐步减少、直至停止“政策性亏损补贴”，把企业推向市场，把市场交给消费者；对创新型生物技术研发项目，建立风险投入机制，分担研发和创业的风险；对生物产业、生物产品在培育期内予以税收优惠；对重大关键技术和重大科研成果，采取政府资助、政府奖励等措施。

第四，积极稳妥推进化工产业转型升级和替代发展。在对待化工产业替代发展的问题上，既要鼓励科学探讨、理性研究，又要防止舆论炒作，以讹传讹；既要大胆改革创新，适应市场规律，又要逐步施放政策，注意社会承受能力。

## 发展战略新兴产业是湖南强省的必由之路

徐四星

大力发展新兴产业是建设湖南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抓手。湖南应通过对接长江经济带，抓牢战略机遇，实施创新驱动，实现新兴工业强省目标。

目前，湖南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全省战略新兴产业呈现规模化、高端化、集聚化的发展态势，全省2017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3914.7亿元，增长10.1%，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3%，比上年提高0.7个百分点。部分领域初具规模与特色，智能装备产业集群，风电装备制造

产业体系已形成；以广电、出版、动漫、娱乐、创意为核心内容的文化湘军品牌集群稳步崛起。自主创新成果丰硕，“十二五”期间，获国家科技奖励107项，创新综合能力排全国第11位，超级计算机、超级杂交稻、高铁牵引系统国际领先。市场主体加速成长，工业领域战略新兴产业超过2500家，其中1110家产值过亿元，73家过10亿元。

但湖南战略新兴产业发展也存在湖南战略新兴产业竞争力不强、战略新兴产业布局不协调、

战略新兴产业链不完整、关键技术研发能力不强等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对促进湖南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提出以下的对策建议：一是布局湖南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轴。战略新兴产业发展轴以长株潭为中心，沿京广线向北延伸岳阳，向南延伸衡阳郴州。长株潭作为行政、科教、金融、服务、商住、人口与企业总部集中区，主要布局机械、电子、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制造及高新技术产业、物联网经济、文化产业与服务业。岳阳沿长江开发带重点布局石油化工、电力能源、造纸、农副食品加工、航运物流、钢铁汽车等大耗水产业。划定湘阴、汨罗和长沙县部分乡镇为长岳联动发展承接带，建设长沙—岳阳产业开放合作新基地。郴州衡阳利用湘南产业承接示范区平台，利用矿产资源优势发展新能源产业。二是培育新兴产业集群。重点支持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等20个优势产业链群，延伸扩大产业链条，

培育和引导企业聚集配套发展，发挥集群效益，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三是壮大新兴产业主体。围绕战略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实施骨干企业培育计划，重点引进一批跨国公司，做强一批有优势的重点企业，培育有发展潜力、成长性好的创新型企业，带动上下游产业协调发展。四是搭建科技创新公共平台。加强科技创新载体和基地建设，培育科技企业孵化器和科技创业园，发挥各类开发区特别是高新园区的示范带动作用。支持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建设以前瞻性应用基础研究为主的工程实验室、重点实验室，以重大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工程化验证为主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新产品新工艺研发为主的企业技术中心。五是增加战略新兴产业资金投入。设立湖南长江经济带建设与发展基金和湖南省培育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引导基金，用于战略新兴产业重大技术研发和产业化、技术创新、技术改造、市场培育、平台建设、人才引进与培养等。

## 打造湖南新增长极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郑立新

打造湖南新增长极，笔者认为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尽管从短期来看，打造新增长极与淘汰落后产能似乎是矛盾的，淘汰落后产能在短期内也会对岳阳的发展造成一定冲击和影响，但长远来看，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不仅与打造新增长极不矛盾，而且是高度契合的，是打造新增长极的必由之路。

第一，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理念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论断非常深刻地揭示了保护生态与发展

经济的辩证关系，“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揭示的是生态优先的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则是说保护好了生态环境就为今后的发展留下了空间，留下宝贵资源。发展经济必须以生态环境的承受度为前提，高质量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是不矛盾的，而是相得益彰的。发展要让人民群众看得见青山，望得见绿水，记得住乡愁。从目的上来看，发展经济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保护生态也是满足这种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二者目的是一致的。

第二，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

题中应有之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内在统一的，有着紧密的逻辑关系，核心在创新，外在表现就是高质量的发展。我国虽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80%，美国的13%。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来看，GDP还要大幅度增长，但资源环境按照现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是根本无法承受的，只有高质量的发展才能有效降低经济发展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度，也就是必须大幅度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唯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才能提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才能在未来的发展占据制高点，开拓广阔的空间。这就是舍与得的辩证关系，我们只有舍弃粗放的发展，才能赢得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三，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岳阳新增长极

的必由之路。所谓增长极是区域经济学的一个概念，作为极一定要有辐射带动作用。将岳阳打造为通江达海的增长极，就是要发挥岳阳独特的区位优势 and 岳阳“一区一港四口岸”的平台优势，成为湖南开放发展的一个新高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召开的“长江经济带”建设座谈会的讲话中指出要“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他指出不搞大开发并不是不要开发，而是要避免乱开发，低水平的开发，而是要整个长江经济带一盘棋，协调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岳阳打造新增长极的必然选择，因为只有绿色发展，才能为岳阳的发展积聚后劲，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倒逼岳阳经济迈上更高质量的发展阶段，才能真正发挥作为湖南一极的辐射带动作用。

##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构建岳阳发展新格局

蔡吉跃

建设湖南发展新增长极，是省委省政府统筹全省区域发展大格局，对岳阳发展作出的定位要求，是必须担当的重大责任和时代使命。我们要按照省市党代会的要求，坚持“一三五”基本思路，构建岳阳发展新格局，推动岳阳高质量发展。

一是突出创新引领。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创新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方式。强化科技创新，加快创建临港国家高新区，新建一批国家级和省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院士工作站等创新平台，新增高新技术企业50家。继续实施“巴陵人才工程”和“四海揽才”计划。大力推进创新创业，鼓励更多的

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在巴陵大地掀起万众创新、大众创业的新热潮。

二是突出开放带动。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全面提升岳阳港口功能，深化岳阳港与上港集团的合作，加强与长江、四水流域港口的对接，发挥开放平台的辐射带动效应，做强做优港口经济，彰显岳阳港在全省开放崛起中的首位度，形成水空“双港驱动”，城陵矶新港区、综保区、空港经济区“三区联动”，邻长地区、沿江环湖地区“南北融动”的开放发展局面。

三是突出产业主导。就是要始终突出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和园区建设，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产业项目建设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聚精会神谋产业，千方百计兴产业，一心



一意强产业，以产业补齐发展短板、领跑新增长极建设、牵引高质量发展。要坚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与大力发展新兴产业“两手抓”，做强做优石化、食品2个两千亿级产业，培育壮大现代物流、装备制造、文化旅游、生物医药、军民融合、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

四是突出乡村振兴。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继续开展农村“空心房”整治，规范村民建房，发展现代农业，推进脱贫攻坚，使农村面貌显著改观。

五是突出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是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岳阳市委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决议》，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治理攻坚。推动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落地见效，坚决守护好一江碧水。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强力推进湘江保护与治理、洞庭湖生态环境整治和市域重点河湖综合整治；加强城市山体水体保护和生态修复，让“岳阳绿”成为城市的鲜明底色，让“岳阳蓝”成为城市的靓丽名片。

## 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

张 萍

岳阳大力发展电商，需从政策引导、龙头带动、模式创新、人才培育等多方入手，营造良好生态环境，促进快速发展。

一是壮大市场主体。积极扶持品牌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电商企业承接省市外业务，或到省外设立分支机构，拓展业务，引导具备条件的综合性和行业性信息服务平台向集信息服务、交易和支付一体化的电商平台转型。培育中小型电商，围绕现代农业、餐饮业、旅游业、教育培训、专业市场、跨境电商等特色领域培育一批专业性电商平台，带动全市中小企业电商应用。选择技术、仓储、代运营等领域优秀企业，推动其与第三方电商平台及上游应用企业衔接，形成市级电商服务骨干企业。推动全市小微网商抱团集聚发展。借鉴外地做法，与国内知名团购网站阿里巴巴、淘宝、京东、苏宁等第三方平台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依托政府力量为分散性的销售本地特色

产品的网商搭建共同营销平台。

二是提升专业园区发展质效。创新园区服务模式，支持有条件企业参与或承接专业园区运营管理，提升电商服务专业化水平。针对量大面广的网商，优化仓储管理服务，发展统一采购、配送、售后以及研发设计等服务，提供营销渠道建设、仓储物流、在线金融、网销培训领域一站式服务。加快推进专业园区项目建设，结合全市专业市场、物流园区布局，支持具有重大影响、符合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方向的电商产业园区建设项目纳入年度全市重点项目库，在项目用地、土地用途变更、建设问题协调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对项目建设方仓储物流等配套设施投入按比例给予补助等。

三是拓展“互联网+外贸”跨境电商模式。依托城陵矶港口区位优势，争取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试点。以城陵矶新港区综合保税区跨境贸

易综合服务平台项目为基础,出台跨境电商招商优惠措施,引进国内外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同时筛选全市进出口优质企业和产品,建立岳阳产品海外专区线上营销平台,帮助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借助跨境电商实现外贸转型,有效吸纳周边区域企业落户,拉动全市外贸出口总值快速增长。

四是发展县乡村级电商。目前农村网购虽占比低于城区,但市场正在快速增长。鼓励支持阿里巴巴、京东、邮乐购、供销e家等大型电商在岳阳市建立农村电商县乡村级服务中心站点。促使

农产品向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发展,收集整理岳阳市农特产品种类,鼓励各县市区发展壮大符合本地特色的农产品种养殖规模,鼓励“农户+专业合作社”运作模式,形成具有岳阳特色的网销品牌。

五是培养电商人才队伍。保持中高职院校、电商协会与企业间有效沟通,对电商企业员工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知识培训;建立校企长期合作模式,培养适应发展需要的本土电商人才,确保人才队伍稳定。

## 关于打造湖南本土江海直航船队的对策建议

鲁 涛

打造湖南本土江海直航船队是促进湖南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增强湖南省物流竞争力的需要和推进湖南开放崛起的需要。通过发展江海直达运输吸引长江上游及周边货源通过城陵矶港中转直达海外,可充分发挥湖南省承上启下、连接东西的区位优势,能有效提高湖南外向物流运输能力,本土江海直航船队将会成为湖南开放崛起、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重要载体。

城陵矶港是“长江八大良港”之一,拥有“一区一港四口岸”开放平台,进出口货物需求量大;江海直航相对于一般的江海联运,运输时间更短、成本更低、效益更高。2017年湖南省进出口总值2434亿元,比上年增长39.8%,增幅位列全国第四、中部第一,航运潜在需求大。水果、肉类、粮食、汽车、固废等进口量增长迅速。烟花爆竹、危化品等的出口运输成本优势明显。江海直达运输减少了运输环节,消除了货物损耗,缩短了运输周期,从而降低了物流成本,深受船东和货主的欢迎。内地经香港中转的货物约占全

国进出口货物的15%(价值5000多亿美元),岳阳-香港是目前打造湖南本土江海直航船队最为理想的航线选择。

一是明确“省级战略”定位,确认具体责任主体。以航运市场为主导、以运力资本为纽带、以港间合作为媒介,明确江海直达运输的定位与分工,实现区域间集装箱运输的市场价值。建议由省发改委负责江海直达的顶层设计及统筹规划,形成区域港口优势资源辐射的统筹机制。搭建政策沟通、信息共享、问题协调、经营合作的交流机制。

二是加强江海直航船队建设。加强与船舶设计研究院、造船公司的合作,研发设计、建造适合“海洋-长江-城陵矶”航道的干散货、集装箱江海直达系列船型。培育、扶持湖南本土江海直航船队发展。推动湖南本土江海直航船队规模化、便捷化、集约化发展。

三是加强通航基础设施建设。加强航道等级优化建设,推进建成以长江为依托,以湘江为骨

干,以沅水、澧水下游、资水下游及洞庭湖区航道为主体的高等级航道网。加强桥梁净空高度优化,选择适宜江海直达船型的主航道进行重点建设,拓宽船型与桥梁匹配的标准规范。加强内河港口码头基础建设,注重大小船舶岸线、锚地、泊位资源合理分配。

四是优化通关效能,推动贸易便利化。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平台建设。可以由岳阳城陵矶新港区管委会协调海关、海事局等联检单位和商务部门共同打造服务收发货人、申报单位、航运物流企业的通关公共服务平台。优先通关通道,进一步提高通关效率。海关可设置“江海直达”优先通关通道,对不查验的报关单做到当日

申报,当日放行;坚持节假日预约通关制度,为“江海直达”进出口货物创造良好的通关环境。

五是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加强货源组织。要注重客户关系管理,依托城陵矶港建立揽货体系。积极开拓长江上游的中转货源。凭借优惠的价格和便捷的服务,吸引客户通过江海直航运输进出口货物。确认责任主体,扩大货源规模。目前,粮食、危化品、固废、汽车是主要目标货源,其中烟花、危化品由交通运输厅,粮食由检验检疫局,汽车由商务厅,固废由环保厅,负责引导、组织货源,扩大规模,形成优势。简化操作流程,提高服务质量。

## 湖南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点产业布局研究

邓正华

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全面落实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任务之一,它既为湖南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提供了国家级统筹合作平台,又为湖南利用“一带一部”区位特色实现中部崛起战略指明了方向。因此,优化空间布局、对接长江经济带是我省重点产业优化布局的重要路径。

一是要优化“一核、一区、多点”产业空间布局。一核就是优化长株潭核心增长极。依托长株潭国家级政策平台,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和现代服务业区域中心,打造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增长极。一区就是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示范区。全面治理洞庭湖水环境,强化湿地、水生动植物和长江岸线资源保护,促进岳阳、常德、益阳三市产业合作,全面构建全国生态经济发展示范区。多点就是促进多点协调发展。在优化长株

潭、岳阳、常德、益阳产业布局的同时,加大力度建设郴州、怀化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沪昆高铁经济带、张吉怀精品生态文化旅游经济带。

二是要延伸长株潭产业链。围绕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优势产业“强链”,建设湖南标志性的产业集群;围绕电子信息、智能制造等7大新兴产业“建链”,建立和完善相关产业链条;围绕湖南传统产业“补链”,从价值链的角度来补充相关产业链。实施重大项目联合攻关,推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延伸扩大长株潭产业链条,促进周边地市“互链”,打造相互关联的产业集群。

三是要构建长岳经济带。借鉴国内新区建设经验,远期规划建设长岳新区,先行布局长岳经济带,拓展湖南产业投资与发展新空间,把长岳经济带建设成为全省优势产业集聚区。长株潭采用总部+生产基地分置模式,长沙市作为湖南企业

总部的集中区，将企业生产基地和一般制造业北向岳阳迁移。做强岳阳国家区域中心城市。整合和引导全省大耗水、大运量产业在岳阳聚集，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岳阳产业竞争力。规划长岳联动发展承接带。划定湘阴、汨罗和长沙县部分乡镇为长岳联动发展承接带，建设长沙—岳阳产业开放合作新基地。

四是要构建湖南全面开放新格局。加强湖南与沿江省市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推进“湘品出境”。拓展长沙、岳阳等5大口岸开放功能，积极申报湖南自贸区，探索建立内陆自由贸易港。

从政策保障来看：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和区域协调。设立湖南长江经济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专门工作机构，强化与湖北、江西的省际合作，通过政府联席会议、长江带论坛、智库、企业、高校等多层次、多渠道加强协商，借助项目、规

划、投资等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二是设立湖南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由省财政厅牵头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组建股份制产业投资基金公司，公司采用引导基金+产业基金群+项目群运营模式，设立湖南港航基础设施、战略新兴产业链、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重组兼并3个产业基金群。三是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整合省市两级财政投资资金，引导汽车、钢铁、石油化工、电子信息、纺织服装、农副产品加工等产业在长岳经济带、节点城市产业园区布局；根据国家税收调控政策，加大长江经济带重点产业税收支持力度。四是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重点生态保护区实施水、土、大气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坚持抓好湘江重金属污染、洞庭湖水环境质量、有色金属污染等环境问题综合治理；落实环境保护督查制度，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

## 岳阳必须全力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

周金城

岳阳打造湖南新增长极与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内涵和外延都极为接近，岳阳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不仅可以带动湖南省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可以对湘鄂赣边区发挥出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岳阳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已经具备一定的优势和条件，如区位优势明显、产业基础较好、资源丰富、综合实力较优，面临的国家“一带一路”、中部崛起、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以及湖南“一核三极”区域布局等战略机遇持续叠加，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的战略格局基本形成。但也存在城市人口规模较小、产业结构不优、新增长极

建设后劲不强、城市集聚辐射能力不强、与周边地区的协同发展不够等问题。

为此，就岳阳市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积极争取省域副中心城市定位。国家中部崛起“十三五”规划明确的五个区域性中心城市中，除岳阳外其他四个市都确定为省域副中心城市，且由省委常委兼任市委书记，给予了大力发展支持。建议争取省委省政府更大支持，将岳阳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纳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部署，从空间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项目安排、人才支持、资源要素、简政放权



等方面，给予岳阳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二是把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作为岳阳市发展的核心目标。要认识到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是岳阳市当前最大的历史机遇、重大的使命担当，是引领工作的核心。尽快成立岳阳市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领导小组，制定各县市区与职能部门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协调解决建设中的问题。对标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标准，着手制定《岳阳市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的行动纲要》、《岳阳市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实施方案》等政策文件。

三是按照“核心引领、圈层拓展、两翼腾飞”发展思路，加快形成“一核一区一圈两翼”空间开发格局。“一核”，即以岳阳中心城区为核心。“一区”，即岳阳都市区。“一圈”，即

岳阳都市圈，以100公里为经济辐射半径。

四是加快构建高效便捷的对外交通格局。在尽快完成“1+4+2”城市组团规划的对内交通道路建设基础上，加快岳阳市与周边地区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构建起以岳阳市为中心的湘鄂赣边区1.5小时经济圈，提升岳阳市空间要素集聚力。

五是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岳阳市要主动加强与长沙、益阳、常德、荆州、咸宁、九江等周边地区的区域互动合作，建立沟通协调、规划对接、技术支撑、产业分工协作等相关机制。进一步加强区域战略合作示范平台建设，加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的治理与发展，创新城乡统筹、区域联动、绿色发展的新模式。探索与荆门、咸宁、九江联动发展，促进产业、生态、旅游融合发展。

## 供给侧改革应加快绿色农业发展

胡中习

加快发展绿色农业是农业迈向现代化的一场深刻革命。绿色农业发展，是一种生产关系和发展方式的变革，是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调整，为农业政策、体制、机制和组织管理创新都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也为现代农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怎样加快现代绿色农业发展，这是摆在新的历史阶段重要的战略任务。

一是推进农业发展理念绿色化。绿色农业的发展既有实践要求，也有理念创新要求，农业的绿色价值，不仅是绿色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绿色生产力的提升，更重要的是绿色发展方式创新成为引领发展的新理念，引领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重视生态文明，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

二是推进绿色农业标准化。绿色，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也是一个实践操作的标准体系。应当按中央提出的要求，把突出优质、安全、绿色导向作为标准化的根本内涵，健全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三是推进绿色农业智能化。绿色农业智能化，是解放农业生产力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农业供给侧改革重要内容，省市县都应出台“补短板”具体措施，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工流通企业与电商企业在农业互联网和绿色智能化操作上全面对接融合，推动绿色农业线上线下互动发展。

四是推进绿色农业园区化。农业园区，是现

代农业发展的一种新方式，也是工商等产业融合共享、城乡共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元共享发展的新形态，可以集聚现代工商经济、科技文化创新要素优势和公共服务优势，推进绿色农业园区化发展，有利于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创新，有利于绿色农业发展提质加速，形成规模化、区域化、社会化、特色化格局，对于加快建设农业现代化有战略意义。

五是推进绿色农业制度化。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重要一点就是要着眼于农业领域体制机制的创新，就是改革那些不适应绿色农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建立起现代农业绿色发展的政策和制度体系，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绿色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和现代绿色农业政策体系，提高绿色农业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加绿色农业制度供给，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制度创新，强化绿色农业发展的新动能。

## 征 稿 启 事

《社科天地》是我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季刊，重点刊发党的重大理论政策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史哲、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论文和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的优秀调研报告。字数一般不超过6000字，论文要求提供200字以内的摘要及关键词，文末一律注明作者性别、年龄、职务职称、工作单位、电子邮箱等信息。

欢迎广大社科工作者、岳阳智库专家不吝赐稿。

**通讯地址：**岳阳市南湖大道市委三办公楼505室

**联系人：**谭 馨

**联系电话：**8889305

**电子邮箱：**1793617663@qq.com

# 岳阳市供销社综合改革实践调研报告

## 岳阳市供销社综合改革调研组

2017年以来，岳阳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精神，坚持党政主导、整体推进，紧扣农业农民农村合作服务需求，以基层组织体系和为农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积极创办领办农业合作社，构建“四大体系”、开展“八项服务”、创新“六大机制”，率先形成了较完整的合作体系、完备的服务功能、完善的合作服务机制，打造了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和合作发展的“岳阳版本”，迈向合作发展的新时代。

### 一、全面构建新型供销合作四大体系

岳阳市在综合改革试点中突出创建性，把供销合作体系建设作为创建基础平台来抓，作为供给侧改革和体系创新重要内容，着力解决体系不健全问题，率先构建起新功能、新活力的新型供销合作体系。市、县、乡、村全面构建起“新型供销合作联社和农合联+惠农服务中心+专业合作社+农户”的现代新型合作模式，形成党和政府以合作经济形态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形成新时代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主渠道，使其成为推动新型合作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一是构建供销合作组织体系。目前，市级和10个县市区供销合作联社得到恢复发展，创新机制，双线运行，普遍加强了对区域内供销合作社建设规划和行业引导，其中平江县和汨罗市、临

湘市开展全国百强社创建活动都取得较好成效，示范作用进一步提升。全市共建全乡镇供销社92个，共有1388个行政村通过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等形式组建村级惠农服务组织1162个，其中36个乡镇基层社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标杆社，涉农乡、村供销合作组织覆盖率分别达88%和83%，还有12%的乡镇和17%的村供销合作组织正在规划建设中。

二是构建供销合作为农服务体系。市、县、乡（镇）、村四级加强了供销合作为农体系建设，大力发展社办惠农服务公司、社办惠农服务中心和综合服务社，搭建与农业农民紧密联系的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公共服务和产业要素服务向农村延伸覆盖。据统计，全市建成乡镇惠农服务中心92个，创办领办专业合作社6212个，市级和10个县市区都组建起惠农服务公司，并作为社有投资企业和区域龙头企业发挥区域惠农服务的龙头作用。汨罗市以先试点再推广办法，先期重点办好白水、罗江、屈子祠、神鼎山四个乡镇惠农服务中心试点，四个惠农服务中心均由供销社各占股份35%。其中白水镇惠农服务中心注册资金1000万元，利用社有资产改造，以农业龙头企业湖南耕农富硒农业科技公司为龙头，联合13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组成，主要为农民开展土地托管、植保、农机、农技、金融、电商、粮食烘干销售、培训等八项服务，为振兴乡村合作经济

和服务社会化探索出了新路。

三是构建供销合作社有企业运营体系。岳阳市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中十分重视社有企业运营体系建设，努力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加强企业管理，规范治理结构，普遍建立与绩效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增强社有企业发展活力和为农服务实力，逐步形成管理科学、业态现代、纵横互联、机制创新的运营体系。市县两级供销合作联社相继成立社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按照理事会授权加强对社有资产的监管，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引入社会资本、争取财政政策支持等措施建立起惠农服务公司运营机制。市县乡村各级惠农服务平台由同级供销合作社牵头，按照实体运作和承担公益性为农服务的原则进行营运，鼓励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资本投资入股，实行股份合作经营。同时，加强各层级社有企业间的产权、资本和业务联结，推进社有企业相互参股，建立共同出资的投资平台，推动跨区域横向联合跨层级纵向联合，推动服务资源和经济要素优化组合，促进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市县供销社独资和参股企业发展到156家，已有35家社有企业经营资产达5千万元以上，逐步向规模化和集团化方向发展。

四是构建供销合作联合发展体系。岳阳市各级供销社在大力创办领办农业合作社的同时，积极引导各专业合作社之间广泛的合作与联合，并创造条件推动市县乡村层级间合作组织的联合发展，促进单一合作向双向多元合作发展，实行信息共享、资源共用、优势互补，努力扩大供销合作与农业合作的广泛性、开放度、深度化，由服务合作到产业融合。全市104个涉农乡镇已有92个建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参与联合的农民合作社达6212个。市供销合作联社在组织全市农合联工作同时，带头创新联合发展机制，先后与中粮米业、省农信担保公司、深圳和网零售公司、湖南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湖南新泰和集团开展战略

合作，走出了一条合作联合发展的新路子。市社与中粮米业合作组建了优质稻种植联合社，2018年种植优质稻16万亩，全部由中粮米业优价收购，规划三年发展100万亩优质稻种植。市社与湖南新泰和集团合作组建注册资本3000万元的岳阳市现代供销服务集团公司，支持创办领办绿色农业和消费合作社等服务实体20家，新泰和集团在华容县、君山区建立数字农业、绿色农业基地和现代农业公园，在岳阳楼区站前路铁路社区等地建立消费合作社，建立社区日用品生活超市，以绿色菜园网电子商务为龙头，推行现代绿色农业产供销一体化经营，促进合作社联合发展。

## 二、重点推进八项服务

岳阳市把有效推进为农服务作为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主题和落脚点，把服务做实，着力补齐服务短板，打造服务亮点。全市规范化重点推进八项主题服务活动，逐步形成合作制、全覆盖、全程化、系列化新型合作服务，提升了为农服务质量和水平，让广大农民在合作服务中感受到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功能和效果。

一是生产资料服务。近两年来，全市加大供销合作社农资仓储物流中心、配送中心和经营网点建设力度，努力扩大供销合作社农资放心店自营比例，并以市新三湘农资有限公司为龙头、以县市区供销合作社农资企业和乡镇惠农服务中心为依托，基本建成覆盖全市农村的农资经营服务体系网络，为全市45万农户和500多万亩农作物提供主渠道放心生产资料服务。今年农资经销额7.3亿元，比去年增长125%。为提高农资服务质量，全市兴办起99个庄稼医院，建立95个测土配方施肥点和全市测土配方数据库，推行农资销售与技术服务同步，做到精准用种、用药、施肥。市新三湘农资公司先后与湖南金叶众望科技有限公司、湖北祥云集团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富来地金润肥业有限公司等69个生产厂家和57家大型供应商开展合作，成为其在岳阳乃至湖南地区总



代理,代理品种达196个,并与全市7个县级配送中心、126个乡镇农资放心超市、605个村级农资加盟店和一大批惠农服务平台建立了农资购销合作服务,年采购供应化肥原料5万吨以上、销售化肥等农资15万吨以上,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100万亩以上,今年的生资低于市场价销售,为农民节省开支6000万元以上,发挥了生产资料供应服务国家队主渠道作用。

二是土地托管服务。岳阳市供销社综合改革主动适应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业专业化分工的要求,积极推行土地托管服务,全市有18万农户与92个惠农服务中心签订了土地托管合作协议,土地托管服务面积达74.7万亩。依托社有经营服务组织,围绕耕、种、管、收、加、贮、销等环节,为农户提供集中育秧、统防统治、机耕机收、机插机播、短途运输、烘干收储、加工销售和农技培训等全方位的土地托管服务,并探索全托管、半托管、土地入股等多种土地托管模式,培育打造一批托管服务品牌,推动农资销售、技术服务与土地资源的综合开发有机结合。岳阳县筲口镇惠农服务中心由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润升水稻专业合作社与供销社新业公司合股经营,实行公司+合作社+农户+基地模式,托管土地服务面积2万多亩,统一推广良种、统一绿色防治、统一全程机械化服务、统一订单收购、统一品牌营销供销。水稻全程机械化和智能化管理,每亩节省成本147元,每亩增产150公斤,加上规模化和品牌化经营效益,平均每亩增收效益达500元左右。

三是农产品流通服务。岳阳市供销社综合改革充分发挥供销流通优势,积极开发建设乡镇农贸市场138个、市县级农产品批发中心12个。加大现有物流体系配套力度和农产品批发市场升级改造,加强农产品收储设施建设,发展冷链物流,在市县城镇社区建设了一批生鲜超市等零售终端,构建起农产品现代流通服务体系。积极

组织引导供销合作社更多地建设有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和示范园区,加强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超、农社、农市产销对接,大力推广农产品直供直销模式。岳阳县张谷英镇长恒绿色有机蔬菜合作社将30多个品种有机蔬菜直销到长沙城区。全市供销合作社和惠农服务中心今年共为农民购销粮食、蔬菜、茶叶、水产品、猪牛羊鸡肉类等农产品共598万吨,不仅较好帮助农民解决买难卖难问题,而且用流通服务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生产,减少了农产品生产的盲目性。

四是农村电商服务。农村电商是一种新型流通方式,它有效沟通了城乡信息对接和要素流动。全市实施“互联网+供销社”行动计划,打造网上供销合作社模式,全面推进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E家和省供销社网上供销社、湖南新泰和绿色蔬菜网、阿里巴巴、京东、乐村淘等电子商务交易等平台对接合作,广泛开展农产品供求信息发布、现货交易、交收结算、仓储物流、供应链金融等服务,形成网上交易、仓储物流、终端配送一体化经营,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整合市、县、乡、村级供销合作社电子商务企业和网点资源,形成电子商务体系,打通农资、日用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和农产品进城入市最先一公里。市县两级建设5个县级特色馆、83个乡镇电商服务站、806个村级电商服务点。今年八个月全市农村电商经营额达13.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27%。

五是信用合作服务。信用合作社按照“成员制、不对外吸储放贷、不支付固定回报、封闭性运作”的原则,对合作社成员的资金需求予以授信。持授信卡成员可购买合作社提供的农资、农机、植保等农业生产服务,最终实现生产服务、产品购销、返利分红一卡通。今年共为1861户农民提供信用资金服务460笔计1.8亿元。为加强农村金融服务,市供销社与省农信担保公司进行战

略合作，推进岳阳市惠农供销信用体系建设。市社采用联合作方式设立了岳阳农业合作社信息服务公司，与多个金融、信用组织建立起信息服务关系，并建立信用服务数据库，为合作信用提供服务。市县两级供销合作社积极创造条件设立融资租赁公司、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担保公司，并与同级财政共同出资设立担保公司和产业发展基金，逐步构建起以资金互助为基础、以农信担保为支撑、以合作保险为补充的农村合作金融服务体系，发挥了农村金融服务补短板的作用。

六是涉农技术服务。利用供销合作社、农合联、惠农服务中心等平台，整合科技、农业、林业、畜牧、水产、国土、环保等涉农技术资源，广泛开展涉农科技服务，为科技人员下沉到乡村一线、面向实际科技需求搞好服务创造了更好条件，全市有近万名科技人员在供销合作联社、惠农服务中心和农业合作社围绕农业农村发展中的科技应用进行精准服务，推动了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推动了农村科技振兴和创新发展。盛禾农业科技积极发展无人机植保服务，拥有几十架植保飞机，无人机植保服务区域达四县几十个乡村，开创了岳阳无人机植保服务新时代。市供销社战略合作企业新泰和集团在省科技厅、省科协和湖南农大支持下开展人才合作和技术服务合作，设立了院士工作站，直接面向蔬菜合作社开展技术指导，先后有近20个产品获得绿色、有机认证，其绿色农产品在网上直销，岳阳市中心城区有20多万居民直接从网上购买新泰和绿色蔬菜。华容县禹山镇惠农服务中心通过农民合作社的联合，把分散农户的生产组织起来统一推广农业技术，在技术人员指导下采用优良绿肥红花草籽实行绿色水稻生产，联合社生产的红花香大米成为品牌，比普通大米价高出5至6倍，联合社指导华顺蔬菜合作社利用6000多亩冬闲土地种植黄白菜苔为农民增收80多万元。

七是代办邮政快递农业保险服务。全市供销

合作社系统设立了113个邮政和440个快递代办窗口，其中代办快递物件1.5万件，供销合作社和村服务中心社把快递代办等服务延伸到村组，不少边远山村水乡的农民也能象城里人一样及时收到在全国各大城市购买产品的快递包。同时，多数惠农服务中心代理农业保险服务，今年办理农业投保面积118.3万亩，其中办理农业保险理赔金额1200多万元。

八是城乡社区生活综合服务。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主动适应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快建设农村综合服务社和城乡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及时为城乡居民提供日用消费品、文化体育、养老幼教、娱乐休闲、职能培训等多样化服务，并及时承接政府委托的相关公益性服务。供销合作社、乡村惠农服务中心共兴办农村集市贸易点138个，开办城乡日用消费品超市、门店3234个，推动了经营服务综合体和社有企业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供销合作社沟通城乡、服务农民的辐射带动力。

### 三、推进合作机制创新

岳阳市把推进机制创新作为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示范市创建重点，走出了一条机制创新为特征的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新路径。主要推进六大机制创新：

一是创新合作经济领导机制。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关键在领导。在省委省政府领导支持下创新领导机制，坚持党政主导，及时加强了对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领导、指导、引导和督导。首先，坚持党政主导，担责作为。市委市政府把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当作一把手工程，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任组长、市委副书记任常务组长的综合改革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出台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和创建示范市的工作方案，列出工作清单，制定了任务图、时间表。其次，部门协同，整体联动。市里从16个方面制定了创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任务责任清单，对市

直19个相关部门创建工作提出了具体协同任务。市直相关部门紧密协同、整体联动，形成创建合力，推动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深入发展；再次，政策支持，财力扶持。市县两级都制定了支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有关土地、资金、人才、产权、项目、创新等方面的具体政策。近两年来，市县财政和各部门共安排资金1.4亿元支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其中每建设一个乡镇惠农服务中心，县财政安排100万元补贴资金，市级补贴安排30万元。市县财政还分别安排1000万元、500万元支持建立供销合作社发展基金。市县财政扶持资金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共撬动社会资本投入6亿元以上。

二是创新合作经济行业引导机制。在省供销合作社具体指导下，市社充分发挥行业指导、组织建设、资产监管、教育培训等职能，在综合改革试点中逐步构建以市县联合社主导的行业指导体系，创新行业引导机制。为推进创建工作，市供销合作联社多次召开座谈会和研讨会，组织赴山东、浙江等地考察，提出推进岳阳市创建工作建议，制定了行业管理规范和发展规划，进一步修改完善了岳阳市供销合作联社章程，出台了领办农业合作社和社有企业产权管理改革、资产资金投资管理的意见。今年，市县两级联社先后召开理事会、监事会，强化联合社对成员社的资产监管职责；建立成员社对联合社工作评价机制，完善联合社对成员社工作考核机制，从多方面加强了联合社层级间的联合合作，更进一步做实了为成员社的服务。

三是创新合作经济利益联结机制。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把握合作根本属性，注重合作共享的利益关系，以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股本、农民变股民形式推进合作经济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做到合心合力、合资合利，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农民个人等以土地、产品、资金等形式参股，共同组建股份合作社，结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共同体。全市合作社中，实行股份利益联结机制的达4969个。华容县注滋口镇隆西村稻虾种养合作社利用股份利益联结，合作方各得其利，稻虾产业得到较快发展；云溪区路口镇黄皋村艾叶合作社与200多个农户开展艾叶种植、收购、加工销售合作，种植艾叶2000多亩，建成艾叶加工厂房5000多平方米，加工艾叶制品40多个，并创办电商远销多个省市，入社农民艾叶种植比一般作物亩增收3000多元。

四是创新合作经济内部治理机制。合作社既是一个经济体，又是一个合作成员的社会集合体，“合作”本身是人的合作，是人的发展。合作经济内部治理主要是处理好合作方之间合作诉求与利益关系。岳阳市按照合作制原则完善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切实做到农民出资、农民参与、农民受益，重点落实基层社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加强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健全财务管理和分配制度，健全风险调控机制，既防范市场风险、经营风险，也防范廉政风险、安全风险。全市有23个供销合作联社和基层社先后建立合作社股权投资基金和合作发展基金，从制度和机制上确保合作顺利推进。

五是创新人才机制。岳阳市在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中把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干部职工在岗培训力度、急需紧缺人才引进力度、经营管理队伍培养力度，全面提升干部职工能力素质，为新时期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提供人才保障，积极探索具有合作经济组织特点的供销合作社干部人事制度。市县供销合作联社主动强化市场思维和创新思维，着力培养选拔了一批懂市场、会管理的企业家和对农民有感情、对合作事业有热情、对干事有激情的专业人才充实到供销合作社队伍。全市选拔引进2080名实力企业家和专业人才加入到供销合作社，拓宽基层社负责人选任渠道，鼓励村支两委负责人、农村能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和回乡创业的



优秀人才入社参选，激发内生活力，合作社人才机制在综合改革中得到有效创新。

六是创新合作经济联合发展机制。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催生出巨大的合作能量，既直接推动了新型合作社经济的发展，又推动合作社经济向联合社经济形态升级发展，出现了由农户走向合作、再由合作社走向联合的新趋势。合则变活，合则出新，联合则众行易趋、行稳致远，广大基层合作社在合作经济实践中既感受到合作的动能，又感受到小合作的缺陷，迫切需要以更开放、更大规模的合作与联合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合作基础上的联合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更高层次的发展，走向联合是合作能量集合的必然，合作与联合是市场竞争择优发展的主流形态。全市自2017年以来，共有1660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自愿跟随实力较强的合作社加入到联合社，现已组建乡镇农合联92个、市县级农合联11个。

#### 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实践价值

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示范市创建工作，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打造了新时代为农服务的综合性组织。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主动适应新时代乡村振兴的新要求，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推进“两组织一平台”建设，构建“四大体系”，构建起新的经营体系、产业体系、合作服务体系，全市供销合作社社有企业发展到156家，供销合作社总资产已达46.1亿元，比2016年增长306%。其中平江县和汨罗市供销合作联社被评为全国先进社，36个供销合作社成为标杆社。

二是推进了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带动了城乡经济要素的全面流动，服务业和加工业的兴起，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岳阳农村到处都可看到，在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推动下，农业“接二连三”，延长产业链，实行产业化、社

会化、合作化、规模化经营，获得较高附加值，农业综合效益明显提升。汨罗市供销合作社以供销为平台，推动产业多元融合。长乐镇甜酒合作社理事长李阳波介绍，该镇甜酒合作服务先后带动了大米种植加工、酒曲制作、瓷坛经营、纸箱包装、汽车运输和农村电商等产业融合发展，甜酒已成为长乐一镇一品的重要品牌。供销合作社综合服务促进了农业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转型，品牌农业、绿色农业、智慧农业、科技农业快速发展，有力地提升了农业现代化水平。

三是农民在供销社综合改革中得到更多实惠。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以为农服务、满足农民需求为出发点，始终围绕农民需求开展综合服务，广大农民在其综合改革中获得更多实惠。供销合作社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能为农民节约开支、降低成本、增产提质，年增经济收益达5.1亿元以上。供销合作社服务在基层，贴近农民，而且惠农服务中心和村惠农服务社的门店就设在农民家门，最了解农民服务需求变化，为农服务方便、快捷、优质。

四是实现了农村经营制度改革创新。岳阳市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突出合作属性，充分发挥合作优势，坚持领办创办农业合作社，引导和组织农民加入合作社，推动农民依托土地、产品、资产、资金等折股入社，使农民变股民，使小户农民坐上供销合作社大船，推动了农村合作经济的较快发展。供销合作社演变为新时代农业经营主体，极大地改变了洞庭湖区农村小农经营方式。供销合作社经济体经营者大都为30多岁、40多岁，年富力强，且是高中甚至大专以上文化的企业家，现代农业、现代经济知识丰富。发生在岳阳市洞庭湖区的这种现象，使我们深刻感受到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推动农村生产力、农村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走向开放合作发展的新时代。



# 大岳阳城市圈产业优化布局研究

邓正华

(湖南理工学院经管学院 湖南岳阳 414000)

现代产业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动力源泉,在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产业布局是指产业在一国或一地区范围内的空间分布和组合的经济现象,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和前提。岳阳市是长江经济带中游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是湖南省一核三极区域发展战略中的首极,优化岳阳产业布局对岳阳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推进湖南深入实施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实现岳阳一三五发展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 一、岳阳产业布局现状

1、T型产业空间布局基本形成。岳阳产业空间分布形成了以长江岸线发展轴为横轴、岳阳县-汨罗-湘阴发展轴为纵轴的T型产业空间布局,长江岸线发展轴以岳阳163公里长江岸线为中轴,分布城陵矶新港产业集聚区、云溪化工区、君山现代农业发展区、华容县工业园区和临湘工业园区,岳阳县-汨罗-湘阴发展轴以107国道为轴,分布岳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汨罗循环产业园区和湘阴县产业园区。岳阳主城区位于两轴交汇处,岳阳主城区产业空间划分核心区和拓展区,核心区以岳阳楼区和南湖新区为中心城区,范围包括洞庭北路-南津港路-赶山路-八字门路,是商贸

物流、金融、房地产、信息服务、文化娱乐、旅游、科研教育等第三产业集聚区;拓展区包括经开区、城陵矶新港区、云溪化工区、君山现代农业发展区,是石油化工、农副产品加工、电力能源、造纸、医药制造、机械制造等地方主导产业集聚区。

2、主导产业各具规模。经过多年建设与发展,岳阳形成了石油化工、农副产品加工、建材、造纸、电力能源等地方主导产业,其中石油化工是岳阳首个千亿产业集群,全市石化及配套规模企业240家,包含丙烯、碳四、芳烃、碳一等4条主产业链。2017年石化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1400亿元,增加值300亿元,分别占全市工业总产值和工业增加值的23%。农副产品加工业2017年总资产规模达6900亿,实现规模工业总产值1250亿元,规模工业增加值84亿元,全市已初步形成粮食(饲料)、油脂、棉麻、畜禽水产、竹木林纸、蔬菜、茶叶加工等一批主导产业。全市农业产业化省级龙头企业总数达到55家,龙头企业主要有道道全、九鼎科技、正大岳阳分公司、喜盈田、新泰和、童记三利和、十三村、汨罗粽子、华容芥菜等。2017年高新技术产业完成产品产值约421.4亿元,增加值约93.3亿元,占GDP比重约

本文系2017年度岳阳市优秀社会科学人才支持计划课题《大岳阳城市圈产业优化布局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邓正华(1974—),湖南华容人,湖南理工学院经管学院博士,副教授,副院长,洞庭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

13%，分布于机械制造、电子信息、农副产品深加工、生物医药等领域，聚集规模优势初步形成。服务业领域不断拓展，服务业中两大传统产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占服务业比重不断提升；旅游产业不断发展壮大，2017年岳阳旅游业接待游客总人数4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420亿元，约占GDP总量比例13%。

3、产业园区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产业园区作为岳阳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主战场，呈现出企业逐步向园区集中，要素逐步向园区聚集，产业逐步向园区集群的态势。全市共有10个省级以上产业园区，其中有国家级产业园区1个（岳阳经济技术开发区）。2017年10个省级园区共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770家，占全市规模工业企业总数的58.3%，园区工业增加值1100亿，占全部规模工业增加值比重75%。

## 二、岳阳产业布局存在的问题

1、产业空间布局不合理。中心城区体量较小。岳阳市经济总量省内第二，但主城区面积与人口在省内居于中上游，2017年岳阳主城区面积97km<sup>2</sup>，位于长沙、株洲、衡阳、湘潭之后，主城区人口103万，位于长沙、株洲、湘潭、常德之后，城市核心区面积不大，第三产业积聚能力和辐射能力不强；组团衔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冷水铺、湖滨、柳林、路口、陆城组团土地利用相对粗放，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明显偏低。湘阴-汨罗组团与长沙产业关联度不强，组团产业规模整体实力不强，产业定位不清晰，缺乏长沙岳阳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和平台。沿江产业带华容-临湘组团产业竞争力不强，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产业定位比较单一。

2、优势产业链不完整。岳阳石油化工产业链产业集中度较高，分布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长岭分公司、中石化集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巴陵石化分公司两大中石化企业，其产值占全市规模工业总产值比重约为10%，全市工业

对中石化企业依赖程度较高，产品结构基础化工丙烯、碳四、芳烃产品领先，缺乏乙烯产品，合成化工产品缺乏有机氧原料、医用化学品、化妆品、工程塑料等产品；农副产品加工业总资产规模大，行业企业数量多，龙头企业规模不大，产业链条较短，全产业链整体收益偏低，种植业和养殖业以出售初级农产品为主，纺织产业主要向江浙地区出售纱锭，缺乏服装鞋帽、床上用品等消费终端品牌。

3、外向型经济规模较小。岳阳拥有湖南省一区一港四口岸平台，但外向型经济规模偏小。2017年，全市进出口总额完成22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5.4%。其中出口16.83亿美元，进口5.9亿美元，顺差10.93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仅占湖南省进出口总额的1/20，在省内位于长沙、株洲、湘潭、衡阳、郴州之后，在长江经济带中部副省级城市中位于九江、宜昌之后。出口商品主要是有机化学品、机电产品、纸及纸板、服装等，其中机电产品占极大比重；进口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有机化学品等，其中农产品所占比重最大。出口商品目的地主要集中在香港、韩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美国。

4、要素集聚能力不强。资金和人才尤其是科技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支撑，是城市发展的核心动力。岳阳市金融资本总量较小，制约了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2017年岳阳金融机构存款总额2100亿元，省内位于长沙、株洲、邵阳、衡阳、郴州、常德之后；金融机构贷款总额1000亿元，省内位于长沙、株洲、邵阳、衡阳、湘潭、常德、郴州之后。岳阳市科技人才从人数上看，总量较小且减少较大：2017年全市人才总数为35440人，平均每万人口人才数量为700人，低于全省平均每万人口人才数量873人，位于长沙、株洲、湘潭、衡阳之后。从分布行业上看，人才分布缺乏均衡性：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个别大型企业、学校和其他事业单位，而规模较小的

民营企业因受科研经费、用人成本等诸多因素影响，科技人才严重短缺。

### 三、优化岳阳产业布局的对策

岳阳产业优化布局应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突出江湖联动、水陆协同，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形成“一核、两轴、多点”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努力形成通道支撑、产业聚集、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现代产业体系，使岳阳成为长江经济带的有影响的产业聚集地。

1、优化一核、两轴空间布局。根据岳阳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建设要求，优化岳阳城区产业布局。拓展岳阳中心城区面积，按照生态新城、滨江新城建设要求，北向建设东风湖、梅溪湖、洛王、冷水铺产城融合区，南向拓展郭镇、赶山路、湖滨等区域，布局和发展科教、生态旅游等产业，使中心城区成为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及新增城市人口重点聚居区；拓展区包括城陵矶新港区、云溪区、君山区、经开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实施“腾笼换鸟”和创新驱动战略，通过大项目布局做大做强临港产业集群，连同其他拓展区打造航运物流、电力能源、电子信息、造纸、石油化工、都市郊区农业、机械制造、生物医药等岳阳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研发与生产基地。长江岸线发展轴华容组团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临湘组团以石油化工配套产业、建材为主导产业，加强两个组团与岳阳城区的产业关联度。明确岳阳县-汨罗-湘阴轴为长岳产业联动发展轴，依托岳阳、长沙产业承接与转移，布局和承接长沙先进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轻工纺织、生物医药、非金属矿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劳动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等产业。

2、规划构建长岳产业协同发展的平台。根据长沙-岳阳两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实际，重点考虑岳阳市湘阴、汨罗和长沙县部分乡镇作为岳长产业联动发展承接带，布局和承接长沙先进制造业、农副产品加工、轻工纺织、生物医药、非

金属矿产品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劳动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转移，探索建立产业集群合作共建示范区，谋划推动产业集群和产业链群的整体转移。共同筹建产业发展“园中园”“共建园”，以园区共建带动形成区域间生产要素、企业主体、产业链条的“合作网络”，进而形成区域间产业协同发展格局。创新产业协同发展体系，以产业链、产业园合作为依托，进行创新协作，联合建设产业技术研究院、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点实验室、区域创新服务中心等协同创新平台，联合创建一批科技企业孵化器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等，通过创新协作体系的构建“黏合”长岳产业协同发展，并为产业的深度融合与无缝对接提供支撑。以长岳产业发展的分工协作为基础，谋划建立长岳产业发展联合会，联合设立重点产业扶持发展基金、联合建立重大项目，分行业建立区域产业发展联盟等，以制度性产业协作体系的建立助推长岳产业的一体化联动发展。

3、推动主导产业集群发展。根据长沙-武汉城市圈的产业布局，按照错位、补位、承接原则，在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下，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提升岳阳传统主导产业竞争力。一是提高传统产业聚集度。整合和引导全省石油化工、电力能源、造纸、农副食品加工、航运物流、汽车等大用水产业及其配套产业在城陵矶、云溪等重点产业园聚集，提高重点产业竞争力和绿色生态发展。二是鼓励岳阳优势产业向制造服务业、配套产业延伸。支持有条件的企业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由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鼓励优势制造业企业“裂变”专业优势，通过业务流程再造，面向行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三是实施产业链行动计划。围绕汽车、新材料、物流、装备制造等产业链建链，培育、引进龙头企业和关键企业；围绕石油化工、电力能源、造纸、农副产品加工、北斗导航等产业链补链，寻找产业链条中缺失的高附加

值和关键环节。

4、强化园区协同发展体制机制。认真落实园区十条加快园区建设的同时，强化园区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是理顺管理。建议由市政府分管领导兼任岳阳市园区办主任，统筹协调全市各县工业园区的发展，城陵矶、云溪、经开区、湘阴等重点园区由市与区县进行共建。二是目标考核。以园区发展质量为重点，科学制定目标考核指标，实行“飞地经济”考核政策，各区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企业由市园区办综合协调，确定重点产业园区和配套产业园区定位，按照产业方向进入合适的园区，对招商区县和落户的园区目标进行双重考核。三是创新管理模式。学习借鉴重庆曙光园区企业化经营、“保姆式”服务的运作模式，将部分管委会独立出来市场化经营，政府只

管宏观、下指标，由园区经营管理机构筹资建设基础设施，自主管理，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工业园区“筑巢引凤”的作用。

5、推进产业降本减负。2016年岳阳市人民政府《岳阳市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意见》出台以来，市级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单位和收费金额有明显下降，政府可考虑制定岳阳优势新兴产业链行动计划，明确岳阳优势新兴产业链的发展目标，加大岳阳优势新兴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措施，重点围绕固定资产投资税费减免、主导产业链群项目用地成本减免、高端人才引进优惠与服务、工业用电价格优惠、企业融资服务与优惠等方面精准发力，进一步出台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举措，切实减轻企业负担，提升企业供给能力，增加企业获得感。





# 我市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民获得感现状与提升路径研究

陈美中

(岳阳市广播电视大学 湖南岳阳 414000)

“获得感”一词是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正处于关键的时期提出的。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提出“多推有利于增添经济发展动力的改革，多推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第一次正式将提升获得感放在改革发展目标的战略高度，表明人民获得感已经成为新形势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和方向，也预示着未来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将获得感作为工作决策部署和实施的重要基点。党的十八大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从全局角度对新时期的我国贫困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这一重大决策部署，提出要顺应广大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农业强起来、农村美起来、农民富起来，其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要增强亿万农民的获得感，“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农民获得感的提升已成为检验精准扶贫、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成效的重要标准。

## 一、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民获得感的时代内涵

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农民获得感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纵深推进、提升提质，对农民获得感内涵的解读也应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在动态中探索规律，在变化中寻找方法，在发展中实现创新。根据一般的理解，“获得感”包含三方面的含义：一是

“获得”，一般侧重利益上的获取，强调真实可见的获得；二是“感受”，一般侧重精神层面的满足和对获得的认可，特别强调相对公平，否则会走向“获得感”的反面“相对剥夺感”；三是“获得感”要可持续，强调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上有不断的获取和新目标。获得感以需求心理为导向，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呈金字塔状，层级由低到高，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主体才能关注并致力于满足下一层次的需求。籍此，农民获得感的内涵也可以从基础、提高、升华层次进行解读：基础层次体现为以收入增加为内涵的和以居住改善为标志的物质获得感；提高层次体现为以政策依据为基础的时代幸福感和以产业发展为渠道的脱贫信心感。升华层次体现为以社会公平为基础的公平认同感、以文化繁荣为象征的精神愉悦感和以素质提升为特征的价值尊严感。

在社会主义新时代、在推进精准扶贫进程中，我们必须牢牢把握农民获得感的四个特征：一是丰富性与层次性，农民获得感来自物质的、精神的，社会的、个人的，内在的、外在的等各个方面，具有低层次、高层次，单一层次、多元层次等区别；二是差异性与主观性，农民获得感的标准不能采用“一根尺子衡量”，获得感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其感受主要以人的

本文系2017年度岳阳市优秀社会科学人才支持计划课题《我市精准扶贫进程中提升农民获得感的路径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美中（1967-），湖南岳阳人，岳阳市广播电视大学党组书记，研究员。

主观意愿来决定；三是时代性与动态性，新的时代背景决定了农民获得感具有不断变化发展的内涵，对农民获得感的解读不再是仅仅满足温饱问题，应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四是持续性与稳定性，农民获得感不是一时一刻，昙花一现，而是农民对幸福生活，自信提升，价值实现的一种长效持续性、稳定性的状态过程。

## 二、岳阳市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民获得感的现状分析

课题组走访、调研了岳阳市五县七区，尤其以国家贫困县平江县、普通县岳阳县、市区经开区为抽样调研对象，历时5个月，通过走访座谈、实地查看、问卷调查等方式，进行了深入调研。课题组设计了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围绕物质获得感、时代幸福感、生活舒适感、脱贫信心感、精神愉悦感、价值尊严感等维度所涵盖的19个问题；共发放调研问卷6000份，回收有效问卷4820份；访谈贫困户508人，访谈农村非贫困户196人，访谈县、镇、区扶贫专干和各单位派出的扶贫干部102人。我们对调查问卷和访谈进行了汇总。下表为调查问卷汇总表：

农民获得感		非常满意	基本满意	不太满意	备注
物质获得感	家庭人均年收入	52% (3680元以上)	28% (3000元~3680元)	9% (2000元~3000元)	11% (2000元以下)
	家庭收入水平及结构	27%	62%	11%	
时代幸福感	新农村合作医疗保障	56%	41%	3%	
	职业技能培训和子女获得的教育帮扶	61%	35%	4%	
	就业帮扶	43%	53%	4%	
生活舒适感	村民居住条件的改善	47%	51%	2%	
	乡村基础设施的改善	58%	38%	2%	
	乡村周边环境的改善	49%	50%	1%	
脱贫信心感	产业扶贫中获得的实惠	46%	51%	3%	
精神愉悦感	乡村文化设施和活动开展	51%	41%	8%	
	婚丧简办及移风易俗	51%	42%	7%	
自我实现感	未来生活的信心	(有)95%	(无)5%		

从上表和访谈记录可看出：在我市精准扶贫进程中，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反映得到了真正的实惠，获得感有较大提升，主要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贫困户家庭收入水平及结构趋于合理，对农村基础设施、住房和饮水、卫生等的改善较满意，尤其是我市空心房整治给农民带来很多实惠，拆除危旧土坯房（空心房）7万多平方米，并及时对所拆区域进行土地平整、垃圾处理，实施复垦复种、基础建设、绿化美化，农民的物质获得感大大增强。如平江县凤凰山村的贫困农民说：房子建好后，眼睛都亮了；二是村级服务平台的推广使用使贫困户的识别、退出及扶贫资金的公开更为透明，我市推行的“一线工作法”推进了精准扶贫工作，加快了为农民办事的效率，极大缓解干群关系，增强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赖，农民公平认同感有较大提升；三是农民普遍对医疗、教育和就业的扶贫较为满意，其时代幸福感有较大提升；四是农民在产业扶贫中得到的实惠看得见、摸得到，其脱贫信心感不断提升；五是随着农村党建、农村文化站、法律援助、科普、电视、网络不断深入农村居民，农民对乡村文化设施和活动开展及婚丧简办及移风易俗等文明生活方式普及较为满意，农民的精神愉悦感有较大提升；六是国家三农政策的不断深入，基层党建的务实作为，农民的职业自豪感初步激发，价值尊严感有所提升。

但也可看出：在我市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民获得感提升还存在一些问题，突出问题是获得感的不充分和不平衡，在提升农民获得感的路径上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重工作过程的检查，对获得效果验收和持久性机制关注较少，物质获得感有待提升。调查问卷中有11%的贫困户对其家庭收入水平还不太满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存在单一和偏差。3%的贫困户对大多数中短期产业扶贫带来的收入增加还不满意。访谈中52%的农民认为尽管现在农村政

策好，但种粮的收入较其他行业还是增加很少，而外出务工者因其劳动技术含量低，获得的工资也相应较低。69%的扶贫专干和贫困户反映各级扶贫部门都很重视工作过程的检查，但对农民获得的实际效果关注较少，保障扶贫项目和举措效果的可持久性机制尚不完善。如不少地方的扶贫是通过扶植小规模家庭式的养殖，各级扶贫部门对发给贫困户的养殖种和扶贫款是否落实到位查得很严，但较少关注未形成规模的养殖业的实际效果；而且因农民大多没有相应的技术，致使因家禽、牲畜的发病死亡而失收，有的贫困户因懒惰或因担心家禽、牲畜不定时的发病而在家禽、牲畜还没出栏前就提前将其捕杀食用，这样的产业扶贫效果大打折扣。还如政府给一些贫困村引入适宜本地的种植项目时，对项目引入工程很重视，但对项目产品的适销渠道和可持续销售较少考虑，导致部分产品滞销而欠收。另外，45%的扶贫干部反映其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应对上面的检查资料上，每个月走访一次贫困户的时间都是挤出来的，更不用说沉下心来为贫困户谋发展找出路了。

二是重数字指标考核，对思想共识形成和统筹性方案关注较少，公平认同感有待提升。35%的农民和扶贫干部认为尽管国家精准扶贫识别政策科学严格，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贫困户获取信息渠道有限或部分具体操作人员工作不细致，再加上各级政府注重数字指标考核，对扶贫政策、扶贫工作人员、贫困户的思想共识关注较少，贫困户跟政府相关部门沟通较少，使贫困户动态掌握不精准，从而使贫困户识别和扶贫资源分配存在一定误差。同时，调研中，75%的扶贫工作人员反映当前国家的贫困户“一票否决”制度在扶贫工作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在实施中也存在重数字指标考核的倾向，部分贫困户因此经常提不合理要求，如在城区有房还要求帮助进行易地搬迁，被拒绝的后果就是这些贫困户表示

对扶贫工作不满意，当地的扶贫工作被否定，给基层的扶贫工作带来被动。另外政府对贫困村和非贫困村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投入及贫困户帮扶力度上，政策的连续性和系统性不够，致使贫困村脱贫致富后条件越来越好，而那些并不富裕的非贫困村却发展受限，非贫困村中的贫困户得到的资助较少，造成部分群众认为政策缺乏公平和合理。

三是重产业项目引进，对农民潜能培养关注较少，脱贫信心感有待提升。访谈中有45%的村民反映，各级扶贫部门对产业扶贫项目的引进都很重视，但对各地贫困农民有针对性地教育、培训、指导等潜能培养很少，对如何实现农村人才培养的可持续性更是关注少，缺乏农民的智力人才培养机制；大部分政府组织的培训重形式轻实效，使农民参训积极性不高；加上农民素质普遍低下，导致农民在扶贫项目中主要只能承担机械、简单的劳动，大多无法涉及技术和管理岗位。调查中69%的贫困户反映因家庭成员没有技术，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无从下手，也不敢去发展产业，对真正脱贫缺乏信心和内生动力。15%的农民和45%的扶贫干部反映当前扶贫工作对农民参与的积极性调动少，部分干部仍习惯于扮演“给予者”，不重视发挥贫困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聪明才智，造成部分贫困户等、靠、要等懒惰思想严重；地方政府在编制本土精准脱贫规划、设计精准脱贫路径、制定帮扶措施等方面，忽视贫困户真实意愿，包操包办，致使贫困户心生猜忌和抱怨等。56%的农民反映部分种养殖大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在发展扶贫产业中，重扶贫政策落实中的产业规模布局，轻对贫困户的辐射带动，重争取资金扶持，轻农户参与和受益，造成贫困户对产业发展和脱贫缺乏信心。45%的非贫困户和扶贫工作人员还反映产业扶贫应让非贫困户能参与其中。另外，45%的农民反映大多数的扶贫还没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对收入增加的可持续



续性信心不足。

四是重扶贫政策落实，对政策及时宣传和科学理念植入关注较少，时代幸福感有待提升。65%的贫困户和村干部反映我市扶贫政策从上到下落实得紧，但对政策的宣传不及时，一些基层干部对国家脱贫政策、脱贫项目和脱贫资金也缺乏足够知晓度，存在不宣传、少宣传、乱宣传等现象，造成部分群众对村组和乡镇干部缺乏信任，对扶贫政策及扶贫措施误解，尤其对那些长期外出打工贫困户的政策宣传更是存在盲点死角。47%的村民反映农村健康生活理念和科学知识缺失，政府在对农民科学生活习惯等科学理念的植入上关注少，也未采取有效举措，使农村中因生活习惯不科学引发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数患病农民由于对疾病常识了解少，经常小病在家拖、大病去诊所，结果把小病拖成了大病，把大病拖成了绝症，由于某些大病不在救助范围之内，因病致贫的情况占了贫困户的80%以上。这些都让农民在精准扶贫进程中感受不到时代幸福感。

五是重物质帮扶方式，对文化扶贫扶持和正向引导关注较少，精神愉悦感有待提升。20%的农民和50%的扶贫干部反映当前扶贫工作的开展都很重视物质帮扶方式，也已初见实效，但农村文化扶贫扶持和农民精神文化引导却很少。62%的农民反映农村文化扶贫扶持力度不够大，文化实施还不够齐全，活动开展还不经常，对农民的精神文化引导很缺失，很多农民平时主要还是以打牌为娱乐，甚至还有不少农民经常参与地下六合彩活动。52%的农民反映当前各村庄都是三留对象（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缺失生机和活力；部分边远山区的男性大龄青年找不到对象，生活动力低下。60%的农民反映，由于留守儿童多，青少年的教育问题突出，给留守老人和在外务工的农民增加很多思想压力，精神愉悦感不强。

六是重输血性质扶贫，对造血性质扶持和自硬性引导关注较少，价值尊严感有待提升。55%的贫困户反映精准扶贫政策对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投入确实很大，但大多数是输血式扶贫，在造血式扶持上较为缺失。部分产业扶贫项目只看重“短、平、快”，未充分考虑贫困户能力需求和市场空间容量要求，追求规模、重视前端、缺乏龙头，缺少产业链的支撑，忽略三五年后的过剩隐患和后端销路问题，使产业缺乏后劲；同时在家门口就业的产业扶贫尚不够。45%的农民反映各级基层政府在扶持贫困户发展特色产业，增强自主脱贫能力方面引导、培训不够，发挥农民自身优势的“强身健体”少，农民自我价值难以体现，尤其是青年农民的自强意识缺乏；60%的农民反映，农民的职业定位大多还是干粗重的农活，拿较低的收入，缺乏保障，再加上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农民职业自豪感缺失，价值尊严感较为低下。

由此可见，在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切实从农民需求出发，让农民共享我市改革发展的成果，持续提升贫困农民的获得感，我们仍然面临巨大挑战，可谓任重道远。

### 三、我市精准扶贫进程中农民获得感的路径探索

我市在推进精准扶贫工作、增强农民获得感的道路上，要进一步在精准施策上加大力度，在精准推进上加快速度，在精准落地上加紧进度，切实增强农民的获得感，并着重从以下六个方面全面推进：

#### 1. 加强组织保障，着力增强农民的脱贫信心

我市精准扶贫工作，要在完善“三个责任”（党政责任，部门责任和社会责任）的组织保障下，着力增强贫困农民的脱贫信念。一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政牵头、部门落实、企业参与、社会监督”的架构，注重发挥扶贫专人、专部（门）的核心作用，切实赋予足够的人权、财权



和决策权。二是注重帮扶工作队的突出作用，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设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充分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着重做好“扶贫+党建”的结合文章，注重从乡、村扶贫一线挖掘先进典型，充实基层党建扶贫力量，增强贫困农民脱贫致富的踏实信赖感。三是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经费倾斜、人事匹配、考核优先”的激励机制，对于在扶贫工作中涌现的先进个人与组织，要切实做到重视、重奖、重用，同时加强对基层扶贫工作的考核管理力度，加强对基层各类资源的调控力度，科学调研和规划，量化扶贫工作的任务和目标，制定工作日程表并发布于村、乡一级显要位置，公之于众，晓之以民，以进一步增强贫困农民的脱贫信念。

#### 2. 加大宣传教育，着力构建农民的精神家园

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的进程中，脱贫是暂时目标，乡村振兴是终极目标。为实现这一历史使命，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营造全民全社会的时代责任感，树立新时代的乡村文明新风。一是开展文化下乡，提振群众精气神。坚持扶贫产业与文化下乡“两手抓”，鼓励合作企业参与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培育民间文艺队伍，用文化提振贫困户的精气神，“让贫困群众的心热起来、行动起来”。利用冬季农闲季节和节假日积极举办各类文体活动，积极开展送戏下乡、文艺汇演等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高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满意度。二是营造文明村风。开展“五好家庭”、“最美乡村”等多种形式的创建和评选活动，让贫困户了解身边人的先进事迹，学有目标、做有标杆，促进以富带贫、共同进步。三是突出脱贫典范，弘扬扶贫正能量。选拔具有典型性的扶贫、脱贫、带头致富的典型事例、人物，通过媒体等平台多元化宣传，弘扬“贫困耻辱”、“脱贫光荣”的思想理念；通过召开市、县、乡、村各级表彰大会，邀请脱贫致

富代表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与做法，大肆宣传脱贫致富的事迹人物，让广大贫困户羡慕憧憬，付诸行动，让他们“想脱贫、要致富”。

#### 3. 推进政策落地，着力促进社会公平

精准扶贫，贵在精准，难在精准，关键在精准。针对精准扶贫政策落实中存在的偏差和不到位，需要进一步改进和加强，以确保国家脱贫攻坚战略决策的顺利实施。一是基础工作上，牢牢把握精准识别原则与程序，对贫困户进行建档立卡和动态调整管理，解决“应入而未入、不入而乱入、新增需补入”，以及在帮扶对象与力度上存在的凭关系、用职权、有偏袒和不科学的问题，确保政策实施的公平公正。二是帮扶措施上，全面广泛入户走访，分析致贫原因，对症下药解决贫困户的实际困难，制订行之有效的帮扶措施，发挥主体地位作用，增强脱贫致富内生动力，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致富”达到“我能致富”。三是督促检查上，加大问责力度，强化尽责意识，健全责任追究，对实施部门与监管部门同时问责，解决在工作上违规违纪引起不满形成“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弄虚作假，以权谋私，失职渎职”行为，常态化监督与问责。严格退出机制保障，协调地区和谐发展，防止“虚增收入，虚假签字”走形式走过场的“被退出，被脱贫”，确保贫困户的“一超过、两不愁、三保障”和贫困村的“两个确保、两个完善”，并对已退出和拟退出的贫困户建立政策保障机制。

#### 4. 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着力拓宽农民的致富之路

农民获得感的增强，农业经济建设是关键，拓宽农民的致富之路，关键在于农村产业发展。一要特色化发展。要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建构各具特色的乡村产业集群，力争实现一村（乡）一特色，一地一项目。山林地区着重发展果树、经济作物栽培、家禽养殖；湖区着重推动渔业水产畜牧行业，打造湖湘特色农业品牌；平原地区主打粮食作物、农产品加工、观光农业

等，二要产业化发展，即要促进规模化生产，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规模化生产。通过产业布局的宏观调控，整合优势资源，形成系统合力。三要市场化经营，利用互联网+的销售模式，构建产销一体化的多维平台。整合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如岳阳同乡会）等人脉资源，构建全国性的农产品营销网络；加强道路、农产市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实体营销体系；利用信息技术，整合各类线上营销网络平台，构建综合性的线上营销平台。

#### 5. 推进城乡统筹，提升社会公共服务水平

构建城乡统筹、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农民获得感提升的重要途径。一是要加大对贫困户的政策兜底，加强社会福利。进一步完善兜底对象标准，将扶贫低保户、低保户、五保户统一纳入兜底对象，对扶贫低保户可采取阶段性施保。全面准确执行特困群众评定标准，建议将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线确定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二是在易地扶贫搬迁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贫困地区应统筹布局城乡地域空间系统，形成“大城镇—中等城镇—小城镇—县城—中心镇—重点镇—中心村（社区）”多级聚落体系，为贫困地区实现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空间支撑。贫困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并结合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过程中，将涉及大量水、电、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应按照“规模适宜、功能合理、经济安全、环境整洁、宜居宜业”的原则，注重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综合性与协调性。三是加快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和乡村文明和生态建设。加强生态教育，提升农民生态文明意识、生态伦理意识、生态责任意识、生态保护意识、生态法律意识、生态审美意识，引导村民自觉实践乡村绿色生活，

减少生产生活中污染物的产生，维护乡村良好的生态环境。四是要更进一步将文明村镇建设、空心房改造、规范集中建房、加强基层组织整治结合起来，构建村级公共服务平台，完善“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让农民享受更好的惠民服务。

#### 6. 突出人才培养，实现农民的价值追求

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精准扶贫进程中，提升农民自我价值体现，人才培养是关键。农村人才的培养是农民获得感提升的关键之策，只有人才成长效能的彰显，才是农民获得感的长远、持续之计，才是农民成为社会主人、命运主宰、价值实现的根本所在。为此，可重点做好以下项目：一是精心实施和推进新一轮“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依托岳阳电大、岳阳职院等地方高校，在人员、经费、政策等方面加大力度，继续着力培养一批“留得住、用得上、懂经营、会管理”的岳阳本土农村实用人才。二是延伸社区教育，不断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和文化水平，要将社区教育延伸到农村，引导农民养成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助力农民形成积极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道德规范，建设良好的农村文化。三是加强职业教育，助力农民脱贫。职业院校要实现“精准招生”，引导贫困学生接受职业教育；要实现“精准资助”，完善、构建资助政策体系，建议对贫困中、高职院校学生每年补助一定的扶贫专项助学金，减免一定的生活费；要重视创新和实践教育，实现“精准就业”，通过工学交替、顶岗实习、订单培养等方式，实现学生与员工、学习与工作、招生与招工相结合，确保贫困学生就业，通过多种举措，确保所有贫困毕业生就业或创业，从而达到“一人长期就业、全家稳定脱贫”的目的。

# 岳阳市人才队伍现状调查与分析

刘 理

(湖南理工学院 湖南岳阳 414000)

岳阳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发展战略,提出为适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增长由要素投入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创新驱动发展关键是人才,2015年以来,岳阳市以更加开放创新的人才理念,推出全新的人才政策体系,以“巴陵人才工程”为抓手,通过“四海揽才”等计划,累积带动引进人才3万余人,堪称岳阳市史上最强人才创新政策。随着“巴陵人才工程”的推进,全市人才队伍得到改善,人才队伍的创新活力得到一定程度激发。

## 一、岳阳市人才队伍的现状

一般说来,人才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人才区别于一般人力而言是有知识和技能的人;二是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三是对社会有所贡献。这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人才具有不同的层次和类型,本研究所涉及的人才类型,主要是目前岳阳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相对紧缺的专业技术人才、农村实用人才、非公经济人才及高层次创新人才。

### (一) 专业技术人才现状

截止2018年7月,全市事业单位有专业技术人

员64215人,工勤技术人员21542人,技师与高级技师573人。如表1、表2、表3示:

表1.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结构(截止2018年7月)

总数(人)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其他等级人员
64215	19529	34172	9878	636
高级职称人数占全体专业技术职称人数比: 15%				

表2.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学历与学位结构(截止2018年7月)

总数(人)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	本科学历
64215	12(其中教师4人)	442(其中教师208人)	663(其中教师338人)	34412(其中教师23914人)
占比	0.71%	1%	53%	

表3.全市工勤技术人员状况(截止2018年7月)

总数(人)	初级工及普通工(人)	中级工(人)	高级工(人)	技师与高级技师(人)
21542	5964	7506	7480	573
技师以上人数占全体工勤技术人员比: 2.7%				

### (二) 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现状

全市目前有3406个农业经营单位,96.13万农业经营户,农业生产经营人员102.68万人,其中1.07万个规模农业经营户,农业经营单位经营人员2.32万人。全市从事农业及农业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1880人。如表4、表5、表6、表7所示:

本文系2017年度岳阳市优秀社会科学人才支持计划课题《岳阳市人才队伍现状及问题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理(1965-),男,湖南汨罗人,教育学博士,湖南理工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刘时伟(1992-),女,湖南汨罗人,岳阳广播电视大学教师,硕士。

表4.全市规模农业经营户经营人员学历结构（截止2017年初）

总数（人）	大专及以上	高中或中专	初中	小学	未上过学
32000	573	6240	19485	5411	291
占比	1.79%	19.5%	60.89%	16.91%	0.91%

表5.全市农业生产经营单位经营人员学历结构（截止2017年初）

总数（人）	大专及以上	高中或中专	初中	小学	未上过学
23200	1796	7306	11159	2719	220
占比	7.74%	31.49%	48.1%	11.72%	0.95%

表6.全市农业专业技术人员职称结构（截止2018年7月）

总数（人）	初级职称	中级职称	高级职称	其他等级人员
1880	729	666	482	3

高级职称人数占全体专业技术职称人数比：25%

表7.全市农业技术人员学历与学位结构（截止2018年7月）

总数（人）	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	研究生学历	本科学历
1180	4	4	9	590
占比	0.7%	0.8%	50%	

### （三）非公经济人才队伍现状

截至2017年底，全市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44463户，其中，企业10388户，个体工商户34075户，市场主体总数268258户。现有登记注册的企业近2万家，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186家。非公有制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70%，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非公企业人才素质不强，据调查，全市规模以上民营企业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仅7.3%，高中以下学历的占48.9%，其中初中以下学历的20.7%。岳阳楼区新的社会阶层23位代表人士，其中研究生学历仅1人，本科3人，中学学历者占40%。多数民营企业经营者起步于房地产、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成长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的环境，往往靠政策扶持致富，难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市场新环境和“互联网+”新背景，超一半的民营企业骨干是近亲繁殖的“富二代”。

### （四）高层次创新人才队伍现状

1.科技创新人才及人才团队。目前，全市共有科技创新人才4.5万人，具有博士学位的317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90人，另有具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9人。市科技智库专家87位，湖南省领军人才17人，会计领军人才6人，21人列入湖南省“333”、“555”创新人才工程。省、市级科技人才团队59个，这些团队分布在石油化工、电磁装备、生物医药、建筑工程技术及茶叶深加工等领域，33个团队被列入岳阳市“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团队支持计划”。有19家企业科技协会，科技创新创业协会有核心骨干98人。

2.市重点人才支持计划人选。自2015年实施市重点人才支持计划以来，截止目前共有市级重点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410人，如表8：

表8.岳阳市重点人才支持计划人选

人才类别	巴陵青年英才	文艺岳家军	岳阳名师	岳阳名医	扎根基层优秀人才	非遗名师传艺	优秀社科人才	巴陵卓越工程师	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	巴陵工匠	巾帼英才	市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人数	20	36	38	39	40	14	6	20	18	39	20	120

3.柔性引进挂职专家队伍。自2017年始，实施了“百名专家挂职岳阳”柔性引才行动计划，计划三年引进百名专家。目前，已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南大学等名校引进高端人才90名，这些专家全部具有博士学历或正高级职称，其中国家千人计划1人、教授26人、副教授50人、高级工程师3人。

## 二、岳阳市人才队伍建设成效

### （一）科技创新要素加快汇聚

目前，全市科技人才已达7.8万人，其中自然科学技术人才4.5万人，万人专业技术人员数超200人（居湖南省第二位），各类人才干事创业的热情得到了一定激发。近年，全市实施自主创新引



导专项82个,带动实现科技投入26.8亿元、利税25.2亿元;争取国家及省重点科技项目705个,到位科技项目资金2.3亿元,其中国家“863”计划4个、省重大科技专项14个;累积实现专利申请量8800件、授权6100件,2017年全市有效发明专利1499件。2017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7项、省科技进步奖36项,签订技术合同286项,技术合同成交额3.27亿元。创建了岳阳国家农业科技园,先后培育省级高新区4个,国家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院士工作站、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8家,省级农村农业信息化服务站72个,临湘市还与上海大学共建“新材料与绿色智能制造高新技术产业孵化基地、研究院”;关注了人才团队建设,培育了省市两级科技创新人才团队59家,组建市级技术创新平台75家,国家磁力设备检验检测中心落户岳阳。组建了100人的创业专家咨询团和160人的创业培训讲师团,全程开展“创业导师护航计划”和“创业引领者行动”。

### (二)人才干事创业的政策环境基本具备

制定并认真实施了《巴陵人才工程实施方案》、《关于加强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工作的实施办法(试行)》等政策文件,坚持人才引进与培训提升相结合,实施“十百千”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和骨干人才培养计划,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知名高校及上海、深圳、苏州等地合作,异地举办党政领导干部、企业家等高级专题培训班75个,培训8500余人次。举办“巴陵名师讲堂”数十期,邀请海外学者、国内著名高校教授、各领域专家等,来岳阳为全市党政干部、人才、企业家作专题讲座,培训1.5万余人次。党管人才落在实处。自2015年3月至2018年7月,市委组织部王瑰曙同志先后主持或出席人才主题活动40多场次,平均每月1次。市委书记、市长定期看望在岳外籍专家、教授;定期组织高端人才休假疗养、健康体检;广泛听取专家人才的意见和诉求;高规格召开了两次“巴陵人才工程推进

会”,对优秀人才和团队予以表彰。

重视人才工作制度建设。制定了高层次人才住房保障、服务保障等系列人才政策,并出台了《高层次专家来岳挂职管理暂行规定》,为人才在岳阳干事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与政策环境。岳阳还与17所知名高校签订《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与这些高校建立了长期稳定的人才合作机制。在香港金融管理学院建立海外人才引进及培训基地。这些举措,为岳阳人才引进提供了畅通渠道。

### (三)人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显著

人才在科技创新引领中的作用显著。仅2017年,全市有446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研发项目917项,全年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618亿元,增加值占GDP比重近19%。12家企业38个产品被列入全省“两型”产品。湘阴县成立以县长为组长的“科技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大力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起”战略,致力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县域每万人发明专利数位居全省前列,2017年该县先后获评“湖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县”。据统计,人才和科技对岳阳经济发展贡献率达54.9%。

人才在农业经济中的作用发挥同样显著。组织各级科技特派员185人到212个贫困村开展科技培训和科技服务,开展科技培训553场次,培训新型农技人员和农民1.6万人次,指导4120户农户直接参加创业项目。如君山区启动的“银色人才”工程项目,引导24位市、区两级退休专业技术人员签约16家农业产业基地,为该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培育了大批科技示范户和致富典型。

柔性引进挂职专家发挥了积极作用。许多挂职专家90%的时间在岳工作,为助推岳阳发展积极作为。专家们在医疗新技术应用、黑臭水体整治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一年来挂职专家参与各类调研、咨询和评审会近1400场次,提出有效意见与建议近1300多条。

### 三、岳阳市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 (一) 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 1. 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结构失衡

从队伍结构来看，目前全市存在结构不平衡：一是专业技术行业分布上，教学人员多（占比62%），实用技术人员少（工程技术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占比仅9%）（见表9）；二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人才分布严重失衡，技师和高级技师仅573人，分布在农林牧渔等领域的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少（见表10）；三是高学历人才分布不均衡，全市317名博士，其中占比71%的226名在湖南理工学院，这些博士大多“养在深闺”，参与企业创新及其它经济领域实战活动不多。

表9. 全市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行业分布状况（截止2018年7月）

总数（人）	教学人员	卫生技术人员	工程技术人员	农业技术人员	会计人员	科研人员
64215	39849	14186	4142	1880	1437	200
占比	62%	22%	6%	3%	2%	0.3%

表10. 全市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行业分布状况（截止2018年7月）

总数（人）	教育行业	职教	医疗卫生	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	农、林、牧、渔
9878	5288	221	3277	190	1166
占比	53%	2%	33%	1%	11%

##### 2. 人才队伍总体质量偏低

全市64215名专业技术人员，研究生学历者仅663人，占1%；

大专以下学历者29176人，占45%。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仅9878人，占15%，近2万名专业技术人员只是初级职称。工程技术人员素质不高，以建筑行业为例，具有设计师资格的2568人，18625名施工人员中65%以上只有初中及以下学历。农业生产经营人员素质偏低，全市从事规模农业经营的从业人员3.2万人，大专以上学历者仅573人，占1.79%；78.7%的人只有初中以下学历。高端专业人才缺乏。

##### 3. 区域整体创新实力不强

与创新驱动的要求相比，我市在衡量整体创新实力的科技平台、高新技术企业、发明专利等诸多方面均有一定差距，直接体现社会创新力的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我市只及芜湖市十分之一。表11是我市与同为长江沿岸开放城市安徽芜湖市的比较。

表11. 岳阳市与芜湖市科技创新相关指标比较（2017年数据）

项目地区	人口（万）	生产总量（亿）	财政收入（亿）	省级以上工程技术中心（家）	高新技术企业（家）	年专利授权量（件）	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件）
岳阳市	573	3258	318	18	196	1782	2.64
芜湖市	385	3066	558	98	520	8910	26.1

##### 4. 高层次人才团队严重不足

我市近年来加快了人才引进步伐，人才数量有了大幅提升，但人才团队严重不足：全市省市两级科技创新团队仅59个，纳入市重点人才支持计划的团队仅33个，其中高层次科技创新团队更少。而芜湖市有市、区（县）重点扶持的“高层次科技团队”105个。由于高层次团队少，致使引进的人才大多是“散兵游勇”，缺乏协同研究的平台，研发创新能力因此大受制约。

#### (二) 几点政策建议

##### 1. 进一步加强人才政策供给

目前，我市人才政策的重点是引进，人才引进以后的配套管理政策供给则显得不足，加之不少企业“重生产、轻研发”“重管理、轻技术”观念依然存在。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致使人才流失现象普遍，企业在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方面陷入“引进一流失一再引进一再流失”的怪圈。加之岳阳高等教育欠发达，只有一所本科高校，缺乏充足的学科平台，进一步导致难引“金凤凰”。

为此，一方面，需要完善人才引进配套，加强政策供给，优化引进人才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制定人才分类评价办法，尤其对高端研发人才实

施“战略岗位”管理，为他们潜心研发创造宽松环境。同时，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多种媒体，广泛宣传各项人才政策，及时宣传全市各地人才工作先进典型，提高全社会对人才工作关注度，如安徽芜湖市这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

### 2.进一步加强人才团队建设

按照团队需要引进人才，加强团队领军人才和高层次科技创新团队的引进与培育，让人才有队可归，应成为我市人才工作的重点。包括柔性引进专家，也应根据人才团队培育与建设需要，重点引进高水平团队带头人，以盘活岳阳人才资源。建议政府出台高层次人才团队建设及创新创业管理办法，扶持其创新创业。这方面，芜湖市的做法值得借鉴：根据人才团队实际，每个团队由市（或县、区）给与300万元到2000万元不等的创新创业扶持经费。同时，要加强与驻岳大型国有企业及湖南理工学院的联系，发挥他们在人才团队培育方面的积极作用。如湖南理工学院有博士226人、教授139人，又如巴陵石化有技师和高级技师498人，如何通过政策引导这些高学历、高职称和高技能人才在高层次人才团队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助推岳阳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值得认真探索。

### 3.进一步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引进和培养的人才不是摆看的，而是要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有效助推作用的。人才的知识技能只有与社会生产与实践结合才能产生效益。一方面要积极引进和挖掘人才，同时要为人才在干事创业中服务与贡献社会搭建平台，确保人才有实事可干、有实业可创。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有企业头脑的科学家和有科学头脑的企

业家相结合，致力于推动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如芜湖市出台了《知识产权助推产业创新发展若干政策规定》，有效激发了人才知识创新对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

从我市目前人才行业分布看，教师是专业技术人才中的主体。建议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并支持有潜力和资源的教师人员凭借知识创新创业，像岳泰集团总裁徐伟、湖南龙舟农机有限公司总裁王术平等岳阳本土优秀企业家，就是曾经从教师岗位创业成功的典型。

### 4.进一步加大科技研发支持

科技研发投入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市经济社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因素。目前全市万人研究与试验发展（R&D）研究人员不足7人，列湖南省第五位。2017年全市R&D经费投入60.3亿元，位列湖南省第二，但R&D经费投入占GDP比重1.74%，全省排第四。而同年安徽排名第二的芜湖市R&D经费投入总量70.4亿元，占GDP比重2.74%。2017年岳阳市规模以上企业中开展了研发项目的446家，而同年芜湖市开展研发的企业有1634家。科技研发与创新活动，可为企业带来丰厚回报：2017年芜湖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296亿元；而同年岳阳市规模工业企业总利润153亿元，两者相差近一倍。为此，岳阳应加大研发投入，为企业技术创新与核心竞争力提升提供有力保障，这对提升岳阳规模企业品味与档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落实“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的内在要求。

# “改革学”刍议

邓伟志

改革要深化迫切需要用改革的理论来指导。新时代需要新作为，新作为需要新学科。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完全有条件、有可能从实践中提升出改革的理论。习近平说：“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这就意味着中国更加需要学科化的改革理论。一门新兴的“改革学”正在“应”改革开放再出发之“运”而生。

改革学是以改革为研究对象、探讨改革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是研究改革的目的意义、战略战术、经验教训、演化历程、评估标准以及中国特点的学科。改革涉及的面很广，至少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方面，以及这几个方面的结构、机制、规范、法律、道德、理念、政策、管理方式等内容。改革学理论的学科化是改革和继续改革成功的先声。不消说，改革学理论的滞后和缺失，也会使得改革事业的某些方面出现短板。

## 改革学应当研究中国改革的起点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改革号角，揭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序幕。会议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决策。会议要求改变资料图片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

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会议接连用了两个“改变”，足见改革态度的坚定。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如此旗帜鲜明地号召改革开放，成为历史的转折，是因为在这之前，11月10日至12月13日成功地召开了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作会议开得生动活泼，民主气氛十分浓厚。与会者敢于批评会议主持人。很多发言有重大突破，富有拨乱反正的性质。会议的结论超出了会议的预定计划。会议提出：“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需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把改革开放提到“方针”的高度，这也是第一次。

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邓小平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文字尖锐泼辣，一针见血，是在为改革开放扫除障碍。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结出改革的累累硕果，正是因为中央工作会议开得“繁花似锦”。

那么，在鲜花盛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前有没有花蕾呢？有！那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了经胡耀邦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9期。

作者简介：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会学会顾问。



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这篇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天新华社转发。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也陆续转载。说“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报纸”，换言之就是还有些省市区没有很快转载。这说明看法不完全一致。上层也有个别人认为《理论动态》文章是“砍旗”。马克思说，“真理是燧石”，越打越发光。半年以后，思想大体统一，真理标准讨论成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导思想。理论先行，改革开放的硕果是在12月结出的，“花蕾”则是在5月萌发的。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紧锣密鼓开会的时候，寒冷、饥饿、困苦的安徽省凤阳县凤梨人民公社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着生命的危险按下手印，将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单干。此举是秘密进行的。小岗人写下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可是不久，公社知道了吓得要死，允许他试验一年。县委知道了吓了一跳，但见他们生活有改善，同意他们试验三年。省委见小岗村第一年粮食产量是前五年的总和，同意他们试验五年。有文章省去了这段历史，笼统地说，“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不会像北京的长安街那样笔直，中央的支持是后来的事。

把历史简单化是对历史的轻率。要知道，思想大解放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有不解放的地方，三中全会的态度是“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会议接连用了两个“不许”。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向“两个不许”乃至“三个不许”的人表示：“你们走阳关道，让我走走独木桥试试。”当“独木桥”带来产量增

加、收入提高以后，才有中央的“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发达地区不可以”。再过些日子才有了像有些文章所说的那样，“受到中央的重视与支持”。中央表示“可以……，可以……，也可以……”。再过些日子，也就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五年后，才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伟大创举”一说。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完整的描述应当是：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必要的统一经营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

一般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给农户经营，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承包合同。具体形式有：（1）包干到户。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订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农民自己所有。（2）包产到户。实行定产量、定投资、定工分，超产归自己，减产赔偿。目前，绝大部分地区采用的是包干到户的形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主要实现形式，主要生产资料仍归集体所有；在分配方面仍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在生产经营活动中，集体和家庭有分有合。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走土地私有化的道路，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既发挥了集体统一经营的优越性，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适应我国农业特点和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管理水平的一种较好的经济形式。到1983年初，全国农村已有93%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这段历史是典型的实践出真知。这有力地说明认识是个过程，说明存在决定意识，说明先有存在，

后有认识,说明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

上述安徽小岗村的改革,使得农村博得了“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的评价。中国的改革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说法也是以此为依据的。

### 改革学应当研究改革的历程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国40年的改革是一以贯之的,也可以从进程的特点和侧重划分若干阶段。现在有两种划分法,一是分三个阶段,二是分五个阶段,都有道理,前后相继,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很难斩钉截铁、截然分开的。不过五分法似乎更容易接受,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是改革的酝酿起步和局部试验(1978年12月—1984年9月)。这一阶段就是前面讲到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阶段和特区确立阶段。1978年底香港南洋商业银行庄世平、罗新汉等一行数人来广东汕头。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吴南生与他们谈起如何改变贫困面貌。罗新汉反问吴南生:“你们敢不敢搞自由港?”接着罗新汉讲起亚洲的“四小龙”如何如何。“四小龙”是指经济上发展得比较快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他们搞“出口加工区”,出口加工区在香港称“自由港”。

“罗新汉之问”引发了吴南生的思考。吴南生立即到广州向习仲勋汇报,习仲勋赞成。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习仲勋又向华国锋汇报,华国锋也赞成。习仲勋为广东向华国锋要权,华国锋给权。习仲勋向邓小平请示名称叫什么好,邓小平说“叫特区”,从此特区便在中国大地上如日中天。1979年4月份,中央决定办五个特区,这就是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的厦门,还有上海的崇明岛。香港总商会的人提出:“你无论如何也得立法,你不立法谁敢来?没有立法的国家外国人最怕。”于是,广东省花一年时间,几易其稿,草拟了一个《特区工作条例》。

1980年全国人大通过了广东省的《特区工作条例》,从此特区工作顺利展开,不过顺利中也有不顺利,有人批评特区是“殖民地”,是“出

卖主权”。反对办特区的,有人很快就转变态度,支持特区;也有人变本加厉,给办特区的带头人栽赃。五个特区办了四个,崇明岛没有办。不用说,是因为有人反对,但是特区的工作还是蓬勃开展。

第二阶段是全面展开经济体制改革和探索政治体制改革(1984年10月—1989年5月)。其有三大特点:

一是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这一突破是很艰难的,也是十分可贵的。在第一阶段之所以阻力重重,上海崇明岛之所以没有办特区,完全是因为那个“对立”的观念没转过弯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二是启动了城市改革。1984年10月在胡耀邦等主持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强调“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这不只是区域的转移,是改革战略的转移,是转向全面改革。邓小平对杨振宁等60多位外籍华人科学家说:“如果说开拓新局面是从农业开始,这次则是全面改革,包括工业、商业、科技、教育等,范围很广。”为了这个转移,邓小平1986年5月10日在会见加拿大总理布赖恩·马尔罗尼时说:“‘七五’计划不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主要目标是实现城市改革。”

三是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召开,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了议事日程。大会的基调是政治体制改革。《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和深入,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了愈益紧迫的要求。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党中央认为,把

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大会为政治体制改革制定了具体目标，要求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第三阶段是改革进入治理整顿期（1989年6月—1992年9月）。世界上没有万无一失的政策，在十年的改革开放中有些地方步子太快，后劲不足，出了些毛病，因此改革有必要进入治理整顿期。

在治理整顿期稳一点是必要的，可是不应该忘记稳是为了更好的前进，过度的稳就变成原地踏步，就可能丧失良机。正如《光明日报》原副总编辑徐光春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对这一阶段所描述的：“一时间改革的声音弱了，开放的步伐小了。”有一阵子喜欢讲空话、套话的人很吃香，却拿不出改革开放的新举措。他们对苏联解体缺乏正确的认识，没有意识到苏联解体是政治体制腐败、经济体制僵化、不真正改革的必然恶果。他们被苏联解体吓破了胆，只会动不动就问姓“资”姓“社”，用大帽子压人。

邓小平看出了这个问题，1991年曾在上海一家工厂里，拿着一件新产品问：“你们说它姓‘资’还是姓‘社’？”1992年1月18日至2月20日，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他在武昌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谁不改革谁下台”，并嘱关广富把他的的话转告北京。在深圳，邓小平反复批评“套话是屁话”。

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谈话（后来被称为“南方谈话”）的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2号文件下发，指出：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远见卓识，深刻总结了1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涉及改革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提出了重要论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从而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第四阶段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2年10月—2012年11月）。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确立了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

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2001年12月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成员国；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进行全面的制度创新。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中国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他接着又在2003年7月28日的讲话中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第五阶段是改革进入新时代和推进全面深化改革（2012年11月以来）。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有三大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对外开放的广度、深度大为增强。习近平说：“中国的大门将继续对各国投资者开放，希望外国的大门也对中国投资者进一步敞开。”5年多来，中国一方面在利用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对外投资的力度大大加强，这是过去难以办到的。正如十九大所指出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各国欢迎，被多次写进了联合国的有关文件。“一带一路”的建设方便了各国的“走出去，请进来”，成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纽带。

第二个特点是改革开放的目标更加明确。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又进一步提出“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至高无上论”是40年改革的结晶和升华。“至高无上”，说透了，就是在中国这片热土上，没有任何地方、任何组织、任何部门的利益能够高于人民的利益。党的“十九大”把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论证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三个字切中时弊，是对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兼顾公平论”的否定。主要矛盾是“纲”，纲举目张。抓住主要矛盾，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行业差距等就会迎刃而解。

第三个特点是抓住了民主的真谛。习近平说：“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众人商量在决策之前，众人商量在决策的全过程。十全十美的决策是没有的，众人商量还要贯穿在推行中，商量如何修改，商量如何调整、完善。提高众人商量的比重，就会相应缩短顶层设计的流程，优化顶层商量的质量，从而实现我们一直大声疾呼的精简机构。为了实现众人商量，必须扩大众人的知情权、发言权、决策权、监督权。众人商量是民主化的发动机和推进器。

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究竟应当如何划分为好，是改革学题中应有之义。说不定后人会把五个阶段合而为一，甚至会把这40年当作百年、千年大阶段中的一瞬而一笔带过。但是，生活在改革时期的人不可以浑浑然，应当理得一清二楚。

### 改革的八大规律及合力

中国的40年改革，从某种角度上讲是从自发到自觉，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运用规律高瞻远瞩、高屋建瓴。改革有哪些规律呢？本文提出八条，供各方讨论。

第一条规律是“目标守恒律”。我们之所以进行改革是要改掉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力，再具体地说，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社会主义是历史的选择，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应当变，即使有风吹雨打，社会主义制度也不会动摇。社会主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方向，我们要沿着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永往直前。我们坚信社会主义公有制会解放生产力，会推动生产力大发展。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基本点很明确：一是公有制，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具体做法还在探索中，还在完善中。

我们发展国企，要把国企做强做优做大，但是我们要严防国企异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摸索，我们认定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既不可超越初级阶段，也不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初级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的标志是什么，还在探讨中。生产力低下时，应当搞包产到户。生产力大发展了之后呢？生产关系还要再改革。现在小岗村的工商业正在繁荣，不再是单一的务农。西方发达国家像奥地利等国，农村水利、灭虫、消防等都归集体。不管以后怎么继续改下去，中国仍然是坚持在国体、政体、社会制度不变前提下的改革，这是中国改革的第一要义，因此称：目标守恒律。

第二条规律是“一改百改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回想当年，国家提出经济改革时，有人说经济改革只引进资金不引进管理。后来认可引进管理了，又有人说不可引进文化。实际上，开放以后，对外来的经济、文化都要一分为二，择善而从，不善则不从。改革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业。改革富有全面性，必然发展为全覆盖。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从东部到中西部，对外开放的大门始终是大开的。



第三条规律是“贫富平衡律”。中国现在有13亿人口，就是在人口不足10亿时，富裕的程度也不会一刀切，不会一个样，总是会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先富起来的人只要不是走歪门邪道富起来的，我们都应当为他们鼓掌。与此同时，先富起来的人也应当主动从技术、管理、友爱、慈善等角度帮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和谐、是平等、是安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点。

从当前改革进展的情况看，不论是用五分法还是十分法来分析，不论是从收入基尼系数看，还是从财富基尼系数看，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都嫌大了点。这与1992年以后有人主张把公平置于“兼顾”的地位有关。贫富差距大必然带来社会矛盾、社会冲突。每年居高不下的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由不公平引发的。要从根本上减少这些事件，就得从更加公平上下手，从共同富裕上落实，从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主要矛盾上抓起。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第四条规律是“快慢有节律”。人们总是希望改革开放的步伐能够快一点为好。可是，由于改革给不同的群体所带来的利益不同，得益少的人难免劲头不足，因此有时步子快不了。再加上国际上的变数是难以预料的，风云有突变的时候。你要进口，他要无端地提高关税；你要出口，他百般刁难，这也会妨碍速度的提升。因此，有时候不得不放慢速度。几十年来，国内就“稳”与“进”的关系讨论过多次。如何把握好二者的关系，这里面大有学问。有一阵子过于强调“稳字当头”，尤其是1989年以后改革的步伐慢了点。为此，邓小平1991、1992年多次尖锐地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良机。”进中求稳是动平衡，陀螺转得越快立得越稳。

第五条规律是“进出守则律”。商品进口出口，都要遵守世贸组织的规矩。通常说，“世界

上没有永久的敌人”，其实还有句难听的话没有人讲出口，那就是“世界上可能也很难有永久的朋友”。因此，和任何国家往来都不能只听悦耳的好话，一律要按规则办事。这样在有人耍赖时，在有人搞“双重标准”翻脸不认人时，我们可以拿出规则与之争辩，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即使对方曲解规则，钻规则的空子，世人自有公论。中国人最讲包容。“有容乃大”“不同而和”是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

第六条规律是“内外有别律”。在提倡对外开放时，总有些人批评过去的闭关锁国，甚至稍带着批评“自力更生”。这种批评只有一部分道理，基本上不符合实际，没有追根溯源。过去的锁国，有一小部分是我们在国门里面锁的，绝大部分时间是人家在我国门外把我们反锁在里面的，他们迫使我们想出去不能出去。想想看，如果人家不承认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与我们建立外交关系，你怎么出去？再说，我们是人口大国，吃的、穿的、用的都靠外国能行吗？如果他们哪一天变了脸，不给你进口了，你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

在今天这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人口大国仍然只能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在外贸依存度上要把把握好分寸，进出口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在今天应当大大高于过去霸权主义者把我们反锁在里面的年代，但也不能太高。我们不能不警惕正在多边贸易的国家突然搞起单边贸易。在高科技方面，提倡学术交流，可是别忘了1959年和1960年正在帮我国研制“两弹”的专家突然全部撤走的那段历史，最终还不是靠我们自力更生吗？在全球化时代还有“逆全球化”的杂音。即便没有杂音，自力更生的成功也是为全球化做贡献。何乐而不为？

第七条规律是“差异包容律”。改革就是改旧、除旧。要改、要除，可以想象得出，在“旧”里生活习惯了的人、在“旧”里得益多的人，会有不同意见。同样，在理论界一些为过去

的那个“旧”做过论证，并且受到赞扬的人，也会对改革改出来的“新”有这样那样的想法，这都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一切真心实意搞改革的人，都要有“改革家肚子里能开军舰”的宏大胸襟，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不打棍子，不扣帽子。认识是个过程，理解有先后，要给不同观念的人转变观念的时间。实践是最有说服力的教材，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治疗思想僵化的良药。要相信他们迟早会推陈出新，除旧布新。

如果恋旧的人对改革“吹毛求疵”，那我们也应当感谢他们花工夫帮我们找到了“疵”。如果他们把好头皮当了“疵”，我们应当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态度来对待。从40年的改革史来看，有好多当初不理解的人后来成为改革的积极推动者。头脑里要多一点辩证法，多懂一点肯定否定律，不要门缝里看人。

说得重一点：改革家自己其实也有个与时俱进的问题。昨天有效的改革举措，今天说不定失效。不是吗？使秦国强大的商鞅变法，今天还能用吗？今天还是要坚持“刑不上大夫”，但商鞅割鼻子那套就大可不必了。对改革进行改革，是永葆青春的改革家脑子里必须绷紧的一根弦。由此可见，对差异能够尊重，对多样能够包容，应当成为改革学教材中不可缺少的篇章。

第八条规律是“上下同心律”。中国的这场改革是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起来开展的。邓小平是改革的总设计师。他为改革出谋划策，在改革遇阻时为改革撑腰打气。可是，他在改革10年后的1988年9月5日依然对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这样说：

“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中国的未来要靠新的领导集体。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他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1992年7月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又严肃地指出：“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乡镇企业是谁发明的，谁都没有提出过，我也没有提出过，突然一下子冒出来了，发展得很快，见效也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我的功劳是把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这两段话是伟人的谦虚，更是遵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对个人与群众关系所做的精辟论述，也要求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再出发”时，必须虔诚地真心实意地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八方甘雨布，四方报年丰。”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实现了从半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转变，中国已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中国的工业化综合指数达到了80%以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要不发生战争，都要紧紧地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化程度已达80%以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由于遵循了客观规律，实现了从闭关锁国到全面开放转变。中国正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一句话：中国社会步入了向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

习近平在庆祝建党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最鲜明的旗帜。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作为“特色”“旗帜”“抉择”“法宝”的改革，随着国家治理体系的完善和治理能力的加强，随着改革学的学科化水平的提高，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前景定将无限美好。

# 实施精准扶贫政策需要“上下互动”

——与许汉泽、李小云商榷

吴新叶

精准扶贫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大量成果既指涉价值层面的人本关怀，又有跨学科的实证对策或建议。总体而言，在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时代背景下，学者们更多的思考是关于精准扶贫的发展模式与路径选择，如政治学者关注扶贫政策与国家建设，经济学者试图解决人的发展同市场之间的关系，社会学者则尤为关注贫困群体及其行为方式的社会影响。《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2期发表了许汉泽与李小云的文章《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与路径选择》（以下简称许文），这是一篇政治学视角的研究成果，以国家扶贫政策为观测对象，透视扶贫困境的产生根源及其破解对策。基于社会精准化理论、参与式发展理论、社会互构理论的充分支撑，两位作者发现：当前精准扶贫政策在操作上并不“精准”，扶贫政策在推行中出现了碎片化、条块化、运动式治理以及市场化导向等问题，认为应该在制度、思维模式和工作方法上加以改进。

许文的发现和判断均是准确的，在扶贫政策实施主体、政策过程、政策动力与政策目标等层面有独到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下科层制治理模式的批判性分析。但是，许文的发现和结论也存在片面性，且存在矛盾之处：一方面批判了科

层制治理的不足，另一方面又在对策建议上提出了巩固科层制治理的思路。这种修正科层制扶贫的策略属于治标范畴。与此同时，许文提到的参与式治理理论并未为矫正科层制策略提供支撑的基础，殊为遗憾。本文认为，科层式扶贫有其不可替代的合理性，特别是在推行扶贫政策的过程中不能无视基层的政策响应，提升扶贫的治理绩效需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互动”。基于此，本文提出同许汉泽与李小云两位学者商榷的立场与观点。

## 科层制扶贫需要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政策响应

许文是通过通过对云南J县和M县的调查结果而得出的结论，因此对当下精准扶贫困境的判断有充分的文献支持和实证调研的资料佐证。更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开展两个县的调查时已经有事先发展的理论命题为框架，对于精准扶贫过程和结果的检视展示出政策分析的全面性和整体性，使扶贫的动态过程与贫困县的真实情境得以呈现出来：“我们调研的国家级贫困县M县扶贫办目前工作人员只有5人，扶贫办主任由发改局局长兼任”，“扶贫部门在科层体系之中位于边缘的位置”（以下引文如无注释，均来源于此，不再一一标识）。在这个意义上讲，许文的研究发现同理论预设存在逻辑相关性，作者针对扶贫现象的解释都是对理论命题的响应，因此云南两个贫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8期。

作者简介：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浦江学者，湖北工程学院楚天学者特聘教授。



困县的观察结果具有外推研究价值。许文沿着“科层体系”的逻辑进一步演绎扶贫政策的落实：云南两个贫困县的扶贫政策及其落实，“采用的是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县级科层体系内部各个部门在落实扶贫项目时没有顾及基层实际，结果“引起地方政府与民众的冲突，甚至发生‘扶贫致贫’的现象”。当然，这种南辕北辙现象仅具有个案特征，在精准扶贫实践中不具有普遍性。

借助公共权力与公共资源（典型如财政资源）的优势，科层制治理是迄今为止无可替代的精准扶贫的必然选项，也是优先选项。这是科层制本身属性使然，体现出可预期、可追责、透明和程序正义的治理特征。然而，科层制固有的弊端抑制着精准扶贫的绩效提升，意味着科层制存在建设性的完善路径。比如，任务导向与弱激励机制等，使扶贫政策执行的代理人倾向于“向上看”，而作为政策的目标群体（主要为贫困户）及其回应往往是被忽略的。必须承认，许文已经击中当下精准扶贫常规路径的要害，即抓住了科层制的权力机制及其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威地位，但是许文的全部解说基本上囿于科层制扶贫的政策执行环节而展开，并没有把目标群体的“互动”纳入考量因素。作者关注科层制扶贫的单向路径，聚焦于扶贫资金使用、扶贫动力机制和市场导向等相关领域，至于贫困户和其他非科层目标群体并不是许文的学术关切。对于目标群体的缺席，本文认为是二位作者对政策对象的有意回避，并非是基于政策全过程角度的学术思考，因而其结论是单向度的、非闭环的政策建议。

在许文中，科层制的组织分工、资源的权力配置方式、弱激励机制、国家的相关扶贫规章制度等要件，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比如，关于组织分工，许文介绍了M县的两套机制：“省州县乡四级领导”和“选派新农村建设指导员、第一书记、大学生村官、边防民警村官‘四支队伍’来开展精准扶贫工作”。这个权力系列明晰、层级节制显著、“官”色彩突出的扶贫机制凸显了政府唱独角戏的单向特征，并没有自下而上的

响应“互动”环节，难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但是，精准扶贫的终极目的是通过政策靶向解决贫困群体的民生问题，在目的论的治理价值角度则是为了人的发展。许文由于没有考量这一价值指向，因而仅在政策起点上突出了目标群体的地位，却在政策终点上忽略了政策目标群体的存在。

可以想象，只要扶贫政策的目标群体成为“他者”，扶贫实践的结果就是不完整的。理论上，这一结果同科层制治理逻辑是因果关系，因为单向度的科层制扶贫只是强化了国家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如项目扶贫是政府主导，无需得到村民的响应甚至无需他们的同意；“一对一”帮扶干部是上级安排的，甚至何时下乡扶贫也无需被帮扶对象“操心”；异地扶贫安置搬迁、产业扶贫等也是如此，尽管科层制代理人都坚持自愿的非强制性原则，但在扶贫决策环节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程度不同的“群众缺席”现象，客观上强化了科层制的权力惯性。许文恰恰在强化这种惯性作用，如强化扶贫队伍管理、财政投入的政策完善、问责制的细化与落实等，突出了自上而下的特征。可以想象，只要自下而上的反馈（回应或配合）是缺失的，扶贫政策过程的相对排他性就难以避免。这是许文路径选择研究中的一大缺失。

### 生活方式：“上”对“下”的政策改造及其领域

同政策改造人们的生活方式相比，许文更倾向于通过科层制扶贫及政策执行来改造贫困群体的物质生活状况。这种立场有合理性，但亦存在片面性，集中表现为许文忽略了扶贫政策的靶向需聚焦于改造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肖瑛的社会制度比较研究也发现，科层体制、国家法律及其他正式规范都可以纳入到制度体系中考察，而这些“制度一经发布和实践就能重塑生活”，无论是权威对现实的回应，还是政策对生活的有意识塑造，那些被贴上“传统”或“落后”等标签的东西都会成为被制度改造的对象，这就是制度的理性特质。单就公共政策而言，政策群的规模越大、政策链条越长，则政策理念与政策导向就



越是清晰、政策改变现状的形态与功能越是能够体现出一致性。必须指出的是，政策作为制度的有机构成，从来也不掩盖其改变现状的初衷和能力，扶贫政策也不例外。

许文已经发现扶贫政策的短板效应，并建设性地提出矫治的对策，但并未提及政策对生活方式的改造功能和改造能力。许文关注的是科层制在精准扶贫领域的部门协调与协同治理以及工作方法创新，其学术兴趣点是科层制及其治理方式的改进。许文认同并坚持贫困治理需要国家等外在机制的积极干预，这一立场是值得肯定的。正如前文所述，许文由于没有回到政策目标群体的治理本位上来，因而忽略了扶贫政策改造生活方式的价值。本文认为，扶贫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解决民生问题只是扶贫的阶段性任务，从长远看宜将扶贫举措同改变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

全面评估这一问题，改造生活方式既受制于诸如地理环境、政治法律、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又直接同贫困群体的微观生活场域息息相关。科层制（含体制机制与政策等）在系统内的部门整合、低激励效应、跨边界合作等不同层面显示出局限性，却天然具备改造生活方式的功能和能力，其作用机制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改造生活环境，目标是建设生态扶贫的外部支撑模式。犯罪学的破窗效应启示人们要注意环境建设，加强社区环境营造客观上保证了社区安全质量。以环境建设来引导人们转变生活方式，这在历史上有过成功的治理经验。比如，1957年消灭血吸虫病被当做是“一项严重的政治任务”，中共利用强大的科层体系力量强化政治动员的约束力，“全民动员，全党动手”，把环境治理和饮食习惯改变列为优先项，最终取得了显著成效。当下，以异地搬迁脱贫和生态保护脱贫为特征的环境改造举措，也借用了类似的动员机制，殊途同归于改变贫困群体生活方式的目的。无疑，通过环境改造而达到脱贫目标还只是

一项尝试，可能经过很长时间的投入之后仍然收效甚微。许文列举的“扶贫致贫”现象是因为政策不当导致贫困反复的结果，在以往的治理实践中也不乏惨痛的教训：在全国很多地方，急于脱贫的地方政府上马了一些污染严重的项目，短期利益换来的是当地居民健康受损的代价，很多人因病返贫致贫。这种“扶贫致贫”现象其实是环境恶化之果，尤其值得推广产业扶贫、开发扶贫政策时加以注意和避免。

其次，改造贫困群体对生活的认知与习惯，目标是政策对象群体能够在体验中自觉接受反贫困的各种行为准则与行动方式。当前，精准扶贫实践中存在的大量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缺少自下而上的充分“配合”。出现这种“上下”断裂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但结果则是对现有精准扶贫制度的销蚀或破坏，甚至出现“干部干、群众看”等怪现象，加大了科层制治理的难度。比如，在很多连片特困地区，由于自然禀赋差异太大，需要异地搬迁才能实现脱贫，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搬迁群众由于缺乏对现代社区生活的认知，在简单体验之后便选择重新返回旧址。来自贫困户的这种“抵制”现象表明，现有扶贫政策并没有改变人们的行为准则，其行为方式同现代生活产生了反差，因而导致治理贫困的失灵。

再次，将贫困群体的生产方式革新同生活方式改造结合起来，提升能力、激活潜力。《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号）对此作出部署：“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处理好国家、社会帮扶和自身努力的关系，……增强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当前的精准扶贫显然有大量工作要做，这是因为政策的激励与塑造功能远未得到开发。比如，发展养殖业是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政府对建档立卡户赠送了家禽或牛羊，但在不少贫困地方出现过令人啼笑皆非的现象，政府派送的扶贫羊或者被卖了，或者被宰杀吃掉了，生产方式最终“不敌”生活方式。还有一些地方，在落实公益岗位扶贫政策的过程中，有些

贫困户拒绝接受垃圾清扫等“丢脸面”的工作，宁可拿政府救济金也不愿意通过劳动实现脱贫。这些现象说明，尽管贫困群体作为扶贫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体现，但旧民情或旧习惯抑制了触发其内生动力的可能性，因此以生产方式挂帅具有片面性，宜从主观能动性角度改造贫困户的生活方式。

最后，进行文化改造，目标是在濡化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中促进发展。在社会资本理论范式下，社会的公序良俗、村规民约、乡风民俗、行为习惯、生活理念与价值观等，其存量中的现代性成分越大，则社会进步越显著，这是国家构建当代中国现代化战略的应然范畴。学术界普遍认为，越是落后地区，人际间熟人社会的特征越突出，差序格局的网络作用越显著，对革新的阻力就越大。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为例，尤其是在人口密度低的贫困山区，贫困群体处于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之中，有些甚至没有形成传统的村落结构，社会网络极为简单，社会资本存量低下，对于现代文明生活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因此，精准扶贫政策如果能够起到丰富社会网络结构的作用，那么就能够增加改变生活方式的渠道和可能性，从而达到告别贫困走向共享文明生活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那些遭遇自下而上“抵制”的扶贫政策并非缺少正当性，相反，绝大多数扶贫政策都是“良法”，只是因为贫困地区的社会资本存量不足，无法形成充分“互动”，才失去应有的政策效力。

改造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相关政策的核心功能是培育和养成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行为习惯与行为方式。如何深度介入贫困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改造过程，精准扶贫政策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一，政策引领的挑战。积极的生活方式需要相关的知识传递与经验习得的提炼，因此政策着力点在于发掘其教育功能，引领贫困群体的生活态度和改变他们的行为方式。其二，政策激励的挑战。扶贫政策不仅仅要在贫困群体中体现出正面强化的激励效应，还应该将这种激励反馈到全社会，从而形成社会共鸣。无疑，要发挥改造生活方式的

功能，精准扶贫政策还有很大的发掘空间。

### “上下互动”的几种政策选项

许文精确地发现了科层制治理模式在扶贫实践中的政策运用及其负效应，提出的对策建议也是基于完善科层制治理的思路而展开，其论证逻辑周严，具有对应的合理性。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看，许文结论的可信度是打折扣的，作者的学术贡献体现在扶贫政策的执行环节，在反馈环节则语焉不详，因而只是“部分”地回答了当下精准扶贫所遇到的挑战，没有考虑自下而上的政策“响应”。理论上，缺少公众配合的扶贫政策，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均是不充分的，因此在实践中是有害的。概括起来，结合“上下互动”原则，除了被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扶贫政策必须终止之外，还有两种策略须加以甄别，即政策的自我捍卫和政策妥协。

#### （一）政策捍卫

在政策执行遇阻的情况下，科层制治理的惯性是本能地巩固既有政策。在官方文件中，类似“加大”“强化”“进一步”“夯实”等词汇表达了执行者的政策捍卫决心，同时也反映出坚持现行政策的自信。许文是偏好科层制治理的研究成果，因此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政策捍卫的态度和倾向：“开展扶贫领域的制度供给侧改革”，需要改变扶贫治理结构、细化分工、建立健全监督机制等；在治理模式上，要“将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结合起来”，其实质是捍卫政府主导的科层制“刚性扶贫”模式；关于工作方法创新，许文列举的“分类治理”“制度建设”“奖补优化”等，也是基于科层制线性治理逻辑的考量。的确，对于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扶贫政策而言，政策捍卫有其必要性，而有效治理则需要充分的前提条件：符合贫困群体发展特质的政策、反映国家战略部署的政策、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等，决不能因为执行中遇到暂时的困难就终止政策过程。

在科层制治理逻辑下，政策捍卫通常以三条方式展开：首先，“成立机构”或巩固扶贫机

构。一般情况下，地方负责扶贫决策的领导小组会做出调整，由更高一级的领导（如县长或县委书记）兼任小组长；相应地，扶贫办公室则在负责实施的过程中要求职能扩容。二是“配备人员”或增设人员。科层制组织膨胀的铁律之一就是不断增加人员。由于信奉“专人专职”的科层制逻辑，只要坚持既有的政策，就必须投入更多的人力资源。因此，在扶贫实践中，既有扶贫机构的工作人员直接管理精准扶贫工作，党政部门、人大政协、政法系统、群团组织、国企，甚至是人民教师也被动员加入到精准扶贫的队伍中来，而处于最末端的村级“两委”及其工作人员更不能例外，他们也是奋斗在扶贫第一线的体制内力量。三是“经费到位”，主要为政府扶贫专项资金和企事业单位与社会捐助等。自2015年到2017年，中央和省级用于扶贫的专项资金几乎翻了一番，年均增幅在三成左右。刚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扶贫资金监管确保脱贫攻坚成效的意见》已经显示出此类资金有增无减的态势。因此，组织巩固、人员配备和经费增加成为当下扶贫政策捍卫的常见方式。

## （二）政策妥协

妥协是政治生活的基本策略。对扶贫政策执行不力的成因，许文表达出对既有政策的质疑：扶贫资金的使用“受制于各个行业自身的管理办法”，扶贫项目开展由上级部门“统一打造”，抽派进村干部在事实上扰乱了他们的本职工作节奏……显然，许文列举的这些问题依然没有涉及“自下而上”的政策反馈环节，现实中扶贫政策的调整（妥协）不能不提基层社会的“缺席”。比如，社保兜底政策客观上纵容了个别贫困户的懒惰行为，他们更乐于“坐在门口晒太阳，等着政府送小康”；产业扶贫政策由于设计不周，导致骗取扶贫资金的现象屡屡发生；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则增加了新矛盾，诸如此类。

由于许文缺乏对这些政策问题的考量，所以

有些建议难以从根本上破解扶贫政策执行的难局。从政策周期的角度，“上下结合”要求对已经执行的政策作出调整，即政策既要关注“上”又要向“下”看。一个完整的政策周期必须是开放的系统，从“议程设置、问题界定、方案规划、后果预测、方案的比较择优到政策执行、评估、监控和终结等活动环节”，闭环系统的政策过程才能体现科学性。精准扶贫作为中国减贫事业的一项创举，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最初的政策设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在所难免。一旦政策周期形成闭环系统，那么扶贫政策在执行中所发生的问题便有机会被筛选、甄别并及时反馈给决策部门，由决策者做出政策修正，然后付诸实施，从而开始一个新的政策周期。

在精准扶贫实践中，做出政策修正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根据笔者在陕西商南县的调查，当地管理部门对易地扶贫搬迁户就作出过“妥协”决定：针对普遍存在的毁绿种菜行为，管理者没有一禁了之，而是在新社区中开辟了一块空地，专门留作种菜之用，暂时缓解了矛盾抗争；鉴于搬迁群众忧虑生活成本高、拒绝缴纳物业费等现象，基层政府调整政策，对水电费用实行了补贴或部分减免。这些政策妥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扶贫政策的最初设计，因此在实施手段、路径或目标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调整，但政策结果却是有效的。

## 结论

当前，精准扶贫中出现的问题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科层制治理惯性造成的，由于缺少自下而上的配合，精准扶贫过程最终演变成为政府的单向行动。这种“剃头挑子一头热”现象不符合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和政治期待。扶贫是一个复杂性治理过程，为了保证治理的有效性，政策体系不仅要保持高度的体系化，而且还需要体现运转的高效性。因此，当下精准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需要兼顾“上下互动”，需要在一个完整的、闭环的政策流程中综合施策。



# 我看到了《岳阳楼记》的源头

——评黄军建新著《不朽的忧乐》

李望生

常听人说，当今世界，以职称而认定某艺术家所从事的艺术行当已非易事。前几日获黄军建先生新著一套三本，正好印证了此说。黄军建先生的职称是国家一级作家，从其以往的大部分作品看，散文似乎是其看家本领，但就其本人而言，黄军建先生身上的诗人气质似乎更浓些。可就是这么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却将他的手伸向了学术研究领域——这一套三本书分别为《不朽的忧乐》、《江湖之喊》、《做大写的人》（吉林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我感兴趣的是，这三本书的副标题（我认为应该是）虽被编辑（应是编辑所为）将字体缩小到再也不能小的地步，也能让真正细心的读者一眼就可看出，这三本书均与一篇著名的散文作品有关：《〈岳阳楼记〉留给我们的智慧与思考》、《〈岳阳楼记〉对人类的影响与贡献》、《〈岳阳楼记〉给世人的教益与启迪》，显然，这三本书的母体均为那篇散文《岳阳楼记》。这就好理解了，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散文家，去研究一篇名传华夏的著名散文，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关键的问题还在于，黄军建先生曾担任过多年岳阳市史志办主任，长期从事散文艺术行当，又有地方史研究的经验，再加上那么一种诗人气质的一级作家，所著之有关一篇写岳阳楼之记的华章之研究著作，说到这里，基本上就可以认定了其

应有权威性与可读性，以及可以满足聪明读者的求知欲了。

我是花了五个晚上——白天的太阳太浮躁，读这类书大致应在夜静心宁时——读完《不朽的忧乐》的。从一套三本书中取此书先读，首先吸引我的是这个书名。忧乐是一种精神状态，精神本身就是不朽的，似乎无需著书来证明。读完全书方知，这里所说之忧乐，远超出了一般的精神状态，“而成为人类的精神火炬，以其积蓄的无穷能量和闪烁的无限光芒，点燃了人类社会的精神世界而闪闪发光”；也是源于传统文化之“易学的理念”、“道学的智慧”、“佛学的情怀”、“儒学的修为”之精神层面（内核）之集大成者。这就为我们给此书的文体定位奠定了基础，从而我认定，此书非一般文学作品，而是一部学术著作。

首先从该书之结构看，篇、章、节、目的持续性构建了一部学术著作的框架：“由来”、“记述”、“形式”、“智慧与启示”、“影响、贡献”，卯榫合缝，一气呵成。

其次从行文上看，以文带史，以史论文，以文及人，旁征博引，既有文化散文之笔调，又有学术论著之慎密，而落脚却在一个“论”字上。对于范仲淹凭什么写出《岳阳楼记》，黄军建先生说：“笔者认为，范仲淹是否到过岳州并

不重要，我们姑且不去争论，重要的是他的这篇千古雄文《岳阳楼记》。”而“滕公给范公的这封信才真正是促成《岳阳楼记》成文出世的主因。”“……这些生活积累和他一理想抱负，再加上岳阳楼上的诗赋和《洞庭秋晚图》，已完成了范仲淹作千古名篇充分的生活基础。于是，他写‘忆’中之景，也写‘意’中之景，借景喻世，喻物、喻人，写成千古绝唱《岳阳楼记》。”观点明确，毫不含糊，权威性显现。

分析此书的写作目的，从浅表层次看，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如果要从深层次，透过表象去分析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就不那么容易了，而且很有可能会陷入见仁见智的片面之中。我是从作者的研究方法去分析作者的写作目的的。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显然是此书解读的根本所在，可在此书中，我读到的却是一个作为一个“平台”的《岳阳楼记》，作者借《岳阳楼记》这个“平台”在展现作者对此文所作之时代、演变、政治风云、文化面貌、人物精神等的还原，或者说是分析与解读，借以达到其“喻世”、“喻物”、“喻人”之时代目的。表面上，黄军建先生写《岳阳楼记》的写作由来、论述、形成等等，而我们读到的（当然要透过表象）却是范仲淹为什么写成和如何写成以及写作《岳阳楼记》的目的，更深一点说的是，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的精神取向、文化背景和人格形成，这让我想起了我的另外一篇评论《站在散文背后的那个人》。在这里《岳阳楼记》成了一个承载，而站在文后的那个人，以及这个人的精、气、神，以及这种精、气、神的形成才是文之形成的内核所在了。在这里，我不想重复黄军建先生是如何分析滕子京、范仲淹等站在《岳阳楼记》背后的那一批人，我只想说明，这其实还不是黄军建先生写作此书的真正目的所在，黄军建先生只所以一本书，几十万字去挖掘仅仅三百多字的《岳阳楼记》的精神内涵与艺术承载，其实际目的是在展现《岳阳楼记》之精神与艺术之外延，借以达到

呼唤这种精神与艺术的回归，也是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寻找一种精神源头，或者说为我们这个时代召魂！这又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命题，那就是，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读书，读书真的有利心吗？这个命题，其实黄军建先生在他的《不朽的忧乐》中已给出了答案，只是似乎不是我作此文之趣旨所在了。

是的，《岳阳楼记》作为一篇散文单独存在时，它闪烁的是艺术的光芒，当我们透过这种艺术表象，去探究站在散文背后的那个人、那群人，以及那个人、那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渊源，成长过程、以及这个过程背景、渊源时，《岳阳楼记》就再不单单是一篇散文，而成为了一种精神承载，成为了一个源头的活水，这个源头是不朽的，这种精神肯定也是不朽的！

突然想起了刘心武。刘心武不也是放下小说不写，去研究《红楼梦》了么？黄军建先生怎么就不能放下散文不写，而去研究《岳阳楼记》呢？一部《红楼梦》成就了一个学派，一篇《岳阳楼记》就不能成就一个学科？当然，以一篇《岳阳楼记》的几百字，显然是无法去同煌煌大著《红楼梦》相比的，但正如黄军建先生在《不朽的忧乐》中所论证的《岳阳楼记》之文化内涵、精神承载、艺术素养，难道就不能自成一统？“三爱四讲”、“忧乐五观”、“七忧七劝”直至“吾谁与归”的发问，早已不仅仅是三百多字所能涵盖的了，其对世人的智慧与启示，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以及对人类的贡献已在《不朽的忧乐》中阐述明了，我想说的是，黄军建先生自己怕也未必明了他在做着一件什么事！他写了这三本书，这三本书放在我手上时，我是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它的份量的。我在读这三本书时，耳旁常有一阵哨音，或是一阵号角响起，断断续续，余音绕梁，我似乎又看到远远的青山绿水中，有一股涓涓细流，蛇行而来。这哨音是长途马拉松的发令哨，这号角是集结号的长调，这细流是一股大水的源头……